Panorama einer Weltstadt

BERLIN

柏林万象

卡尔·费迪南德·古茨科 [著]　余荃、肖霄、罗松洁 [译]　王静思 [责编]

译言古登堡计划
Yeeyan Gutenberg Project

版权信息

书名:柏林万象

作者:[德]卡尔・费迪南德・古茨科

译者:余荃,肖霄,罗松洁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一、“国际大都市”万象

1.施特赫利咖啡馆[注]（1831）

在施特赫利咖啡馆，我们可以对文学柏林化的概念有个了解——这点毫无疑问。人们带着狂野的欲望和嫉妒的眼神拿起一堆报刊，左手捏住一叠，右手还一份接一份地在呆滞、冷漠的表情中翻阅：在这沉默的动作语言中，大概他们自己也迷糊了。期刊杂志的铁嚼子和锁链仿佛用了巨大的力量把人的喉舌束缚住了——谁会在这儿把有趣的简讯给邻座看呢？可能有一支敌军离柏林只有一英里远，但没有人会将这事儿说出来，人们会等待它被印刷出来，然后拿一份，传阅到所有人的手里——几乎大家都这样做，就像施特劳[注]的正派人士在每簇稍显热闹的人群前走过时便会欣慰地呼喊：“明天印出来就可以读到啦！”

光顾施特赫利的客人自然而然地分为两种：年轻人和老年人。更确切地来讲，是向往着成熟的年轻人和追忆着青春的老年人。那一群都是文学青年，怀揣朦胧妖娆的美好愿望，憧憬着有朝一日人们能像如今看待古典文学大师那般尊崇自己；这一边是政府官员、老军官们，他们口若悬河地谈论着普鲁士国家的政治立场，埃尔斯勒[注]的双足，松塔格[注]的花腔，谢希纳[注]的表演！简直无法忍受！在这些老纨绔高谈阔论之前，人们就恨不得闭耳不闻，或是逃到最偏远房间的僻静侧室里去。尤其是在冬天，这些人穿着短袜与毛靴，面容愚蠢而忠诚，当他们走上来时，脚步声大得即使是最迟钝的耳朵都能听见。他们雀跃地欢呼着要看《国家报》，寻找研究H.先生、v.R.先生和v.Wsn.先生的个人官方声明。接着他们又读了些《汇报》里柏林的报道，这些报道大概就是柏林民意的表达吧，仿佛民意真的存在似的。当他们读完《波兹南日报》合乎逻辑的报道，从中增加了自己的知识

与见解时，就开始批判戏剧，视戏剧为眼中钉，要人们必须远离剧院。在他们旁边的是身材高挑的卫队少尉和候补官员们，这两者的区别是：一个说得多而想得少；另一个想得少而说得多。这些人是前文被称作年轻人的过渡群体，我会在后面更详细地谈及。

这里完全不缺展现柏林万象的方法与元素。离开此地，无论怎么展望，人们对这个地方的特征总会有更确切与更独特的认识。就像第一眼看到一座教堂，它既像教堂，也不像教堂。大教堂[注]的正面骄傲地挺立着，与它的奢华相比那空洞的石堆显得十分突兀，它的背后是一座毫无美感的拱形穹顶附属建筑物，如同一只气球，为了安全着想，还栓了一个降落伞，人们对此发出的异议才是星期天礼拜时那些吵闹嘈杂的真正原因。从歌剧院广场眺望，又是另一座由丑陋的石堆砌成的教堂[注]，展示着十六、十七世纪品位的匮乏，成百上千的窗户让人想起启蒙运动时期和光照派存在的时期，光秃秃的文化尝试又再次落脚在这从底部到80-90英尺的高处都平滑而空洞的壁墙之内。当然这更多都属于过去，但也不难看出，所有这一切也都可在最新建筑的时髦装饰风格中重新找到踪迹，这些只是真实的现代社会的表面粉饰罢了……

---

1. 施特赫利咖啡馆（CaféStehely）：位于柏林夏洛特大街，是德国三月革命前时期（1815－1848年）柏林作家、记者、知识分子等最著名的聚会地点。（译者注）
2. 施特劳：柏林东部的一个小村镇，原名Stralow，后改为Stralau，1920年后成为大柏林区域的一部分。（译者注）
3. 埃尔斯勒：全名FannyElßler（1810－1884年），奥地利人，19世纪最著名的女舞蹈家之一。（译者注）
4. 松塔格：全名HenrietteSontag（1806－1854年），德国女歌剧演唱家。（译者注）
5. 谢希纳：NanetteSchechner（1806－1860年），德国女高音歌剧演唱家。（译者注）

6. 此处指在柏林御林广场的德国大教堂（DeutscherDom）。该教堂建于1701－1708年，巴洛克风格，后来卡尔·冯·贡塔德在腓特烈大帝期间的1780－1785年，在原教堂基础之上设计建造了新的拱形穹顶塔楼。（译者注）
7. 此处指在德国大教堂对面的法国大教堂（FranzösischerDom）。1780－1785年间，由卡尔·冯·贡塔德在原法国腓特烈施塔特教堂（FranzösischeFriedrichstadtkirche）后面设计建造的新拱形穹顶塔楼，与德国大教堂的穹顶塔楼几乎相似。（译者注）

2. 柏林的霍乱（1831）

……眼下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忙于对付从这个月的第一天起就真正来临的霍乱：本以为它会搭上自法兰克福而来的班车，但它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径，通过菲诺运河，来到了港口旁的隔离检疫站。事实上，第一个霍乱病例事件的详细经过是一部悲喜剧，其结局几乎有叙事诗式的悲惨。人们从没有想到这种可能性，霍乱会传染到夏洛滕堡(离柏林半英里远)。宫廷原本想要把他们自己封锁在那儿的宫殿里，一些粮食补给车也已经开去了那里。这时突然从那里传来了消息，有一个船夫因霍乱而死去了。为了看护霍乱病人，特意设置了穿着铠甲的的卫队，听到这个消息，警官和动作不灵活、穿着防水布和铠甲的男人们都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并骄傲地认为他们是第一批对付霍乱的人，但这样做对他们可没什么好处。死去的船夫被装进了棺材，夜晚的时候，守卫得把他送到大船的一只驳船上。然而在第二天早上大家却得知，船上除了一个被冲到岸边的人以外，其他人全都沉落水中了，在斯潘道的渔民网住了一具棺材。现在因为死者接触到了施普雷河，就没有人吃任何鱼或蟹了。那些粮食补给车又开回来了，人们听说，国王将要前往波茨坦边上的孔雀岛了。

柏林的第一个病例自然就是那个船夫，正好发生在市中心。到现在为止，听说有29人染病，21人死亡。人们抱怨着无勇、无能的本地医生：我们曾希望，能见到从传染地区过来的，对付霍乱有经验的人；然而却一直没能盼着。公众情绪至今仍是相当温和的，当然现在很少有人光顾娱乐场所了，人们都在到处购买预防性用品、绷带、松香膏药。仆人们都被遣散了，一些种类的食物也都完全脱销了。接下来的会是如何灾难性的结局还无法预估。

3. 老建筑——新建筑（1832）

……在平淡无聊的复辟时期，即在军事武装与战胜霍乱之前，国库比现今更为充盈。柏林曾被修缮得越来越漂亮；许多公共建筑修造的品位令人相当赞叹，美化建筑这样的远见同样值得称赞，它为我们一部分的无产阶级确保了食物供给。那时私人也有这样的建造兴致，他们的钱财与事业心使柏林扩大，建造出了一个宏伟的城市社区。但如今也从这方面来说，所有的计划都停滞了。眼下能想到的仅有两座公共建筑，一座是货物场的全面改建物，货物场其实就是为了将要到来的商品而建的一个堆货场和一个货物仓库；另一座就是建筑学院的新楼。到过柏林的人都知道，要从宫殿广场到耶格尔大街，就必须要穿挤过最热闹、同时也是最狭窄的道路：维尔德什磨坊，闸桥——连接我们老城与新城的通道。以后这片行走不便的地区人流将会变得稀疏一些。紧靠闸桥的右边，将会开始建造一个露天广场，这样就可以眺望到货物场和维尔德什教堂了。在这样的一个工程中，从尼德尔拉格大街到闸桥的那些角落的房屋持有者将会获益，但是那座微小的维尔德什教堂大概会失利了，它在一个宏伟空旷的周边环境下会明显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上文所说的学院新楼还未开工，然而工期可能还会拖延好一阵，因为这个机构的现状承担不起如此巨大的花销。由于博尤特先生，我们未来的商贸与手工业部部长，领导着新建的州立建筑学校与工业学院，使其改善得越来越好，现在建筑学院这个曾经辉煌的教育机构跌入了颓败的深渊，以至于在校的教职工人数可能都跟学生人数一样了吧！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个建筑工程暂时还没有开始施工……

4. 大教堂，剧院——“五芬尼大桥㊟”（1840）

从我的寓所可以眺望宫殿的周边和许多高大的建筑，这些从菩提树下大街的街头延伸到大教堂的建筑使这片区域成为了欧洲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之一。只是，要是没有大教堂高大主塔楼旁那如同两条插枝般的双子塔楼妨碍我就好了！主塔楼巨大的拱形穹顶本就没有意义，因为它对教堂内部结构来说毫无价值，只是纯粹作为建筑装饰物罢了，在穹顶旁边，竟还筑有两座小小燕巢般的塔楼，好似少校左右肩上的两个肩章。这就让人很可以想到圣彼得堡的圣以撒主教座堂。但是在那里，这些小塔楼是宗教礼拜的一部分，它们可以让日光照亮各个祈祷室，数量众多的小塔楼都建于俄罗斯的教堂上，由此对那里的教堂建筑来说，小塔楼可以展现出一些重要的东西。在柏林这个地方，政治和军队制服上模仿俄罗斯的事情已经够多了，人们还想让这座城市的主教堂再展现点儿俄罗斯风情，申克尔㊟真是太弱了，让这两个小小的鸟笼毫无意义且毫无美感地挨着这个教堂较大的塔楼。若是申克尔——这位渊博、富有创造力而又深思熟虑的人才——拥有艺术家那真正的骄傲就好了，它就会阻止他去接受要改变他原始建造计划的意见，这样首都的建筑就会有更多的艺术价值。一只更高权力的手总是插入他所提交的许多建造计划中，并把那些大胆与富有特色的想法都抹掉了，当然这只手的“慷慨大方”必须得让它公开“享有盛誉”。舒适、简朴、保守，这些本身值得赞扬但在艺术中并不适用的想法把所有高大、突出、耸立的建造（例如教堂大胆高耸的塔楼）都抛弃了。申克尔在他大量的建筑平面图面前都有失艺术家的骄傲，这点对他来说并不光彩。

申克尔为他的建筑写了些有富有见地与才智的解说，其中也阐述了促使他把剧院建造成如今这样子的所有原因。若是一栋公共建筑物的正面没有一次被当做进出口使用，宽大的露天台阶上可以看到长出的青草，人们自然会觉得，这些没被使用的地方都是过度繁缛的装饰。但愿能让行家们决定这个剧院的表面建筑价值吧！剧院的内部充斥着令人消沉的小家子气和私人性质特点，这同样不是来自申克尔的专业意见，一点也不与这座曾被称为“国家剧院”的建筑物相称。为了能容纳下1200人而把剧院建造得更大，或许并不是必需的；但为什么会有隔离、孤立这样怪异的特点存在于整个建筑设计中？一个楼座看不见另一个楼座，正厅前排和后排座位也完全看不见那些楼座。有人在剧院的一个位置，却不知道是否他占据的其实是另外的位置。只有在戏台前和戏台上才有可能做到将剧院整体一览无余，以至于人们为了知道剧院是否已经满座，都得问演员了吧。由于剧院强加的这种私人性质特点，使其至少缺失了两个优点。第一点是较大的社交舒适性。因为所有观众都不能互相看见，一个人看不见另一个人，如此在这个剧院，社交聚会的特点就完全没有了，而这个特点本来经常能为糟糕的演出作些弥补。你的兄弟姐妹们都在剧院，你却看不见他们。这种多角建筑的第二点令人不悦之处便是，观众不再是真正的观众了。观众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能看见他们自己的力量，懂得去证明他们的团体意识对戏剧产生的影响。在剧院正厅看不见第二排楼座的人是什么表情，剧院的观众只能总是依靠他人的后背来判断其评价，在这样的地方，就不会有评论的总体性；每个人都依靠自己，演员的付出却没有得到真正的尊重。许多演员都对我说过，柏林不再有观众了。这其中的理由便是，观众的位置阻碍了这些观众认识并成为真正的观众……

这里我还想说一点。我的旅店附近有一座桥横跨到宫殿广场，这条通道只收很少的过桥费，一个当时自费修建这座桥的团体在负责征收这个费用。每个市民都会在桥尾支付一些小钱。军人免交。为什么呢？我认为，柏林这些粗俗的士兵喜欢到处溜达，他们很难想象收过

桥费的意义。不交钱就不会被允许上桥，然后经常产生争执，所以人们就让士兵们免费通过了。但是那些军官呢？人们不免这样想，军官会鄙视这种贪小便宜的行为，就算是一个贫穷的老妇或者手工匠都要付五芬尼硬币的地方，难道拥有真正名誉与面子的军官们会免费过桥吗？会的。一位将军与一个市民过桥：这个市民付钱了，将军却没有。我现在日日夜夜都在想，普鲁士侍卫军军官团有着多么令人尊敬的地位，任何细节都维护自己荣誉的一群人，怎么能习惯拒绝如此微薄的捐税，当然他们已经被免除了这些费用，但实际上这使得他们从贪图小便宜中获取好处。要是我是军官，人们若是认为我会逃避这种对最贫穷的人民也适用的捐税，我会把这视作对我的侮辱。

我由此想到，被我们称作为“荣誉”的原始特质确实在人类中存在得太少了。难道我们在这儿还看不出来吗？一个对荣誉十分敏感的人类阶层在有关荣誉的事情上尚且可以完全依赖于社会风气与习惯，那当所有人都这么认为的时候，我们会多么轻易地忽略掉那些“个别”本不允许的事情。

---

1. 五芬尼大桥：Sechserbrücke，泰格尔海港大桥（Tegeler Hafenbrücke），俗称五芬尼大桥。Die Tegeler Hafenbrücke im Berliner Ortsteil Tegel, im Volksmund "Sechserbrücke" genannt, überspannt als Fußgängerbrücke die Einfahrt des Tegeler Hafens und die Mündung des Tegeler Fließes. Sie wurde 1909 als stählerne Fachwerkbogenbrücke mit einer Gesamtlänge von 91 Metern mit beidseits je zwei steinernen Kassenhäuschen erbaut. Heute steht sie unter Denkmalschutz.
2. 申克尔：全名KarlFriedrichSchinkel（1781－1841年），普鲁士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画家等。他的建筑作品至今都铸造了柏林市中心的形象。（译者注）

5.施特劳鲜花展（1840）

为什么人们都在跑？为什么他们纷纷涌入大街小巷？所有人都匆匆跑去美丽的施特劳地区了：跑向鲜花展，奔向盛开的风信子。我驾车排了半个小时长队后，才能在福斯特和莫福的大门前下车。在距那儿很远的地方，隔着许多条街道，就已经可以闻到风信子散发的香气了。在广阔如田野般的公园中，成千上万的人们熙熙攘攘，赞赏着巨大的风信子花圃，鲜艳多彩，各种色调交替变换。鲜花甚至还会被制作成高大宏伟的模型，例如一座植物寺庙，一个“铁十字勋章”或诸如此类的造型。在哈勒姆不可能有比这儿更多的花卉聚集在一起了，可正是这荷兰式的种植方式令人厌恶。当人们看到大量鲜花集中在一起时，就对鲜花的魅力不再那么敏感了。现在完全是为了塑造各种象征符号而滥用鲜花，她的价值就只剩下颜色了，鲜花本身的自由、独立和芳香在这种限定下都丢失了。

我的柏林市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怡然自得。在一座没有绿荫的花园里，炎炎烈日并没有把他们吓退。他们还把沉闷、咿呀作响的声音称为音乐娱乐。前面售票处还有抽奖活动，通常付上5个格罗申银币也只能得到一束在御林广场只卖4芬尼的花。为什么不以《鲜花抽奖》为标题写出一场漂亮的地方闹剧呢？在柏林，太多的“人民幽默”作家遍地跑，为什么这些人不编造点这样的趣事来提供给帝都的戏台呢？格拉斯布雷纳[注]先生写了些小册子，在书中他让柏林人用最矫揉造作的和最低俗的柏林粗话谈论各种各样离题万里的事情，来展现所谓的柏林人民特点；这样不行，只有在戏台上，通过对这种地方笑话深思熟虑的安排布置，人民作家这一职业才能经受住考验并得到证明。例如贝克曼就是一个十分受欢迎的人物骨架，人们可以把最滑稽

的段子放到他身上。我想象着，在《鲜花抽奖》中，他穿着绿色的园艺工作围裙，在温室入口旁分发奖品。他展开了抽奖号码：“女士，您获得了一条小小的、最近才在孔雀岛上被发现的植物的插枝，这植物还是从美洲引进的。”那位女士说：“我的天，这难道不就是一株带有沙拉叶的铃兰吗？”贝克曼会对此进行辩解并展现他的植物学识。最后可能通过这株花还能成就一段姻缘。如此瑟夫[注]先生为什么不会为它报上富有竞争力的价格呢？

---

1. 格拉斯布雷纳：AdolfGlaßbrenner（1810－1879年），德国幽默、讽刺作家。1832年至1850年间陆续写成的系列丛书《吃喝在柏林》（Berlinwieesißtund-trinkt）是他最出名的代表作。（译者注）

2. 瑟夫：KarlFriedrichCerf（1771－1845年），他从1824年起建立、经营柏林第一家私营剧院：帝都剧院（KönigsstädterTheater）。（译者注）

6. 笔记（1841）

菩提树下大街的虔信主义者

经过几天满是灰尘、异常闷热的日子后，终于下雨了。雨后，这个最美丽的星期日清晨吸引着一望无际的人群前往菩提树下大街。在已逝国王的宫殿旁我遇见了扣眼处佩戴着一枚勋章的男人。“多好的天气啊。”“多好的天气啊。”“上帝用一句话就创造出了这一切。我们人类的才智不可能创造得出来。”“很难。”“上帝是全能的，他的名字是伟大的，甚至是永远伟大。”“阿门！”然后，这个陌生人开始用强有力的声音和滔滔不绝的口才阐释人生来有罪的道理。在这个完全陌生的男人旁边，由于我的沉默与无动于衷，他恼怒而急躁地质问我：“我不知道，您是否能理解我所说的？”“完全理解！”“您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我听到了噪音，却看不见光明。”传教者对我这个朴素路人的回答感到很是意外，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然后离开了。回到家我在上衣口袋里发现一本赎罪宣传手册（瓦尔格穆特出版社印刷）。

空缺官职的候选人

每一个清晨最早的时刻，经过菩提树下大街、威廉大街到莱比锡大街散步时，都会瞧见非常感人而又滑稽的一幕。就在这个时间点，所有空缺和不空缺官职的候选人都想拜访有权力的部长和议员，而这些候选人来自所有可能的宗教、教育、法律和行政行业。他们穿着黑色西装，脖子上围着白色的领结，健步如飞地从你身旁经过，突然又

停下来，思考着一个已得到的答案或者一份要递交的申请书，再背诵下那些熟记好的言辞，这才靠近那扇危险的大门，却又犹豫不决，再次掉头返回让自己再休整下，最后才有勇气下定冒险的决心。他们正想要从酒店门口的右边走进去，在那儿却碰到从左边来的另一个人。然而只有一个空缺职位！每个人都以为，这么早来，那么他就可以独自见到有权授予职位的人，但是——可怕的错觉——整个接待室已经人满为患。就像一个终身问题，七年前就订婚了的未婚妻和渐渐变得不耐烦的岳父母一直期待着它的答案，而它在三十个其他男人的终身问题中和另外同样多的未婚妻的希望中显得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生存之道便在此展现，那些人生之路的坑洞和通道公开地躺在那里，精明的人们挖掘它的速度经常比安静工作的人们更快——这一幕让人哭笑不得！

施特格利茨的夏季剧院

施特格利茨的夏季剧院远远达不到杂志的赞美与观众最普通的期望！候选官员本希望寻得一个小巧的、由木材和砖头建成且与柏林的尊严相匹配的剧院。他却找到了一个不比仓库好的木板棚，里面有木制的长椅和一个楼座，这个楼座其实就只是个有护栏的顶楼而已。小小的房屋里热得让人不堪忍受，人只要一离开它，立马就变成了无拘无束的动物，被隔离的前院满是沙土，它的周围除了天空与地面其他什么都看不见。只要谁见识过一次这个剧院，就不会再去了。若是想要让观众的兴致在这儿得到满足，那就该按照汉堡露天剧院那样的典范来为此增添点什么。一个夏季剧院只有在露天环境下才能让人觉得享受，或者用石材建造来给予室内所希冀的凉爽。不言而喻，这样一处可怜的环境只会负作用于演员自身对表演的兴趣，观众会嘲笑他们，讽刺他们对表演的认真严肃。

柏林人民的特点

朝着成为一个内在与其外在规模相称的大城市的目标，柏林逐年取得了显著进步。各种设施，商业的、工业的、社交的，都比以前建造的风格更为宏大。一些三年前本地公众还在关注或从事的东西，如今都会被鄙视，例如所谓柏林人民文学的通俗性，它在《巴菲先生在艺术展》[注]一书中达到了瞎扯和最令人作呕的庸俗的巅峰。帝都的戏剧笑话在减少；曾经都是柏林人民特点的充满谎言的扭曲，如《吃喝在柏林》所描述的那些特点一样；现在柏林人原始的基本特点又渐渐从扭曲中显露出来：最善意的好心，对欢乐有趣的玩笑的兴致，对每个才智表彰的高度尊重，对简朴、而又不乏优雅的美景富有意义的享受；与艺术相结合的自然将这些美景赐予了这座首都，它一定还会有众人所期盼的那般卓越的未来。

---

1. 《巴菲先生在艺术展》：全称《巴菲先生在柏林艺术展》，德文全称《HerrBuffeyinderBerlinerKunstausstellung》，共四册，作者AdolfGlaßbrenner于1838－1839年间陆续出版。（译者注）

7. 柏林的道德堕落（1843）

去年冬天，每天都有在柏林被偷盗的新闻。当地报纸的报道使首都不安全这一情况不再是秘密。柏林的小偷们属于一个十分独特的组织，以致警察会通知居民们，他们不久将会被偷。被警告的居民们提心吊胆了十四天：第十五天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被偷盗。一篇《福斯日报》的文章说，晚上在最繁华的街道，通过架着的梯子甚至有人家的二楼都被盗了。要是每天不断读到这些控诉犯罪的新闻，人们肯定会相信，大部分居住在柏林的人都是无法向善的罪犯们。柏林现在完全被不安全感笼罩着，在从这种不安全感可以推论出这座北德首都的道德状况之前，人们必须要抱持正义去打击那些助长柏林偷盗行为的情况。我在柏林出生，自己也有一次被盗经历，我想我有权对这事发表意见，而此事也会渐渐引起每一个热爱道德与人民的人的关注。

监管的缺乏与房屋构造的缺陷都使得盗窃更为容易。守夜人的数量太少了。这些“城市卫兵”都是退伍的老军官或者其他应征者，他们从绝望中抓住了一份工作，就几乎只是在形式上去履行这份职责。柏林的守夜人大多都是体弱的老人。他们的工资收入微薄，就只好仰仗值勤的手续费。这份手续费就是特权收益，估计这样的特权在其他城市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柏林的守夜人有一串上百把的房屋钥匙挂在身边，为晚上十点后想要进入第一所最好的房子的任何一个人打开门。小费就是他的收入。可见，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跟柏林一样，小偷的行动可以如此方便容易。

守夜人的辖区太大了，他需要监管的街区远远多过了他能监管到的范围。忙着赚自己的小费，他对街区生活也很少操心。他只听得见，有人想要进入一所房子而呼唤他的声音。大约清晨的时候，守夜

人叫醒面包师起来烘焙面包，漫不经心地巡查一圈街道。他在具有保护性的“地下室通道”后面休息，那里是他舒适的安乐椅。当他巡查时，他的口哨就预先告知了他的到来，小偷就有时间在他经过时逃散了。

柏林必须要将守卫的人数变为三倍，像汉堡那样将他们置于军事纪律之下。汉堡的守卫们才是一支真正的护卫队，来对抗秩序与财产的敌人。

若是如前文所述，晚上柏林的房屋对随便任何一个造访者来说都是敞开的，那么在白天住宅也没有更安全。人们听说在巴黎有许多商店的欺诈、千奇百怪的诈骗，就像维多克(注)在他的辞典中所描述的那些骗局一样，但是很少听说有偷窃，更别说夜晚入室盗窃。柏林原本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现在已然成为了一座大城市。街道宽敞，地域宽广，房屋大多都是三层楼的，却只有少数家庭居住。没人知道门卫（在维也纳叫房屋管理员）制度，因为对此来说，这些房子太小了。这里没有进出管制，每个庭院都是敞开的，乞丐可以进入每层楼，一整天敲门声与门铃声不断。每个租客都很高兴可以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与世隔绝，不用担心隔壁那间公司会被全部偷光。前些年在柏林，当我整个房间都被偷个精光的时候，我的女房东竟安静地坐在隔壁房间，读着《施普雷河边的观察者》，织着长筒袜。

由于柏林不能完全改建，若是在以上方面如今还是不能做出改变的话，那么当局警惕性的提高可就越来越迫切了。如果没有一个新的守卫、巡逻组织，在柏林，财产被偷盗的危险性就会愈来愈大。

这个话题显然还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讨。所有的小偷都来自柏林，是柏林使小偷偷盗更方便了吗？由于道德堕落，我们每天都饱受其害，那道德堕落的源头在哪里？为什么偏偏在柏林有越来越多的堕落

事件呢？晚上乔装打扮好的哈伦·拉希德[注]走在大街上，若是他曾对巴格达有这些提问的话，那么他也会陷入深深的沉思吧。

也很有可能是小偷们发现柏林的守卫与房屋制度如此随便，于是许多外来的社会垃圾都移居到柏林了，但还是可以确定，柏林的不安全因素大部分还是来自于其内部。一些事情的发现与人民的特质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柏林，人民的本性就是堕落的，这是我们不能够逃避的悲哀现实。道德败坏像癌症一样腐蚀蔓延。家庭被破坏，除了贫穷与失业之外，还伴随着犯罪的倾向；对柏林人来说自身的大胆与鲁莽增强了他们下决心的欲望，也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定：要不断地去偷盗；从监狱中放回的罪犯并没有被改造好，而是在出狱不久之后，又另司法力量觉得有必要，把他再次抓进新监狱关上二十年，可他已经在那儿白白坐了五年。。人民群众有受过道德教育的，也有没受道德教育的，他们会在不久的将来尝到今天行为的果实。人们将来可为柏林当今的野蛮，从过去的错误中寻求原因。对这些错误的正确认识必须形成措施，来避免未来它们再次发生。我想要传递这种认识，即使将会遭受到异议，我还是想把我的想法公之于众。

从缺少高贵的精神财富和缺少值得信赖的公开的事实真相中，可以推导出道德堕落的第二个原因：孤立的享乐追求。维也纳也没有公开的事实真相，但是维也纳有结合在一起，不是孤立分散的消遣娱乐。这不是文字对偶，而是真正的实情，我要证明它对道德的影响是负面的。维也纳人在普通的快乐中得到放松，在所有人都可以分享的快乐中得到放松。维也纳的自然环境吸引着所有人，也满足了所有人。它的娱乐消遣方式自几十年前就已由传统习俗预先设定好了。音乐、舞蹈、戏剧，欢快地出游，去美丽的郊区。在柏林，一切都是孤立的。没有公共娱乐消遣来满足人们，所以就产生了辅助资源，野餐、封闭的团体、小型舞会，对“个人享乐”的追逐，小酒馆、糕点店和烟草店这些下等肮脏的场所。家庭成员们互相赶超，预订大餐和交际舞会造成的花费使得手工匠负债累累，当铺挤满了人，女性被唤

醒的欲望拽着男人堕入漩涡。在那里，他们不再控制得住他们的思想意识，很快也将会不再能够掌控他们的良心。当偷盗、犯罪团伙的成员从一个个的酒窖转移到同一个光鲜辉煌的舞会聚合时，此刻，在柏林，没人发现过他们吗？博兹[注]不会编造得出比这更震撼的情节，比尔希·普费弗[注]也描绘不出比这更露骨的场景。

这里若不是要谴责特别糟糕的行政体制的话，也许就是要谴责这一整个现代国家了。在我的巴黎书信中，我谈到过我们的政治。政治只会剥削、利用人，不会帮助人，去补偿他已被夺走的东西。我曾提议创建一个公共福利部，它必须致力于创造出积极的艺术文化作品，使个人在国家面前能够确保，想要取得丰收的农田也会得到播种。这就是一个新的目标，这样的一个机构一定得存在。破坏孤立的天性吧！为了大家的娱乐消遣，把大家互相联合起来！在这个创造发明的时代创造些东西！除了创造那些本已太多的技术与物质之外，创造一些精神上、道德上的东西吧！柏林缺少可以消遣的、令人心旷神怡的自然环境，那什么可以作为替代呢？什么能够使星期天那成千上万漫不经心散步去勃兰登堡门的人聚集起来呢？当夕阳西下，倦鸟归巢，而人们又不想独自在家面对四壁之时，市中心的夜晚又能够提供些什么呢？再好好考虑一下吧，你们这些深思熟虑的政治家，你们现今在柏林手中可掌握着船舵！不要施加给人民由警方制定的热闹场面，唤醒人民的欲望，自己去发现诸如此类的倡议，或去听取陌生人提出的倡议。请尊重公众的喜好！不要禁止公众游行，像四年前在柏林的印刷工人节那样的行为令人深恶痛绝；让人们得到人性的宣泄，那么他们就不会在洞孔般狭小的地下室里蠕行，如同动物般苟且。使人民变得高贵的最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戏剧。我记得我在巴黎书信中记载了基佐[注]所说的一句实话：“经常去剧院，能使下层人民所有坏的欲望都得到清除。”柏林的歌剧院很少作用于道德，归功于前任国王，剧院充满了私人性质特点，对柏林来说，它正是这么多堕落的发起地。帝都剧院在内斯特罗伊[注]的闹剧和出色的意大利歌剧之间没有中庸之

道，靠这些意大利歌剧，鲁比尼(注)每天晚上能挣到800塔勒，每个座位的价钱也涨到了三倍之多。在维也纳和巴黎，剧院是十分善意的道德杠杆，但在柏林，却是一个无法使大众兴奋的艺术机构。要么必须下决心将柏林的宫廷舞台改造为人民舞台，要么允许建造城郊剧院，一个在科佩尼克旷野地区，另一个朝向新的汉堡大门方向。暂时只要有两所这样的剧院，好好管理，剧本方面完全解除限制，再加上便宜的门票。当然，还得废除已经存在的所谓票友剧院。这样的两座人民剧院会对柏林的道德改善带来引人注目的影响。

终于说到第三点，就是人民教育本身和宗教信仰。对于前者，倘若通过学校教育可以达到，那在柏林也是可能得到充分保证的。人们赞扬前届政府的学校教育系统，或许并非毫无道理。但这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知识其实并不能够净化道德。它有时倒不如说是使人更加诡计多端，只会让人更为精明巧妙地犯罪。算术、阅读与写作并不能够创造一个有道德的人。在柏林，坚信礼(注)的课程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开展。“行坚信礼”较精神上的行为而言，更多是一种公民行为。接受坚信礼的人群众多，但是牧师在所有地方，当然还有这里，都缺少其全体教徒强有力的监督。在一个这么大的城市，在言论压迫的特权中，这样的监督很或者说完全不可能难达到效果。教会有尽到他们的职责吗？宗教是被如此传教的吗，它真能够崇高、深刻地影响公民道德？

这可又是一个重要而特别强有力的关键点，上届政府的缺陷在这点上暴露无遗。没有，基督教在柏林没有起到它本可以有也应该有的作用。在柏林，人们以这种方式传道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可以使个人获得无上的幸福与极度的喜乐。也有真正的虔诚存在于柏林。有许多集会，比起教会，人们可以从中更多地提升修炼自己；也有些教堂，布道者在这里鼓吹，温暖的、净化天堂的基督教定会为许多家庭幸福带来最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但是什么才能够从基本上作用于我们这个虔信主义时代呢？拯救了一名羊羔般的迷途者，但事实上是为

了吸引更多因罪恶而悔恨的人？当我们看到，在柏林的一切都已成为私事之时，那么基督教也会在这里成为一件私事。一些布道者，例如库阿德、施特劳斯和阿恩特，他们的信众很多，这些信众都是有着虔诚灵魂的人，坚信基督的人，而不是那些为了基督教的真理而仅仅被灌输的人。人民大众都不去教堂，若是神学的激进主义能使他们不太困难就获得美德的话，他们才会去。在教堂里，该给一个新人穿衣，而不是用新的布片缝补在旧的衣物上，不是换汤不换药，而是使其成为一个完全新生的人。这样的基督教永远不会对人民大众产生影响，这种人性的改善方法需要宗教的英雄精神作为前提，而英雄精神只在少数一些入选者身上才能找到，宗教是人民道德生活的第一个弹簧，所以在柏林的宗教也源自于超宗教，并且没有什么有效的作用。

为了提升基督教在一个国家普遍性和道德性上的影响，基督教就必须要么对巫术发挥其作用，例如通过天主教中形式礼拜的神秘魔术，要么化简单朴素和有说服力的温暖为道德的基本真理。一个新教国家为了他的道德目的，只有当它给那些布道者提出将明确的、充满感情且动人阐释的理性主义作为条件时，才能够指望基督教协助的力量。宗教就正如同诗作一样。对文化人来说，也许克尔纳[注]、提特格[注]和其他类似的人才属于末流，但是大众却认为他们的修辞很漂亮，反而不理解为什么诺瓦利斯[注]、布伦塔诺[注]，当然还有歌德，更为吸引我们。当大众向空洞的套话欢呼之时，就已经丢失了他们富有内涵的思想。如此，基督教中的思想家和感情主义者可能会探讨与研究更深层次的关联：基督教作为宗教，作为道德的助力，只有通过其极为动情的道德基本真理上富有才智的收获，才能发挥作用，而这收获还需一位有品位与口才的演讲者表达出来。若是谁想要做我的布道者，那他就不能够在布道坛上阐释他的辩解理论，再生说、补赎说和虔信派教徒常见的论战。如果在柏林也有富有智慧和善于辞令的民族主义神职人员，像汉堡的施迈茨、奥尔登堡的伯克尔、法兰克福的弗里德里希、莱比锡的郭特霍昂、哥达的布雷施耐德那样的，如果人们没有

促成这样一个尽是垂头丧气的年轻人的小集团，而是创办一所学校，里面有真正使人性高贵的、有才智的、年轻的讲道者，那么教堂就会涌入更多人，监狱也将会更空了。

也许有人会反对腓特烈·威廉四世，随便他们怎么想吧，但这点是肯定的，他想要以伟大的风格统治他的领土。这里要是确实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完成最伟大辉煌的创造就好了。

后记：

读者们会注意到，在《柏林的道德堕落》这篇文章里只谈到弊病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原因，并没有提及到第一点原因。第一点原因以前任国王统治下的政治和公开性缺失为根据推导而出，然而在临近本册书印刷前，由于被提出的顾忌，更为详细的阐述就必须得被删除了，每个内行人都会猜想到这顾忌的本质是什么。为了至少能建立起这篇文章的逻辑条理性，那就这样吧。

---

1. 维多克：全名EugèneFrançoisVidocq（1775－1857年），法国著名犯罪分子与犯罪侦查学家。（译者注）
2. 哈伦·拉希德：Harunal-Raschid（约763－809年），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第五代哈里发（786－809年在位），其统治期间，为王朝最强盛时代，首都巴格达成为了世界第一流的城市。《一千零一夜》中也包含了许多以他为原型的故事，他会乔装打扮到街道市集上游荡，以便考察了解人民实际生活状况。（译者注）
3. 博兹：Boz，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CharlesDickens）笔名。（译者注）
4. 比尔希·普费弗：CharlotteBirch-Pfeiffer（1800－1868年），德国女演员与作家。（译者注）
5. 基佐：FrançoisGuizot（1787－1874年），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作家，1847－1848年任法国首相。（译者注）
6. 内斯特罗伊：JohannNestroy（1801－1862年），奥地利戏剧作家、演员。（译者注）

7. 鲁比尼：GiovanniBattistaRubini（1795－1854年）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8. 坚信礼：Confirmation，或称坚振圣事、坚振礼、按手礼，是基督宗教的礼仪，象征人通过洗礼与上主建立的关系获得巩固。现时只有罗马天主教会、东正教会、圣公会、循道卫理教会等持守。（译者注）

9. 克纳尔：TheodorKörner（1791－1813年），德国诗人、剧作家。（译者注）

10. 提特格：ChristophAugustTiedge（1752－1841年），德国诗人。（译者注）

11. 诺瓦利斯：Novalis（1772－1802年），德国早期浪漫主义作家、哲学家。代表作有诗歌《夜之赞歌》和未完成的小说《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等。（译者注）

12. 布伦塔诺：ClemensBretano（1778年－1842年），德国作家，海德堡浪漫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译者注）

8. 公共精神（1844）

柏林以前只是一座大城市，现在成为了国际大都市。居民人数直线增长，城市规模惊人扩大，然而柏林显著的进步并不仅限于表面的扩增。进步还表现在：眼界的扩展，不仅仅是街道与新城门的突破，还有传统偏见与习俗的突破，增多的精神运营资本，自我意识的提高——这种自我意识善于与广大的、道德的民族生活建立相互联系。这多么令人吃惊，打盹的力量都在渐渐苏醒过来。由下层开始，在上层最理想的高度终止。柏林以前缺少的铁路交通，现在终于把柏林直接与其他大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了。曾经与柏林铁路相连通的地方只有波茨坦、勃兰登堡、特洛伊恩布里岑、柏林附近的贝尔瑙，现在又有了莱比锡、马格德堡、波罗的海，马上还会有汉堡和西里西亚。过去的小城市思想消失了，更大的旅店建了起来，更宽广的维度成为了从事所有共同事情的基础。此象众人皆见，惊叹于此，或者至少对此喜笑颜开。人们在外地的报纸上读到关于柏林目前的日常报导，都不是编造的，而是事实，被细致讨论的、鲜活的事实。在这里，政党与政党之间，人与人之间都确实能面对面。

在这里，公共精神确实已有所发展，时至今日公共精神不仅高贵、值得尊敬，而且是缺少持续和充满活力的“器官”，这里我指的是实际的制度机构，他们的拼搏精神与渴望都太强大了，以致我们一瞬间会以为自己置身于朝巴黎努力发展的凝视中。现在的柏林大概就像是复辟时期的巴黎。讲坛就是临时的民众领袖，就是科学与临时政治，它起了多么波动起伏的推动作用！没有一种意见是想要独立存在的，一种努力追求倚靠其他的努力追求。在柏林住着，却无所作为，无所表现，无所代表，那就是精神死亡，就是毫无价值，至少说是毫

无价值，人人都担心害怕它。人们已经开始去感受公共性质特点的意义。可以看到，老流派中最享有盛誉的名字也与年轻学派中上进的后辈相互交流。没有人敢，与大众脱节。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围绕自己，必须寻求依靠。若他自己不能成为聚焦点，那他也可以顺应别人和成为别人举办的沙龙的常客。柏林有他自己的沙龙，实际上是法语词义上的沙龙。我甚至竟得这么想，在柏林想要有自己的意见，就得花钱。若是有人为了在此有一个完全彻底的公共性质特点，那他就必须在周三、周五甚至周二都混迹在公众的视线内。在这里同蒂克[注]、格林兄弟，还有萨维尼[注]先生一起竞争，这花费就太高了。人们肯定希望，想要不久将会有一个可以充进气体的气缸提供给抱负、意图、愤怒、鼓舞和复仇的气流，在爆炸之前，通过任何一个真相，通过任何一个事件，通过任何一个尤其是等级制度废除已进入轨道上的前进脚步，排放向公共的、广大的人民生活。这样的气缸或者任何其他什么东西必须被创造出来，为了给意见与热情之间的竞赛提供美好的、更高层次的真理，为了能够防止这样的毁灭现象，例如现在，由于悲哀的《格林兄弟声明》[注]，毁灭已经开始出现了，通过这份声明，两个著名的名字丧失了人们对他们的旧爱与热情。

一些在旅途中感受到的印象在此描述得可能会有些错综混乱。

在三月二十九日，蒙特博士在来自各界的听众面前进行了一次报告演讲，这次演讲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问题。那时是五点钟。在菩提树下大街的雅格仕楼的大厅里，聚集了柏林绝大部分的美学创造者、诗人、学者、音乐家、信徒和检阅者、坚信者和质疑者，更何况关于这样的一个课题，公共的探讨在某些领域肯定会出现令人充满疑虑的地方。当大概有150人到场的时候，演讲人出现了。这次的演讲让我想起了埃德加・基内[注]在法兰西公学院的演讲。只是很遗憾，蒙特太依赖于他的演讲稿，对于一个如此能够深入人心的课题，脱稿演讲才更具有说服力。演讲者并不缺乏热情，然而他的每个手势都泄露了其目的，他想要把他所读出来的东西展现成源自于他内心最深处的思

考；但是我却不能压制这样的评论，这个本身就条理紊乱的演讲，句法结构前后不一，多次重复，奇怪的修辞尝试造成了所有理解上的障碍，尽管如此还是比一份写好的稿件要更令人信服一点。

演讲的内容唤起了最热烈的参与。演讲开头也并没有给那些研究当代社会学的人提供什么新鲜的内容，然而在后续出现了一个小高潮，聪敏的诗人和严肃的思想家在他体内融为一体。演讲者说到了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责任。他论述了关于贫民状态的引人注目的课题，贫穷状态如今只会吸引所有写作者著书立说，但愿不久之后也会引起所有人内心的关注。可见，那个法国人研究社会问题的著作中这种感人的仁慈，在演讲者的心中也引起了共鸣。演讲者说起社会的无产者，态度温和轻柔；尽管他有些冷漠，有些偏执的自满，但是在某些庄严的时刻，他的面容上仍然会映出人性和哀伤的美丽余晖。他还特别说到，由于现在人民教育的进步，父亲可能会为从学校上完课回家的孩子仍在继续学习而感到羞愧，他就是这么巧妙风趣地抓住了这一点来评论，多么柔和且真挚啊。

对于有一些地方，我同演讲者的看法并不一致。他提到了欧文[注]，虽然带着敬佩说到了他，但是并没有对欧文表现出足够多的赞赏。他不断地说到欧文提出的社会制度缺少诗意。在社会问题上，诗意是一个危险的词语。若是人们太过频繁地使用它，那么就会走到最后没有比贫穷更诗意的东西存在这种地步了，但是贫穷确实应该被补救。若是谁想要非常精彩纷呈的生活，那普通的幸福目标当然对他来说显得没有诗意。在这位值得尊敬的演讲者的表述中，一些其他的问题让我感到忧虑，关于物质社会问题的话题，本该有作用于其他领域的、各种各样的评论，那些我认为是非常确切、非常合时宜、非常坦率、且在已知情况下独特大胆的评论，却更多地只属于理想的范畴，似乎这种观点是以以下理念为前提的：人们可以用阳光来喂饱饥饿的人，可以用花朵的颜色来为口渴的人解渴。演讲者知晓实际的伤害，想要治愈它们，但又逃避了实际的物质领域。然而避开这种异议不谈，因

为这样的异议可能本来就是基于误解之上的，蒙特的功劳在于，他用直接的形式，用演讲的形式，为这样的课题研究带来了话题，这个课题也将会在讨论中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也将会使那些世界性的、神学上的哲学思想感到羞愧，这些哲学思想在抽象概念的织布机前，只是为生活纺织出了裹尸布……

---

1. 蒂克：LudwigTieck（1773－1853年），德国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译者注）
2. 萨维尼：FriedrichCarlvonSavigny（1779－1861年），德国著名法学家和普鲁士国王顾问，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译者注）
3. 《格林兄弟声明》：1844年2月24日，柏林大学生在火炬游行之时为柏林兄弟同时也为偶然在那里的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HoffmannvonFallersleben）高声欢呼。后来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被驱逐出柏林。1844年3月6日，格林兄弟为与被判禁止工作的霍夫曼·冯·法勒斯雷本保持距离，在《普鲁士汇报》上发表了此声明。此事件在公众中引起了轰动。（译者注）
4. 埃德加·基内：EdgarQuinet（1803－1875年），法国作家、历史学家。（译者注）
5. 欧文：RobertOwen（1771－1858年），英国企业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9. 柏林之谜？（1844）

这太有特色了！本地报纸上的一篇名为《给马车夫的清晨礼拜仪式》的提议吸引了我的目光。真的，这篇提议没有掩盖它的出处！虽然首先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个犹太人（大型租车机构的拥有者），却也很有特色；那些投机的犹太人，那些领会时代精神的犹太人，在这里努力做有利于超基督教的事情：为马车夫举行清晨礼拜仪式！人们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们已慢慢发现，马车夫从早上一直到午夜都必须为他们的顾客和东家服务。即使是星期天，他们也不得休息。为了使他们不要遗忘教堂，丢失信仰，现在到早上，当他们洗车的时候，当他们给马匹上马具的时候，可以让他们快速地与一位特意设置的“车夫传道士”作宗教上的短暂交流。听到这样的事，人们会以为这是在英格兰，或是宾夕法尼亚发生的呢。想要坚定不移地实施这样的建议的话，还必须得在为马车夫举行的晨礼之后，安排下列仪式：

1. 为邮递员举行清晨礼拜仪式

2. 为牛奶拉车夫举行下午礼拜仪式；因为这些车夫每个星期天都将牛奶带到城市里。

好了，我认为，要是马车夫能够适应教堂，那也是值得期盼的；那个超基督教的犹太人，很可能也是一位商务顾问，他对理性与公正的全面认识难道不能找到另外一条出路了吗？像现在，在马车棚旁还没有设置礼拜仪式之时，或许每个马车夫还有可能，会每十四天或者至少每四周有一个星期日可以放半天假，在这半天假期的星期日里，他是不是就可以去教堂了呢？商务顾问的红利是否会不允许这样做？

你们对马车夫的灵魂有那么大的怜悯之心，为他们是否能做礼拜而担忧，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给予这些辛苦操劳、跟他们的车绑在一起的人们一天的休息时间呢？你们可不可以让他们从桎梏中解脱一下，并建立起一个能提供午间娱乐与下午消遣的股份制协会呢？本地的超基督教徒没有强制商务顾问给每个马车夫轮流每十四天或者每三个星期一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让马车夫作为自由的人、基督徒和国民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星期日的休息时间，而是忽略了马车夫掌管者特权的滥用，认清了马车夫没有空闲星期日的事实，就只需要担心，车夫们从车棚出发前的早上，是否有人会去向他们传授福音！噢，虔诚的商务顾问啊！

若是宗教的狂热没有界限的话，那么我们还会经历最病态的现象。对星期天过分的神圣化会变成真正旧约式的束缚。例如某人根深蒂固般认为的，在星期天行驶的火车，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就不能去教堂礼拜了，那你就不能对一个这样的人呼喊道："上帝保佑你不要如此荒谬！"此外，宗教的狂热还关心着穷人和病人，它要求我们有最完美的崇高敬意，它如此接近于纯粹的博爱信条，以至于或许不能够探究出它奉献、牺牲和爱的源头；但是如果对穷人的救济是惩罚性的，那么人们自己在面对超基督教意识的、能使其本身得到尊敬的表述时，就要冷静下来；病人的看护是麻烦的、令人害怕的，它就在身体的病痛之间对我们诉说着我们灵魂的堕落。

这里，仁慈的基督教将会有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大多都还停留在纸面上，也有一些已开始付诸实践，例如拯救失足少女的玛格达勒慈善机构。关于这个慈善机构，从以往的所见所闻来讲，并不能够推断出其本该值得尊敬的意图是否会被全面地、强有力地执行。这群不幸的人被他们的服饰出卖了身份，若是为了使这些人能够获得更稳妥的改善而指出一条路的话，那就只有这一条路：让她们以尽可能无声息、沉默而仁爱的方式回归到社会中。有人投入到玛格达勒慈善机构的怀抱里，然而黑色的服装可能会使其身后的门永远

被关上，肯定还会出现类似卡尔特会僧侣般听天由命的念头，但是太少的人能够承受得住最后仅存的骄傲如此被泯灭！最后仅存的骄傲——正是你们首先想要打碎的，它只不过就是种子，但从这粒种子里，有道德的人可以绽放出崭新的花朵。这样一个机构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美好完善，不应该制造改善的、重获生命的迷途者和伪善者，若是这样的话，那她们只要被轻微引诱，就会再次误入歧途。那什么才会是终结呢？

通过在这里观察到的一切，便可得知，人们在这里能对当今社会扭曲的原因有更多的认识。人们能够看清这些原因，是因为人们感受到了它们，因为它们自身太不易被击退并强硬地存在着。但是人们用错了消除社会危害的措施。人们想要立刻直接面对这些危害，而不是等到发现这些危害的重要源头后，再在那里消灭它们。必须要去发现原因的根本，并将啃食其根的蛀虫杀死。对畸形树干上的枯叶浇水，勉强能够使其短时间内维持生机勃勃的表象，但是之后，它就会渐渐死去并凋落，因为源自于根的生命的香脂和健康的树液，没有足够多地输入到叶子中。

泰奥多尔·蒙特(注)在最近的演讲中说，我们的时代在疯狂追求着“幸福与娱乐”。我惊讶于他没有用更多的叙述来反驳或者假设这个事实，而只是把这个事实作为一个肯定句，也很可能作为他早期研究的前提提了出来。然而为了反驳他，这句话很少被拿出来对质。因为这句话是正确的，它已经被证明了；不仅仅是富人的奢华证明了这句话，穷人的熊熊欲火与断念无能也证明了它。在消遣娱乐中最不能得到满足的是中产阶级。幸福与娱乐比以前更多地成为了柏林人的箴言。各式各样供消遣的公共和私人场所急剧增多。为了吸引人们去娱乐消遣，天天都有比一打还多的纸片张贴在街角。同时，人们纷纷涌入一些能让人放松的食品店，在那里人多得一点都不合比例。以前，谁要是不知道经营什么样的行业，就开一个烟草店。现在，除此之外还有了咖啡馆、游乐公园和糕点店，这些建筑设施以同样的速度迅速

拔地而起。在这里，像流行时装店、布店、礼服店和小商品店开张后，老板自己并不经营，而是让别人来管理。在花天酒地的娱乐消遣中还有贫穷与不幸的困境，贝蒂娜(注)在她的国王之书附文中通过一个仁慈的瑞士年轻人也将此困境描绘了出来——多么强烈的反差。

在别的地方这种反差会更强烈。在别的地方，人们感到震惊的是，在这需求紧张的现实中，在这本地贫穷化意味深长的描述中，克罗尔什娱乐场怎么可能就这么突然地出现了。我得承认，当我走进这个被所有报纸谬赞为童话宫殿的地方之时，我不禁厌恶地想，这座楼建造得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幸好这座“童话宫殿”的名声也没有那么好。如果你的视线能够穿越飞扬的尘土，那在很远的地方你就能瞧见，这整栋楼像一座巨大的砖舍。看到这座由烟囱和凸出来的屋隅组成的混杂物体，第一眼印象就会感到恶心，而不是舒服。再者，把这样一个所有陌生人都可以进入的场所建造在柏林的要害之处，把这样的撒哈拉沙漠建造在练兵广场，我们都对此想法感到愤怒。柏林的尘土，曾由于令人喜爱的动物园的建造而被人遗忘了，但现在它又来势汹汹地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使人眼睛难受，让人不堪忍受；这是因为灰尘的摇篮正好就是这座新建筑建造的地方。一进入这座楼，它的一切都显得有缺陷、僵硬而苍白，这个轻浮的东西，估计就只是为了哗众取宠。人们可以一眼就将这个巨大的“跑马场”尽收眼底。没有花样的变换，没有宁静舒适的隐匿之处，没有独处的可能性。裸露的白色木质墙壁，虽然用金色的线条来装饰，在有些地方还绘着画，但是没有帷幔与帘幕，整个地方一览无余。在巴黎大剧院的化装舞会上，令人赏心悦目的并不是那宏大的舞厅，而是在楼梯上、走廊上、门厅里和各种设施里身着绚丽华服不停穿梭的人群。而在这里，除了少数的一些包厢外，都没有这样的惊人之处。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巴黎没有这样的一座娱乐场所；但是还必须得说：若是在巴黎的人们也变得这么肤浅的话，仅仅为了坐在那里，让身处其中的自己与置身其外的旁观者张目呆视而建造一座这样的娱乐场所，那他们必须变得更加伟大、有品位、有特色。在这座无聊的“寺庙”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叫

“地道”的地方，其实就是个吸烟室，在伦敦找不到比它更阴暗、更脏乱与更令人窒息的地方了。大家都认为，《巴黎之谜》[注]的开头可能就是在这里取材的吧；我们自认为踏入了书中的“小酒馆”，大家都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寻找那个“女怪物”。当然《柏林之谜》也可以在这儿开篇取材。有这样的文章吗？已经有好多这样的文章出版了，舒巴[注]第一个出版，他的书现在已经是第三版了……可惜，有创意的人不会轻易地做决定，去踩别人走过的脚印；但这或许又是值得期待的，有人能像尤金·苏席卷法国文学那样，席卷德国文学。难道最后不就是苏模仿博兹，博兹又模仿几百年前古老的幽默小说吗？《柏林之谜》肯定会让刺眼的强烈光线洒落到德国的道德、社会与人文各方面，肯定会将启蒙运动的火炬举起，不仅仅是照亮隐藏贫穷和罪恶的地下室穹顶，还有假象与虚荣，谎言与虚伪的浑浊、阴暗区域……

---

1. 泰奥多尔·蒙特：Theodor Mundt，1808 －1861，德国文学评论家，小说家。
2. 贝蒂娜：BettinavonArnim（1785－1859年），德国女作家，德国浪漫主义的代表。著有《国王书：这本书属于国王》（DasKönigsbuch:DiesBuchgehörtdemKönig），此书附有一篇短文《一个瑞士年轻人在沃格兰地区的经历》（ErfahrungeneinesjungenSchweizersimVogtlande），描述了德国产业革命初时，社会底层人民的贫穷与疾苦。（译者注）
3. 《巴黎之谜》：LesMystèresdeParis，其作者为法国作家尤金·苏（EugèneSue）。（译者注）
4. 舒巴：笔名L.舒巴（L.Schubar），原名RudolfLubarsch（1807－1883年），在1844－1845年间出版了12卷的《柏林之谜》（MysterienvonBerlin）。（译者注）

10. 印象——例如：博尔西希㊟（1854）

柏林的街道越来越多，人口也增加了不少，但你在晚上九点钟到达安哈尔特火车站时，却只看到从威廉大街到菩提树下大街也就仅有一辆马车在行驶，甚至宽阔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看着就像一条绵长的坟墓大街，你大概会以为自己身处赫库兰尼姆或者庞贝古城呢。五辆马车从铁路那边摇晃而来，随后跟着两个走路的人，一个在右边的人行道，另一个在左边的人行道。偌大的城市，却如此寂静，真是奇特。御林广场笼罩着一片庄严的肃静，剧院则像幽灵一样独自伫立在那里，也许里面正鸣奏着好几百声部的返始咏叹调。至少有戈尔德施密特的妻子——珍妮·林德㊟这样的歌手曾在它的音乐厅里演唱过。

若是一个人来到柏林之前，没能借助电报向菩提树下大街的任何一个旅店老板提前通知他的到来，让他们为自己适宜地准备好一间在二楼的套房，那么在这个知识之都，他就会对下榻之处如此乡村式的简陋感到难以理解与不满。住宿费用可谓是与时俱进，但是房间设施却很简陋，家具从一切可能的拍卖中买来拼凑在一起，装饰显露出一半某种表面上的华丽和一半由于过度使用而产生的剥蚀。比如说，地板上不可缺少的油布，再次突出了柏林舒适设备的贫乏，更别提那些狭窄的床和百磅重的羽毛枕头了。在这个热爱光亮的城市里，很少见到双层窗户。在这些方面，柏林的人们总是十分了解它的古老特色并且满足于此，对此，只要柏林人文精神上的建树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就行。

雨雪、风暴与严寒使得柏林的广场与街道上大面积的污泥看起来加倍的恐怖。水面一望无际。菩提树下大街的马路清洁工把十分奇特的、完全呈糊状的物体扫到了一起，众所周知，也就只有在柏林或者

还有柏林附近，第五种元素(注)才有可能从街道污秽中创造出某种雕塑。流动着的熔岩逐渐冷却，从克兰茨勒咖啡馆到胜利女神酒店，它们每个小时都会被清扫到一起，难道不正是从这些熔岩、街道灰尘中，艾希勒的雕塑作坊才能制作出陶器吗？针对冰、雪和尘垢的警方规定，这里并不缺少关于其如何实施的规章制度。在每一处繁华热闹地区的街角都有一名警察站岗，依照普鲁士君主国的特色，他主要作为一个斯巴达式的、只是戴着武士头盔的人，关心着公众的和平。然而，头盔的革新本不应该走得太远太过，头盔也本不该随处可见。能够佩戴头盔，是一种荣誉，幸好现在又不再允许马车夫戴头盔了。

近些年来人们一直在装扮美化这座城市，其中一处的装扮跃入了我的眼前，宫殿桥的花岗岩立方块上的立体雕像，如今它们终于完工了。那些赤裸裸的立方块大概屹立了有二十多年了吧，一直在静候着它们未来的命运。为什么人们起初都不曾想瞅它们一眼呢？圣人和先知，猎豹与雄狮，著名的将军和饱受考验、警惕的首都司令官。从希腊式的观点来讲，如今“武士的生命”就是由以上这些元素组成。有许多人抱怨雕塑群逼真得太过于厉害，无论这些抱怨是否有理，现今的徒步漫游者对它们还不能够做出正确的评价。暴风雪阻挡了所有的视线，简陋的人行道使得路面变得狭窄，地面太湿了，以致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会滑倒，这样就可以舒服地仰望笼罩在白色大理石雕塑群上方的爱奥尼亚的天空了吧。这些可怜的武士看起来还是习惯于希腊的平原，他们作为摔跤手在那里的尼米亚竞技会上赢得奖赏，而如今，厚厚的雪积满了他们的肩膀，成为他们的肩章。人们以为，他们都被冻住了，对他们产生了些许同情。显而易见，他们按照近卫军中最俊俏的卫兵模样而被雕凿出来；显而易见，他们通常并不是一丝不挂，而只是在柏林的艺术工作室里，在供暖良好的火炉旁恰巧偶然地被脱去衣物罢了；显而易见，他们的托寓(注)只是针对普遍义务兵役制，一年和三年的服役期，演习期，出征行军，还有光荣的勋章或职位所带来的有限成就。胜利女神巨大的翅膀是否仍与希腊有善意的关

联，已经令人怀疑。近段时间以来，在这里，人们已将胜利女神的翅膀塑造成固定呆板的新普鲁士形象，也就是说，用它装饰智天使[注]：这些基督教的胜利女神，她们在瓦赫[注]的画中保护耶稣圣墓，她们守卫着通往宫殿穹顶祈祷室的大门。除此之外，她们现在也已逐渐成为城市中常见的装饰物，甚至是被用于商业用途。这些与其说是古希腊罗马的智天使，不如说是基督教的智天使，给武士们戴上了桂冠，并唤起人们联想到现代正在履行其义务的年轻卫国者。那么柏林人对这些被冻结起来的服义务兵役者产生同情怜悯，并多次表达出想要给他们送去保暖的大衣与长裤的愿望，看来并不完全毫无缘由。人们只是不公平地抱怨这些太过于逼真的人物复制品。这些年轻的步兵们站得太高了，花岗岩立方块上方还有那么巨大的一个立方体建筑物，以致年轻的女士参加完在大教堂的布道会后路过这里时，看到宫殿桥上的这些现代希腊人，会感到不快，还很可能会觉得十分好奇……

柏林的街道、房屋、人口和各种形式的工业企业都大幅增多。在这个地方，我记得，曾与玩伴们躺在草地上，拽着风筝线嬉戏玩耍，现在却是有人与某位房屋女主人坐于此，喝着茶，谈论着歌唱学院学术性的大课。以前蓝色矢车菊绽放的田野，现在矗立着一座座宏大的厂房，耸入云天的烟囱被熏得漆黑。柏林的工商业发展壮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令人赞叹，例如，有一位受自然与幸运喜爱的人才——机械工程师博尔西希，为了能够同时管理三座位于城市不同边缘的大型工厂，我们可以瞧见他的圆形贵格会教徒礼帽下令人印象深刻的、肥胖的身躯，乘着一辆小小的马车来来回回地忙碌奔波。有三千人在博尔西希的三个不同的工厂工作，其中在莫阿比特地区附近的大型轧钢厂看起来就像是火山的巨大车间。博尔西希工厂那里有120马力的压路机，现在正在制造第五百辆铁路机车。博尔西希企业仅仅通过机车制造就能有六百万塔勒的营业额收入。博尔西希个人觉得，有必要将其事业所取得的幸运成功带到对艺术的资助中，而且这类资助恰好符合柏林的审美品位，并支持了国王的艺术事业，如此，这些作为给这个

富有的人赢得了荣誉。他建造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别墅，还监管料理着一座艺术园，这座艺术园大得可以邀请所有柏林人前来参观园里绽放的王莲。

在某些特色工业领域，柏林的一些企业形式至少在欧洲大陆还没有找到与其相同的。在西里西亚门前，赫克曼的铸铜厂便建造于此。这里能锻造出甜菜制糖厂所需要的那些巨大真空罐，拉制出电报机所需的铜线。赫克曼直接从英国、瑞典、尤其主要从俄罗斯采购原材料。拉文内从事的锻钢、铅、黄铜、锡和所有金属粗制品贸易，其交易量同样十分可观。拉文内有一次突然心情大好，把波尔多地区出售的葡萄酒全部买下了，作为私人的娱乐消遣，他还树立起了卓越而又稳定的葡萄酒商店典范，在他看来，这样的葡萄酒生意在柏林很有必要，这就刻画出了柏林批发商的性格特点：他们不能够放弃其原始的、单纯小市民的欲望。戈尔德施密特和达嫩贝尔格尔运营的那些平布纺织厂，有数以千计的人都在那里工作，相当于一个小市区的人口，除此之外，这些工厂还包含着导致贫困化而且需要被审慎处理的因素……

---

1. 博尔西希：由德国企业家奥古斯特·博尔西希（AugustBorsig，1804－1854年）于1837年在柏林建立的机械制造企业。（译者注）

2. 珍妮·林德：JennyLind（1820－1887年），瑞典女高音歌唱家，有“瑞典夜莺”之称。1852年嫁给了德国钢琴家奥拓·戈尔德施密特（OttoGoldschmidt）。（译者注）

3. 第五种元素：四元素说是古希腊关于世界的物质组成的学说，包括土、气、水、火这四元素。此处作者用第五元素表示未知物质。（译者注）

4. 托寓：（英语：Allegory，来自希腊语的αλλος与αγορευειν，解作“公开演说”）是一种有比喻性质的表达方式（representation），把语意（meaning）而非字义（literal）的意思表现出来。一般而言，会被当作一种表现性的修辞手法，但它不一定必须以语言的方式出现。反之，经常以视觉上的方式示人，例如现实主义的雕塑、绘画（寓意画），以及其他的模仿或者其他表现艺术（representative art）。

5. 智天使：Cherubim Schmuck，是个超自然的生命个体，屡次在旧约和新约·启示录中被提及。它旧约中被描述有翅膀、服从上帝的天物。

6. 瓦赫：全名KarlWilhelmWach（1787－1845年），德国画家。（译者注）

11. 胡扯、克罗尔什剧院和《萨塔内拉》㊟（1854）

有一个词语，只有在柏林的人才能够理解它。然而也只有针对在柏林产生的一些现象，人们才会用它来描述。就是这个词：胡扯。

胡扯是幽默的开始，它只是停留在幽默的一半，因为人们总是把勉强算是理性的想法和严肃的批判看作是健康理智还算过得去的表现，那么当然，胡扯还不及理智的一半。这一半的理智常常很神秘，它的神秘在于对其自身除了有某个关键点之外，通常还含有一种逻辑。但是那一半的幽默却很糟糕。它是绝对的虚无。它原本是想要表达出一些风趣别致的东西，然而却在扮鬼脸的行径上沦陷。它扮出了狡黠的鬼脸，所言之物却很愚蠢。胡扯绝不是玩笑。或许在某些情况下，玩笑万岁！美学家说真正的、真实的、自然的玩笑是美妙神圣的，例如一半的维也纳笑话都是由玩笑构成。“一个完美的矛盾束缚住了智者与傻瓜”，歌德如是说；但是人们永远都在寻找相对的矛盾，却从来没有找对过，它就是那些没有主人、毫无目的地四处踉跄而行和胡诌八扯的事物，用一个词来说它就是胡扯。

整个柏林都处于胡扯之中。每一个为了幽默而做的鬼脸都会逗得大家咯咯发笑，即使一点也不幽默。任何一个重复了两次的奇怪习惯用语都能立刻找到它的听众，受到欢迎。这里有大家都认为幽默的人，他们之所以幽默是因为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结束一句话，他们用其他的名称来叫每样东西，他们混淆概念，用讽刺的口吻道出最严肃的事情。这些人永远避免像其他人一样走直线；他们若跌倒，那就是他们自己绊倒了自己；柏林人把这所有的一切都称为幽默，然而理智

的人一定会称之为胡扯。我曾观看过《在祖鲁卡菲尔人中的舒尔茨和米勒》这部喜剧，这两类人物的对比本身已够滑稽了。剧中狂野的霍屯督人通过他们疯狂的舞蹈，通过他们的战前叫阵，通过他们刺耳的哨子，通过手势展现了一群像是神经错乱的猿猴，其实流露这些害怕、惊恐、畏惧、同情的情绪，应该说是人类恰当的行为举止。在这些人物当中，舒尔茨和米勒这两人简直就是《喧声》[注]的刻板定型，虽然表面看来相当可信，但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绝对都是胡扯，令人恶心。“舒尔茨！”“米勒！”“米勒！”“舒尔茨！”“是侬吗？”“是的，是俺。”“噢耶！”等等。若设想这样的喜剧在巴黎的王宫剧院上演，至于表演者，连勒瓦索尔和拉威尔都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而是只要桑维尔和卡勒凯尔[注]！也许克罗尔什剧院没有资金请来好的喜剧演员，但是克罗蒙、克莱维尔与丹纳瑞[注]的剧本不见得一定就是单调无聊的，即使他们被称作在巴黎小剧院即兴笑剧的大批量制造者。每当巴黎人对这些笑剧剧本并不欣赏之时，一定能听到他们故作“噢！噢！”的赞叹声，这样我们就能够了解，法国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多么的幽默与风趣。可是，柏林的剧本《祖鲁卡菲尔人》是多么令人反感厌恶，就如同人们想象，自然界的精灵发出强有力的声音开始说话，而与此同时，说出的却全是不正确的德语。

从柏林人中诞生的胡扯原本是简单的，甚至是天真的、幼稚的，但是它已经不能满足这座不断成长，急需精神力量的城市越来越强烈的要求。腐朽的低地德语本身确实有不足之处，民间粗话都是用低地德语[注]说。它绝对是下层的、具有局限性的语言；它是仆役、女商贩、靠剪息票维生的人、小孩和搬迁到城市居住的农民的语言。受过教育的人说话，常常还是带有民间方言语调的痕迹，就纯粹的高地德语而言，这就形成了完全自由的语言加工处理，而在柏林这个说低地德语的地方，如此自由的语言加工处理却非常少。柏林这座城市自称是德国的知识之都，现在，若是一种如此具有局限性且特性又十分尖锐突出的语言材料来为这座城市庞大的思想圈充当表达工具，那么由

此就会产生纯粹的愚蠢无聊之物，人们会称它为一种精神方言。这样的怪胎诞生于柏林对公共表现的欲望增强之时。他的人民群众将自己解放成为了大城市市民。制鞋的艺徒们可以公开发表对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意见；天主教教徒想要公开庆祝基督圣体节，国王对他们说道：“若是制鞋艺徒们不阻碍此事的话，他本是不反对的。”《喧声》将游手好闲者知名的笑话记录下来并发表，单是制鞋艺徒这样的文学表达就很新鲜。如此进步就其本身来讲并不是微不足道的。这样的新柏林化使得健康的理智发挥了许多作用；从萨尔路易到蒂尔西特，《喧声》使整个德国都免于陷入沉睡之中，没有谁会对此有异议吧？但是《喧声》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幽默的外国人，他们只是利用了柏林的形式。本地新开张剧院戏台上的经验展现了这些形式，若是没有这份周刊的尖锐性，那么这些形式就会完全重新沦陷为胡扯。

最近在这里新开业的剧院（为了继续追寻毫无审美品位的足迹）所展现的风格，就是政府令人愤慨的、前后不一致的作为之一，而政府作为在所有其他的人文行业中却又显得困难重重。拉登贝格部长的目标是，对剧院的营业许可进行非常认真仔细的修改，这样在柏林，咖啡馆和舞厅都可以成为剧院！这还真是幸运，我们的演员阶层在所谓的露天剧院还没有完全变得粗野，当然一些年以后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多；我们常常会看到个别雄心勃勃的演员和他们的艺术还没有完全走向毁灭。他们紧接着好不容易地满足了物质上的需求，就力求能比得上那些在宫廷剧院和大的城市剧院演出的幸运的同事，并努力更好、更高贵地表演。就这样，尤其是通过杰出的果尔纳[注]先生和阿什尔[注]先生的努力，本地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城市剧院出乎意料地晋升成了剧院品位风向标，它试着着手于最棘手的美学任务，只是在夏天它又变成了一座公园剧院，群众们仍然很喜欢这里幽默的戏剧风格，而其他的一些剧院的风格就只是胡扯搞笑。剧院一座接一座，多得应接不暇！这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受到一丁点人文教育，甚至没有钱，但是他们却手握剧院经营许可证；其他人不加考虑

地就会这么认为，只要对较高级的官员适当地拍些马屁就可以获得剧院经营许可证。根据从业自由的法律法规，似乎随便就可以开办一家马戏团，或者一所剧院，然而当每个投机者都引用那些前辈的事例时，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有理的，例如他们会这么问：“克罗尔咖啡馆是怎么成为剧院的，行动派的瑟夫两兄弟是怎么成立剧院的，那个雄辩家格拉贝尔特，他曾经为了嘲弄城郊剧院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他又是怎么开办剧院的？谁又是卡里・卡伦巴赫，他也拥有一座剧院？”戏剧领域混乱无章的状态使得文学爱好者们苦不堪言，就像军事秩序爱好者看到所谓的群众自卫队戴着圆形礼帽，穿着大衣，携带皇家军械库的军事装备一样。不是因此就要摒弃群众自卫队，而是群众自卫队需要与兵役相称得当的组织机构与行为举止；当人们向司管戏剧的缪斯女神祭祀，却跟在巴伐利亚啤酒馆里向啤酒王甘布里努斯的祭祀一样，那缪斯女神同样会感到委屈并不再理会这些人。人们不能把巴黎剧院与跳着波尔卡舞的塔利亚女神相提并论，要比较的话至少也得是维也纳市郊的那些剧院。约瑟夫城剧院就是其中之一，也许它是维也纳市郊那些剧院中最次的一所，但它还是具有某种特色；一些英才最开始都是在这所剧院的舞台上崭露头角，例如莫森塔尔，他创作的戏剧《黛博拉》最初也是在约瑟夫城剧院上演。

皇家剧院节目单中的戏剧部分，我认为都不怎么吸引人，例如《简・爱》、《德意志小市民》、《特务》等等。这里充满着服从特殊命令的恶习，即本地的和外地来访的最高统治者们说出他们想要看的那些节目，剧院就会按照他们的要求安排，如此恶习与我们愉悦的美学感知背道而驰。这是君主主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这种形式的一些东西显然已经过时了，这些东西也不再以这种形式存在于世上任何一个君主政体。一会儿说：“按照最高元首的愿望”，一会儿改为“按照元首的愿望”，一会儿又变成“按照至高无上的命令”，一会又只是“按照命令”，在这样一种朴素而又很少见的形式下，国王的愿望得以被表达出来。侍从官还给每位旅行经过的王侯点他们想看的节目，简直就是恶习！王子和公主们，旅行而来的小国的王公贵族们

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要看这个芭蕾，听那个歌剧，或者看一部小小的闹剧，这样的行为就是他们自己精神无能的证明，这本身就已十分可悲了，如此行为在社交场合有失礼仪，与当今君主政体应当扮演的角色相违背；剧院生意的正常运作也会因此而受到干扰，按这种方式，艺术和观众都深受其害。当某位公主从外面得到了由一名女演员或者是女歌手转交给她的推荐信，那么公主就会定下这个被推荐的节目，而这名女演员或者女歌手就会登台出演此节目。若是从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大公国的大公来此，就会有人将节目单呈交给他，节目单正好简洁明了，他就标出一些节目，然后就有人读道："按照最高元首的愿望：《特务》"，现在我们可以在票友剧院看到这部剧。国王是多么的有智慧，他的亲兄弟、侄子或者堂兄弟可以借此将其个人喜好宣告出来，这无疑对国王来说也是乐事一件；可是他应该向前再走一步，禁止侍从官滥用改变节目单的权利，这可关系到艺术与观众的利益。在这个国家，虽然这本该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统治者们"公开宣告自己的想法与发表意见，对这个国家高尚的公众精神并没有起到什么推动作用。

那些大人物和有权势的人可以公开表达他们自己的喜好，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对那些令人深思的或者必不可少的戏剧的推动和支持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若是《萨塔内拉》或《阿拉丁神灯》的大人物在台上发号施令，若是马匹在帝都剧院登台表演，装成猿猴表演的克里诗尼克和祖鲁卡菲尔人在克罗尔什剧院的舞台上嬉戏，那么新戏剧在剧院的首演就可能只符合小部分观众的喜爱。我看过赫尔曼·格林(注)创作的《德梅特里乌斯》的首演，剧院只有一半的入座率。有一小群从哥达那边来的内阁大臣，一些军官，一些教授，很少的学生，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职业评论家。表演十分热情，同舞台布景一样的出色。舞台布景五彩缤纷，服装面料新颖别致，即使是墙壁的装饰细节，也都体现出创作者对戏剧所处时代中相关历史、风俗与服装式样的预先学习和研究。这是一部新手的作品，几乎没有展现出其太多的才能（只是由于才智太丰富，智慧的源泉不断喷涌而出，而不是因为

才智贫瘠和匮乏的才能想要造成一种质朴的假象），但是表演源于对这部剧的信念，并将其体现出来；在表演中，我们没看到演员沉重的负担，没看到吃力不讨好的表演，没看到特意为了最佳旺季时节而白费力气的表演，总之，没有看到所有这些令人不满的地方；亨得利希斯[注]的表演方式仍旧还是把不完全无意识的责任感与极其吸引人的自然表演相结合。一些不会让人用辩证法去苦苦思考的角色，就是那些不那么多元复杂而是较单一的角色，亨得利希斯总能将它们出色地演好。这位艺术家演哈姆雷特并不怎么样，但却能演出令人喜爱和感动的罗密欧。诗意来源于他的被动性，因为他只是填满作家为他勾勒出的草图，所以通过忠实与质朴的表演，他很受欢迎，习惯的力量让他赢得了观众的喜爱，例如在柏林、法兰克福和汉堡，在这些地方他的演出总是能获得巨大成功。

我太同情德索[注]了，他几乎终日无事可做。我们这里常常会有对固定角色进行限定和区别的习惯，即某一演员就只能一直饰演某一种人物类型，德索这位有才能的演员就这样深受其苦。他能代表特型演员这一群体，而特型演员的概念有太多含义了。人们可以作为业余爱好者来扮演哈姆雷特，但也可以将他塑造成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就像达夫森[注]和德索演的那样。有些演员在任何一个剧团都会给剧团增添光彩，即使他们只是扮演二号角色，德索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德索却一直在寻求一份工作，这份工作能让他成为舞台上的重要人物，能将每一个非业余角色的重要演出任务分配给他。他一定会将他艺术家的欲望在这些角色身上发挥出来，然而所有这样的角色仍旧是由罗特[注]和多凌[注]出演。对此德索仍没有想过要换到其他岗位，他十分光荣地坚守着岗位，这就代表了柏林所呈现的精神推动力，不负观众自然、忘我的喝彩声对表演者的赞赏。

管理机构的人谈论到戏剧时说，戏剧绝对不会被忽略，自从在杜陵尔[注]的协助下，戏剧正振兴繁荣；因此，人们应把歌剧院赋予它的

影响和音乐与芭蕾分开，戏剧与被装潢得过分富丽堂皇的歌剧院做比照时，独自遵循其本身严肃而又坚强的职责。戏剧演出这门艺术像被忽略了一样，正如剧院的成就与管理无关，而是观众给予的一样。舞台前部有9个华丽的包厢吸引了几乎与舞台场景一样多的观众目光。歌剧院是中上层社会阶级的幽会地点，陌生人络绎不绝地前来，这里能满足观众想要看普通热闹的欲望，这里是享受的天堂。甚至巴黎和维也纳也不能像柏林这样满足观众观看芭蕾舞的的特殊感官需求。《萨塔内拉》和《阿拉丁神灯》就是现在流行的芭蕾舞剧，一定每个人都看过了，对那些有钱人来说，也是百看不厌。各种形式的灯光、色彩和光华交相辉映，青春、美丽和卖俏相得益彰！这里的音乐人士数量太庞大了，例如在某个晚上可以在歌剧院上演《预言家》，同时《艾格蒙特》的幕间音乐在戏剧院正完美演奏，还可以在歌唱学院来一场由皇家乐队伴奏的音乐会。要做到这样，只有通过不计其数的候补文职人员和候选官员来演奏或扮演，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但是他们完整地扮演完了这些角色，甚至是合唱团和芭蕾团里的角色。有三十个由管理处发薪水的女舞蹈家，就有同样多的年轻、漂亮和有才华的女孩，这些女孩无偿参与演出，只是为了待在芭蕾舞团这样的机构里，也许以后会入选可领薪酬的职位。在挑选年轻人前，其父母和亲戚心心念念地恳求“千万千万”能够被选上，并为此任由管理部门支配，没有特例。于是在舞台上就会出现万人簇拥的景象。灯光的艺术、服装的华美，装饰的品位都被推向了最高峰。这时仙女的神庙从地面升了起来，一会儿云雾形成的宝座与所有东方的神灵一起降临，一会儿地下藏满宝石的洞穴闪烁着光芒，一会儿又是极为自然的喷泉在月光下喷涌而出，继而落下，碎成一粒一粒的晶莹，沿着水池往下流，在水池的边缘那些最可爱的倩影正在打盹。舞台上的每一个场景都很完整与完美。人们没有在一处地方发现为了表达戏剧意义的辅助表演工具，而在其他一些剧院舞台上，观众需要这些辅助工具来补充他们的想象力，才能幻想出完整的场景。这里排斥节约，今天的亚马逊裙子不会重新裁剪给明天用，长裤也不会被剪成脚料再利用。

这里所有的创造或作品总是从头开始。没有服装人员和制景人员会把旧货重新修饰或收拾一下；这里流行的都是些商品杂志，杂志上总是不断有新式的丝绸，新款的天鹅绒，对有品位的画家来说就是新的画布。

在柏林看一部像《萨塔内拉》的芭蕾舞剧在许多方面来说都具有教育意义。例如年轻的玛丽·塔利奥尼[注]，她的优雅和挑衅性的洒脱也许会让美学家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快乐，但是对观众来说，这场演出基本上在文化史上都令人惊奇。人们应该在柏林中心给这个玛丽·塔利奥尼树立一块金色字体的大理石纪念碑。她在地狱背景下跳舞，但她却是观众们真正的天堂；她在谎言背景下跳舞，但她值得被树立一座真理女神的立像。当今的柏林人都非常崇敬她，因为人们想到这个年轻、迷人、傲慢的姑娘时，就只会想到她额头上两个小小的恶魔角，透明的针织紧身衣，可爱灵活的小脚丫，十分调皮打趣的卖俏，在这样的情况下，想象整个柏林会如何表现！这个小小的恶魔就在那里，蔷薇色丝质小短裙在飘动，大概她就是在城郊剧院跳舞的派媲塔[注]？不，她是柏林芭蕾舞剧最受宠爱的孩子，而芭蕾舞剧是这个城市、宫廷最受宠爱的孩子，成千上万的人在虚伪的胸前佩戴着虔诚的奖章，而柏林芭蕾舞剧是这枚奖章的反面。新教的神学家布克瑟尔和克伦马赫、贝塔尼恩救济医院、从事教会救济事业的女护士、墓地、星期天礼拜、国内布道团——若是柏林要在《萨塔内拉》剧中展现他真正的面貌，这才是柏林周六应体现出的一切！王子与公主们都到场了。舞台的后面一个接一个的星形勋章在闪耀，每面舞台侧幕都被一位王子占据了，王子们与芭蕾舞团的这些小恶魔们正闲聊。二楼楼厅坐着将军和部长们，正厅前排座是富裕的市民阶层，在看台和三楼楼厅的是外地人，他们是小地方王府精神的代表，上方区域容纳着工作的中层阶级，比较贫穷一点的人通常手里只有一份小小的宣传册，即使是他们也会在此费劲地研究所有歌剧剧本的小细节，就是为了理解舞台上无声的剧情。你这个被真正的柏林人称作玛丽·塔利奥尼的

人，在皇家普鲁士特制的传统之屋里，在温室的怀抱中，你还能发现多少现实啊！噢，你们这些挂满勋章的先生们，丢掉你们的面具吧！你们就承认吧，除了希腊的神灵，你们的个人信仰不再爱任何事物，你们就承认吧，这里绝对不是对美丽的狂热崇拜，你们在外面的官僚体系才是一部滑稽的喜剧。

恶魔萨塔内拉引诱了一名年轻的大学生，这位大学生似乎对其在卫队重复性的工作和一成不变的生活感到十分无聊枯燥。他有一个未婚妻，她或许还读盖贝尔[注]的著作和《阿玛兰特》[注]，但是毫无疑问，这位年轻的、未来的候选官员，与海因里希·海涅诗歌中美丽的罗蕾莱和塔利奥尼这些美女的来往更如鱼得水。芙尔缇小姐的爱与魔鬼萨塔内拉的爱相比是多么的冷淡与平凡！然而萨塔内拉却越来越坏，坏到能直接下地狱，但是一些观众却像傻瓜一样，看不清撒旦只是出于礼貌才接来这个年轻的花花公子！这里甚至还有小孩子们在跳舞，他们头上顶着撒旦的犄角四处活蹦乱跳，还有如塞尔玛·波洛克那样相当令人作呕的独舞，这会是真正的地狱吗？这里的前院笼罩在画家格罗皮乌斯最美妙的月光下，还有那迷人的水塔和静静沉睡着的、古典的大理石世界，这会是真正的地狱吗？若教会监理会成员们将米洛的维纳斯称作美丽的“女恶魔”，如托鲁克[注]所做过的那样，将梵蒂冈的古典艺术珍品全部称作为“漂亮的偶像”，任何一个理智的人会承认他们说得对吗？若是所有这一切的兴趣与热爱都改变了，那么所有这些快乐与惬意更确切地说就不仅仅是纯粹的与风俗有关，不是为了满足某种偏见。在这场表演中，戴满勋章的王子们对独舞女演员们的每一个姿势都报以掌声，难道会有人对这场表演怀揣着别的想法而离开吗，而应该这么想：我觉得挺愉快的，在伊丽莎白·弗莱[注]和玛丽·塔利奥尼之间一定得有一条中间之道，在贝塔尼恩救济医院和歌剧院之间一定得有一条中间之道，在大教堂合唱团圣诗班的演唱会音乐会和萨塔内拉之间一定得有一条中间之道？同样，这些天的柏林芭蕾之夜唤起了人们对与情妇淫乱的巨大憎恶，理智给予的束缚

与普世的忏悔带给我们新的教条与指导，我们也已充分地认识到了忏悔在新普鲁士所取得的成果，在肉体清苦修行之前，通过这些夜晚，我们将这样的淫欲看透。

两种极端在柏林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并存。它们不是独立分开、并肩而行，而通常是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人们由于虚伪和对事业的顾虑，会在圣马太教堂租用一把“椅子”，这样就可以在椅子的背板上读到：“陪审推事N.N.先生”，然而对于真正有内在精神的人，他们仅仅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这里，这就是——享受。其他的城市为了有这样的享受也纷纷建造圣坛；例如维也纳建造了一座绚烂多彩，用蔷薇花装饰的圣坛。但是柏林越来越多地沉湎于一种形式上的享受，这种形式仅仅只属于柏林。一个外地人在柏林追求享受，他在这里十四天后，满满的钱包都花瘪了，都花费在那些在帝都只要有钱就可以得到的东西，也许很多年后他也不会在这座城市再见到那些东西。大庄园主将羊毛运送到城里，为了补偿自己过去一年在家乡土地上的辛勤劳作而缺乏的享乐，在这里狂欢放纵十四天，这就是大庄园主在柏林的享受追求。这种柏林式的甜头与享受把人民感染到有人可能会用牡蛎壳来铺路。过富裕的生活和享受娱乐消遣，已经成为了在本地艰苦生活的人们的座右铭，例如人们现在发现没有地方可以将“酿波列酒”这个概念如此甜美地说出来。或许一段时间后，对奢侈的追求会激发人们奋斗，这样的大城市也不缺少做事业的特性；但若是自然赋予的人格力量不起作用，那么就会出现狡诈与诡计，生意交往上的骗局，会在一定程度上毫无界限地笼罩这里。什么是界限，破产倒闭就是界限？最光辉的事业是白手起家。拥有几千塔勒的人们高估了自己资本家的地位。信贷给不了正直的人更多的动力，反而是助长了那些胆大人的气势。冒险工业家的果敢与坚毅会带来难以置信的成绩。在最大的镜子发光的地方，在金色的边框深垂到地面的地方，在有小商铺橱窗里琳琅满目的货物被十分有品位地整理展示好的地方，人们可以肯定的是，百分之九十只能找到一个虚荣、轻浮、空洞的培养基。

现代诗和社会浪漫主义的任务形式已经变得多种多样，但任务还是探究生活的纷乱，生活的纷乱一定就是由下面所述的这些情形而产生。灵车缓慢徐行，安静、庄严地穿过耀眼的人群。华丽的舞会，在狂欢节的晚上，车的隆隆声一直持续到清晨，然而罪行的编年史，自杀的数据向这幅明朗的画像上投射一束恶魔的光亮。在大学授课的哲学家贝内克[注]突然就离世了，而且很可能是自杀，类似这样的消息使我感到震惊。直到现在他才成为话题，这位正派的学者，他在经验心理学上功成名就，特别是对现代教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十多年以前他始终没能成为正式的教授，他的年薪只有200塔勒，不得不用如此少的薪水来生活！一个思想家每年只得到200塔勒，然而在这里的神职人员，他们每年的收入多达5000塔勒！贝内克是对荣誉的欲望的牺牲品，有时在这里仍然会有高尚的人被对荣誉的欲望侵袭，他不想在眩晕的普通道路上行走了。这个男人看起来非常简单，甚至是是迂腐死板。他在二十年前把一个哥廷根教授所有的死板风格带到了柏林。他的报告有一些谨慎胆怯，他套叠的长句太过于认真仔细，他的学说又以休谟和康德为出发点，他超越了我们思想的有限条件，却没有极为大胆地走向无限。在一座如柏林这样的城市里，像这种过时的正派性，它的特征是什么呢，柏林只有华丽的空话，讽刺的幽默与机智，洒脱的悖论和黑格尔传播的那些乱七糟八的学说，黑格尔，多年来最平庸的人才之一，他们只知道按他们的说话方式交谈，或者他们懂得，如何让他们所谓的思想可以在受欢迎的宗教和国家观点上有实际的运用，如何可以晋升成为正式的教授！哈姆雷特在这点上也是位重要的人物，我们得向莎士比亚下跪感谢哈姆雷特这样的榜样，他拥有全部与这个世界一起堕落着的思想自由，哈姆雷特回答国王问他过得怎么样的问题时，他答道：“我承受着缺乏晋升之苦。”

——谁能忍受

官员的傲慢和苦恼忧愁

向沉默证明一切！

1. 《萨塔内拉》：芭蕾舞剧，法语原名为《LeDiableamoureux》（《魔鬼之恋》）。（译者注）
2. 《喧声》：《Kladderadatsch》，1848年至1944年间出版的德语政治讽刺周刊。（译者注）
3. 勒瓦索尔、拉威尔、桑维尔和卡勒凯尔：法语名依次为PierreLevassor，Pierre-AlfredRavel，Sainville和Jean-FrançoisKalekaire。他们四人皆为19世纪中期在巴黎王宫剧院表演的演员。（译者注）
4. 克罗蒙、克莱维尔与丹纳瑞：法语名依次为EugèneCormon，Clairville与Adolphed’Ennery。三人均为法国19世纪剧作家。（译者注）
5. 低地德语：Plattdeutsch、Plattdüütsch，又称低地萨克逊语、古萨克逊语，是低地日耳曼语的一种区域性语言，主要使用者在德国北部、丹麦南部和荷兰东部，另外亦有使用者在波兰沿海地区，以及如加拿大等地的移民社群。
6. 果尔纳：全名KarlAugustGörner（1806－1884年），德国演员、导演与剧作家。（译者注）
7. 阿什尔：全名AntonAscher（1820－1884年），德国戏剧演员、导演与剧院院长。（译者注）
8. 赫尔曼·格林：HermanGrimm（1828－1901年），德国艺术历史学家，时政评论家。是格林兄弟中的弟弟威廉·格林的儿子。（译者注）
9. 亨得利希斯：HermannHendrichs（1809－1871年），德国演员。（译者注）
10. 德索：LudwigDessoir（1810－1874年），德国演员。（译者注）
11. 达夫森：BogumilDawison（1818－1872年），出生在波兰说德语的犹太演员。（译者注）
12. 罗特：KarlMathiasRott（1807－1876年），奥地利著名演员。（译者注）
13. 多凌：TheodorDöring（1803－1878年），德国演员。（译者注）
14. 杜陵尔：PhilippJakobDüringer（1809－1970年），德国演员与戏剧顾问。（译者注）
15. 玛丽·塔利奥尼：MarieTaglioni（1804-1884），意大利女舞蹈家。（译者注）
16. 派媲塔：PepitadeOliva（1830－1871年），西班牙女舞蹈家。（译者注）
17. 盖贝尔：EmanuelGeibel（1815－1884年），德国诗人。（译者注）
18. 《阿玛兰特》：《Amaranth》，1849年由德国诗人OskarvonRedwitz发表的叙事诗。（译者注）
19. 托鲁克：AugustTholuck（1799－1877年），德国抗罗宗神学家。（译者注）

20. 伊丽莎白·弗莱：ElisabethFry（1780－1845年），英国监狱制度改革者。（译者注）

21. 贝内克：FriedrichEduardBeneke（1798－1854年），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12. 新博物馆——宫殿祈祷室——贝塔尼恩救济医院（1854）

在国王下令建造的那些建筑作品中，人们会无端感受到某种压抑的气息，新博物馆就是这样的建筑之一，并将继续作为其中之一存在。外来者每次参观时都会急于再次来访，那时他将会很高兴看到博物馆圆满完工，他将会在这些展览厅里感受到，自己摆脱了所有令人讨厌的本地意识和傲慢，他将会了解到那些只与普遍的、德意志的艺术追求相关的东西，这些艺术追求为我们创造了慕尼黑的美丽与壮观，德累斯顿王宫的装饰，魏玛和艾森纳赫的新建造计划，我们新的纪念碑、艺术展览会和艺术协会，还有我们院校的蓬勃发展。新博物馆位于城市一处隐秘的、眼下还很狭窄的、不怎么好找的角落，但它对于外来访客来说是最舒适安逸的场所，是鉴赏力最愉快的约会，是本地人和急忙赶到这里来的外地人的好奇心最愉快的碰撞，并且他们审视的好奇心会越来越多。新博物馆建造、发展得慢，但是收藏丰富、讨人喜欢。它的发展理念是：与人亲近。我们在意大利和慕尼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我们在这里重新建立的东西。通过博物馆的天才建造者的灵感，这些展厅应该会首先使艺术家伟大、自由的本性得到复苏，这位天才建筑师是一位拿着画笔的诗人，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不是那些凭空自称思想家的人。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想要想起希腊，想象拉刻代蒙(注)的画面时，既没有受人喜爱的、拜占庭式的浮华妨碍我们，也没有俄罗斯的驯马人、运动员或者阿玛宗女战士包围我们；即使是在柏林到处悬挂着的格言：“根据申克尔的草图”，也妨碍不到我们。我们必须得把申克尔称作是一位富有创造力、思虑周到的形式诗人，但他的作品的确很多都是在纸上创作出来的，晚上在灯光下，他画过数不清的图纸；他设计出的作品，从宫殿草图到费尔纳

[注]炉子上的装饰物，都是极天才的创意；但是他的风格还缺少某种力量、某种纯净和简朴……

国王的第二件伟大艺术作品就是宫殿[注]的穹顶祈祷室。它花费了五十万，毫无疑问，它就是按照国王独特审美观而建造的宫殿装饰物罢了，即使这对艺术没有任何贡献作用。宫殿里有一块至今都被忽视的场地，里面有坍塌的自来水厂，这片场地的作用就是保管物品，里面存放着旧破烂，当然还有现今仍装饰着阶梯的施吕特尔[注]出色的浅浮雕，建筑师沙窦[注]就在这样的场地上建立了这座宏伟的穹顶建筑物。穹顶建造的弧度与其说是圆形，不如说是椭圆形。这间小教堂给每个踏足于此的人都留下了惊人的印象，在白色大厅就欣赏到了劳赫[注]的胜利女神像的美丽形态，然后走上楼梯到达祈祷室，鲜花和枝形吊灯点缀着楼梯，只是为了与沙龙相称，应该用乳白色玻璃将吊灯的光亮适当减弱。到了祈祷室，人们没有估料到这里的规模与奢华。当然经过较长时间的观赏之后，这印象就消褪了。这座石制的建筑物，充斥着大理石和金色背景的画作，使人眼前感到越来越冰冷。即使是用昂贵宝石构成的十字架装饰着的圣坛、布道坛和地板，后来都突然变得就只像是南方湿热的空气，让人如此压抑，以致上帝鲜活的话语在这里不能真正地从精神上被传道，人们也不能真正地在精神上接受它并给予思考。这里的墙壁上装饰着各种各样的大理石，使人眼花缭乱。这里不会找到像在矿物收藏室里那样的石板，没有色彩，没有昂贵宝石构成的图样。伴随着由石头引起的不安，还有不同种类的各式画作。它们似乎是为了赞颂宗教或基督教的支持者，基于这样的考虑才被拼凑在一起。但这也是一种画廊或者博物馆意识，并不是纯粹的教堂意识。胡斯、路德、勃兰登堡的选帝侯[注]们与大主教和福音传教士们面对而站。这时就一定会缺少和谐的气氛，礼拜也不会轻而易举地顺利开始，人们在这样的沙龙里就只能举行传统的礼拜仪式。啊，对传统宗教的狂热就像生出的霉一样居在我们所有人的心灵之花上！人们不再思考，人们不再审视，只是为了宗教而从事宗教活动。人们

尊敬宗教的威严，人们尊敬她就像尊敬父母一样，父母所操的心变成了花白的头发，我们就不应该对父母的弱点进行批评。这才是沙龙宗教的立场。人们不想要审视，不想要探究，人们用金子和宝石包围传统，这就是传统，人们以自己的需求而制造的传统。有人跪在教堂跪椅上做祈祷时，会拍拍他华丽的丝绸衣服，直到呈现出具有艺术的褶皱；他打开了他的金色祈祷书，心不在焉地读了些古代思想，也许会很有感触地联想一下那些个太多人为了信仰而死的时代，他或许也会承认他自己的罪恶念头或者倾向，忽而唱诗班奏响了音乐，他沉浸在乐声中，由于感动与神经脆弱，涌出了些许泪水，然后他就带着这样的情绪离开了做祈祷的地方，然而他依旧放不下过去的一切，他对这个有伤风化、各个方面都很危险的新世界进行了反抗！这就是如今的宗教风气。若是要走高贵宗教业余活动的路线，除了这个新的柏林宫殿祈祷室，人们想不到其他符合目的的教堂了。它完全减轻了对这样一种虔诚的顾忌，而有时候这些顾忌或许也会变得令人厌烦。

贝塔尼恩救济医院是一座前几年建成的教会女执事救济机构，它远离城市的喧嚣，只是可惜处在一个四周没有什么树，太过于贫瘠的地区。驾车从一座新的、正在建造的天主教教堂旁驶过，就会看到这所经常被人谈论的医院，并惊叹于它恢弘的建筑，所有人都认为这座医院应该能得到可观的赞助。然而听说却只得到一个市级基金会的资助，人们时不时会被报纸上刊登的贝塔尼恩救济医院需要资助的请求惊到，请求这个词，又使得这所医院几乎像是一所私人机构。对有必备医疗设备的医院来说，有两百多号病人很常见。而这片简直过于奢侈地被赠与的地区，还可以再安置这么多的人。这里有一个前屋，一座教堂，一个餐厅，还有女执事们的住所和延伸出去的走廊，这些事物似乎让人联想到，这个机构的下一个使命似乎就是成为类似寄宿学校、女子学校或者修道院，顺带从事病人护理的工作。毫无疑问，这个机构也是在相似的基础条件之上建立的。贝塔尼恩应当是有所建树的、基督般的慈爱之典范；对那些病人来说，他们也会受到悉心的照顾，但这些病人在一定程度上退居到了第二位。

女执事长是冯·兰晁小姐。她下面有大概二十个“被授予圣职”的女执事，以及可能相同数量仍处于第一准备阶段的姊妹们。一些被授予圣职的女执事正出行在外，帮助其它地方建立相似的机构。绝大多数这些年轻、有教养的女士们的衣服是蓝色的，她们戴着一顶小小的帽子，肩上挂着白色的围裙。药店里只有两位女执事在服务，在这里我知道了，这家医院是如何预先全面地教授基础知识的。这里还有一间教理论入门课程的教室。有雇佣女工来做粗重的活儿，她们在房屋的地下室，在最合适、实用的洗衣间与厨房的设备装置旁忙碌着。这儿也不缺少男人。总的来说，女执事们更多照料的是女病人，须得把繁重的工作交给更强壮的男性来做，特别是抬病人和给病人换床的时候。由此，人们在这里又重新了解到了某种奢侈，这样的奢侈似乎蕴藏在整个机构的特性里。面对病人和垂死之人时，我们不能流露出与其相关的五味陈杂般的感觉，因为我们自己的整个心境需要在他们面前保持不刻意的愉悦与舒适。干净的环境，清新的空气，舒适、愉悦的感觉对病人自己来说也是有益处的。

我问过一位工作于女执事救济机构的朋友：“出于什么样的精神，这些女士与女孩们表示愿意支持与照顾这些受苦难者？”他回答道：“噢，天啊！人类为了激励自己做出少见的行为，那就无可争辩地需要考虑到较高的道德目的。”然而我却更想要听到的是：“这种机制是由人类的爱心自发而起。”我想，这音色就会更显真挚，态度也会少些冷漠与骄傲。在集体工作中，团结是必需的，同样的心境定会将所有人联系起来。不过教堂，吃饭时的颂歌与祈祷，还有我在钢琴上发现的被打开的摩拉维亚兄弟会在“格纳道”出版的歌曲集，是否都属于这个范畴，我感到怀疑。一方面是女执事们对天主教的狂热崇拜，她们将她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份工作，与世界永远隔离；另一方面是女执事影响力的短暂，她们适时提前告知机构其决定后，就可以放弃她们的工作，并且总还是能成为女教授或者女陪审推事。对女执事这样的工作来说，善良、仁慈，还有由于外界环境而引起的对从事如此艰难工作的倾向性，就已经完全足够了。难道在19世纪，社

会的教育，人性的思想观念，对公益的热爱，对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成员的关心，真的还没有比工作准则更深入人心吗？以致人们需要去看看《格纳道摩拉维亚兄弟会歌唱集》这本书，只是为了在这点上与三十位女士奉献与爱的精神相关联？

人们都会带着感动与同情离开每一家医院。在贝塔尼恩，我们也看够了悲伤与忧愁。我踏进了一间全是孩子的病房。憔悴和浮肿的小小身躯躺在他们的小床里，床前搭了一张搁板，他们在板上玩着铅灰色的士兵和木制的小房子。一个面无血色的小男孩友好地伸出了欢迎的手，他患了消耗性疾病。我向另外一个小男孩许诺，以后他会看见阳光从窗外欢笑着洒落进来，还可以瞧见在外面飞旋的云雀，他马上就可以在早春自由地嬉戏玩耍，然而这个小孩子的脊髓患病，以后将永远不能行走。参观医院是一次教育，除了看《萨塔内拉》和阿拉丁的《神灯》之外非常有用且益于健康。但人们离开贝塔尼恩时，还是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在这里，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起那些公开表明需要医生帮助的人，还有更多的人生着病。

---

1. 拉刻代蒙：也称斯巴达，古代希腊城邦之一。（译者注）
2. 费尔纳：TobiasFeilner（1773－1839年），德国陶艺大师，他的工厂除制造普通陶瓷器具外，还制造陶瓷炉子。（译者注）
3. 宫殿：此处的王宫指现今的柏林城市宫殿（BerlinerStadtschloss）。（译者注）
4. 施吕特尔：AndreasSchlüter（1659或1660-1714），德国雕塑师和建筑师。（译者注）
5. 沙窦：AlbertDietrichSchadow（1797－1869年），德国建筑师。（译者注）
6. 劳赫：ChristianDanielRauch（1777－1857年），德国古典主义最著名与成功的雕塑家之一。（译者注）
7. 选帝侯：德语Kurfürst，复数为Kurfürsten。是德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其中“kur“意为“选择”，“Fürst“意为“诸侯”，这个词被用于代称那些拥有选举罗马人民的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的诸侯。此制度严重削弱了皇权，令德意志的政治分裂更严重。在神圣罗马帝国灭亡后，此一封号仍为德意志帝国所使用。

13. 关于丑的美学（1873）

“天呐！柏林不漂亮？”我听到一名民族自由主义狂热者这样呼喊道，“怎么会有人提出这么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观点！您这样就是顽固地反对特赖奇克[注]、威棱芬尼希[注]、还有很多人！现在，柏林所完成的所有建设，都很伟大，即使是斯德格利兹和利歇尔菲尔德地区的未来花园，都一定会呈现理想中的田园风光！机遇、伟大的德意志帝国问题和德意志中央集权问题决定了这句话：柏林是城市中的城市！也是美丽的城市！最迟在夏天，当莱比锡尘土肆虐时，当盛夏人们都去度假，许多行业陷入淡季时，那时格劳宾登地区和瑞士也就定会属于柏林！”

不管怎么样，我们开始这篇文章，并且更加满怀信心，因为虽然我们悲观地抱怨，但德意志帝国在抱怨声中也正好发展得出乎意料。

巴黎，这座城市被糟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了。但是老巴黎却让我惦念，我想念它的市中心熙攘的街道，下过雨后或者铺石路面仍蒙着一层朝露之时，人们和形形色色、美妙绝伦的车辆涌进市场，完全就是古时的卢泰西亚，泥浆之城。如今巴黎的市中心十分壮观地向外围扩展，这样的画面就绝对再也见不到了！现在，广场、桥梁、支路、城门、凯旋门、甚至连仓库和货物堆栈，都只是为了美的需求而建造，并且人们还继续在坚定不移地执行！

柏林与此相反（我完全不是在说维也纳的美），它是一个小国家的中心城市。这个小国家觉得自己拥有的一百多年历史就已经很长了，它虽然不能像法国那样将几百万底层人民的汗水用于建造自己的首都，但是国家统治者也会随心情，将柏林这里修建一下，那里补一

补，四处装饰一下，还砍伐森林，并命令道：这里将会修建一个新的城市片区！似乎所有为此花费的资金都是合理的。阿尔布雷希特王子的宫殿在威廉大街上拔地而起，完全就是因为独裁者拒绝了他的婚姻申请，而这个独裁者就是我们通常称为腓特烈大帝的人。“殖民者们”一定是比着直尺来建造房屋的，十分生硬且不自然。即使是现在，我们还能看见，在腓特烈施塔特[注]新近修建的华丽出租公寓旁，还伫立着一些小屋舍，部分有两层楼高。简而言之，自从大选侯[注]之后，为了使柏林成为一个放在霍亨索伦家族王位旁边的矮脚凳，来赞赏霍亨索伦家族的雄心抱负，柏林总是在等待引导性的指示出现。施吕特尔、额欧桑德·冯·歌德[注]和克诺伯斯多夫[注]肯定是借鉴了荷兰、凡尔赛和罗马的建筑典范。先是波茨坦遭受了破坏，然后是柏林。腓特烈大帝，这个自私自利者，更喜欢只给自己建造宫殿，他在位于御林广场的两座教堂上新修建的穹顶塔楼，仿佛只是“不情愿给的”，就像一半杏仁泥，一半军用黑麦面包混在一起一样，不伦不类。腓特烈·威廉三世身边有热情的申克尔。这位君主被巴黎迷住了，并且爱上了彼得堡，也许在彼得堡，人们会对众多的穹顶教堂和绵长、壮观的街景感到骄傲。他的儿子，腓特烈·威廉四世，历史上最好应该把他称为教堂建造师。这位戴着王冠的浪漫主义者，他甚至在许多新建的柏林教堂的周围还建造了一些教堂，这些教堂使我想起了米兰的圣盎博罗削圣殿，想起了罗马的一座偏远的还愿教堂。自此以后，柏林的美化进程就停滞了。这些君主立宪制的摄政王们，若是有属于他们下任职责的任务，他们就不做了，留给下任做。执政者们最近再次激发出的美化柏林的想法，而这将会被巨大的、越来越强烈的私人建造热超过，私人建造热的后果就是最丑陋的拆除、废墟，呈现出如同斯特拉斯堡被围攻之后的悲凉景象。

从勃兰登堡门到宫殿的林荫大道十分宏伟，并且宏伟得非常美丽；但是若专制的、遵照命令的、巨大的美化热，还不能使眼睛从大体上，近景和远景上都得到满足的话，那人们还可以像现在这样继续

建造几百年，却仍带不走柏林永远不漂亮的印象。当然，这里存在弊端。柏林是一座民主的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像这里的小型手工业这么蓬勃地发展！整个柏林都没有一条只看得见优雅的人世生活的街道！随处可见的是从建筑工地而来的工人们，女厨师的购物篮，工匠的产品或者搬运工的负载物，毫无优雅可言。在每座房屋前，只有几英尺宽的花岗岩人行道，使得路上的行人不得不摩肩擦踵。有文化的人不会信心十足地出现在任何一个地方，即使是在下林荫大道上的沥青人行道上。为了避免拥挤的场景，他当然就会避开人群，而这些人群的身躯在这里如此自由地活动，就像是交易所或者军队的英雄一般。几乎每一座华丽的新出租公寓都有一层地下室，作为酒吧、餐厅和手工作坊。这样整个柏林都充满了永远繁忙的印象。虽然市郊和市中心到处都能区分开来，但是在柏林，二者的整体直观印象是同一回事。

我们再重复一遍，从勃兰登堡门到宫殿这一片区域的全景图是无与伦比、独一无二的。外地人会一路赞叹直至抵达大教堂，总的风景印象让他觉得自己步入了最壮丽的景色中。甚至他对巴黎协和广场及其周边的印象也许会远不及眼前风景。可是在大教堂旁边，漫游者会猛然瞧见一座通往市中心的小桥。他正好联想到了巴黎，想到了那些架于卢浮宫码头街的弧形小桥，娇细秀丽，横跨在塞纳河上。但是在柏林，他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样的景色！这里可以看见一座木桥，以前需要缴纳六芬尼才能通过此桥，现在行人可以免费通过，并且几乎不会再拆除它，碍眼地矗在国王墓地后面；还可以瞧见些像是腐烂的鱼箱一类的东西，它们在宫殿脚下浑浊的河流里似乎只想要渐渐浸软自己，另外还有泥炭船和苹果船也是这样。

由于难以形容的大范围扩建，人们将木材、煤炭、石材生意开展到城市的最中心位置后，柏林就变得尤其不美丽了。这些生意需要最宽广的空间。大多数的老店都有宽敞的经营场所，由于人们的建造兴致，这些经营场所也转移到了时髦的城市里。如今，人们完全没有把

木材、煤炭、石材商店的丑陋裂缝给掩盖掉，没有用高墙包围住它们来让街道看起来和谐一些。简易的、被风化的黑色厚木板，有些被修补过，有些有裂缝，丑陋地遍布这座城市，在许多地方，甚至可以看见露天销售煤炭，警察简直就应该将这样的露天煤炭买卖取缔。露天煤炭买卖会将一整条优雅的大街变得丑陋，例如逊纳贝尔格岸边。然而位于贝尔维尤的皇家行宫的庸俗木制栅栏却终于消失了！

“可是这是为了帝国！帝国！”安静，亲爱的个人名利追逐者！我们在为德国国会大厦寻求新建地址时，就会想起一处柏林的污点。为了大厦新址，人们想过，把拉钦斯基宫或者克罗尔什剧院夷为平地，同时他们的目的很可能是想要使卢恩大街到俾斯麦大街的那片城区更繁华热闹。或者是出于战略原因，让人想起1848年的德意志革命，那时等级代表会议厅不得不向人民群众宣读了一份具有一些国家革命性质的公告，所以有人想要把德国国会大厦孤立、隔离起来？建筑师们似乎完全是参照雅典卫城，并仿照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来修建的。可是请你们爱护一下行人，在这些宏大的广场上，人们不得不在烈日下气喘吁吁地行走，直到最终达到这样一处庙宇的台阶！还有，拆除敦霍夫广场的里程碑，难道不值得再考虑一下吗，即使其周边还居住着大多数的帝国使节？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残暴还不能让你不寒而栗吗？他将新的慕尼黑大学建造在城市的最边缘，使得学生不得不在难以忍受的烈日下，每天三、四次辛苦地往返于无尽的路德维希大街。这下好了，克罗尔什剧院似乎得救了。但若是为了另一个计划，为了建造克尼格雷茨大街，就必须毁掉花园，锯断令人崇敬的老菩提树或者德克尔花园里那些称得上北德奇观的树木，倘若要花费几百万的钱在土地与地基上，那么就让这些公园成为私人所有物或者就留下开放给公众吧，若是后者，它还可以装扮这座城市。请你们在这些开放的公园里放些雕像吧！安置比现在柏林雕像总数还多的雕像！此外，还可以修建喷泉，安放长椅以供人们休息，并树立起金铜色的枝形路灯。金铜色的铁灯罩与铁栅栏，在巴黎，这种建造

运用于几乎所有的公共建筑，它展现的效果尤其优雅，并且会将周围的人都吸引过来。

还有一处柏林的污点就是以前名叫“猫阶”，现在称作格奥尔根大街的地方，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右边，蒙比欧宫的对面。外地人漫步在世上最美丽的景色附近，一路惊叹着，从皇家岗哨或者从腓特烈大帝的纪念像处沿着学院一直往前走一些，就到了格奥尔根大街与大学街的交汇处，就像是突然走到了王室管理处作为佣工房、厨房和车棚的建筑下面。这一整片城区，是毗邻国王最近的地方，甚至就在其对面，但这片城区给人感觉就像是“最后的房屋就在此地”般寥落。事实上，现在这条勉强让人喜欢的多罗特恩街，以前就叫做“最后的街”。的确，市郊就从这里开始！左边是曾经的格罗皮乌斯立体布景店，一栋木制建筑，后来它成为了手工博物馆；然后就是晒衣场、军备安装与保管处、骑兵马厩和炮兵营房倾斜的庞大建筑，营房看起来十分糟糕，墙上的灰泥很久很久以前就脱落了，营房正在逐渐倒塌，急需拆迁。各个城门前的那一大片空地，已经足够容纳许多兵营了。要是能整治这里的码头，将木制的艾伯特桥改造成石桥或者高耸的铁桥，通过建造德国国会大厦使这片巨大的区域与交易所、博物馆、宫殿、大学和环绕的绿树相协调一致，这些绿树在施普雷河对面，在上方从蒙比欧宫向这边招手，那就太令人高兴了。谁要是现在漫步于这片地区，他肯定会说，这里的特点就是，一切看起来不是像只是临时的顶替，就是像劫后余生一般。一切都很贫瘠、不美丽、也没有皇家气派。

新柏林的有些地方仿佛是从一个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不过不得不承认，这些地方给人的印象确实十分庄严，极富魅力，好像身处日内瓦的贝尔格新城区，或者里昂。可惜这座城市的这些地方都太偏僻了，远离了帝都的繁华热闹，甚至远离了那些平常随处可见的“戏剧院”。从路易森运河岸到天使池，到新建的天主教教堂，贝塔尼恩救济医院，还有后面的新托马斯教堂——人们多么希望，这片区域的特

色能够被普遍运用，并成为整个城市建设的标准范例。这幅的确十分漂亮的画面的中心位置，就是这里的运河。同样，在其他一些地方，可能是整条施普雷河，要是在开始建造这一片区域的恰当时候，就已经有装饰意识就好了。可这装饰意识到底是君主的、市政府的、还是私人的？这样，例如当人们从瓦尔街走来，踏上威森豪斯桥，环顾四周，就会完全被这里壮丽、宏伟的景色深深吸引住，仿佛置身于汉堡这样的水城，或者荷兰的海滨城市中。然而，可惜还缺少一些附加条件。缺少码头，缺少对一些街道由于房屋拆迁而裸露出来的后院的整治，这些后院已经被一层数百年之久的污垢与顽迹掩盖住了，在水中作业的行业还缺少明文规定，使他们的工作环境看起来更令人满意一些。从磨坊堤坝透光的柱廊，越过施普雷河直到市总督府的左边，即使对面不能更荒凉杂乱了，这一条真正的港口大街依然充满了热闹与活力。

在古代，王储们也喜欢这样或者类似的想法！现在，为了在蒂尔加滕城区建造国会大厦，财政机关要求更多的土地与地产，似乎这些发起者们甚至还想要下林荫大道，只有当城市建设委员会让艺术家们成为部门负责人时，我们才会满意，这些艺术家们为了柏林的扩建与发展，基本上都会追求具有某种创造性的建造方案，同时不会忘记细节。这并不意味着，将新的建造草图上渐渐画满网点与线条，也不关乎新建筑的华丽外观，这关系到已存在的缺陷的清理与减轻，关系到真正的维护与真正的毁坏。当然财产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致即使是能把街道变丑这种程度上的创新古典风格建筑，例如所谓的“碎冰柱”，依旧没向警察与市级行政机关发出的那些的警告屈服！这就是无忧宫的磨坊！它就该这么厉害！我很好奇，蒂尔加滕宏大的新胜利大道会变成什么样；胜利女神大街上还有一个广告柱，与胜利纪念碑组成了一对对极。

通过在街道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车辆、出租马车、啤酒瓶的运输、糟糕的习惯与仪态、谈吐、即使是在女性面前人的信念的实践等

等来研究街道装扮的丑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毕竟得害怕我们所有在玫红色光线中张望的乐观主义者的愤怒。

---

1. 特赖奇克：HeinrichGotthardtvonTreitschke（1834－1896年），德国历史学家、政论家、民族自由主义者。（译者注）
2. 威棱芬尼希：WihelmWehrenpfennig（1829－1900年），德国民族自由主义政治家。（译者注）
3. 腓特烈施塔特：Friedrichstadt，是德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北弗里斯兰县的一个市镇，位于艾德河畔，距离县治胡苏姆约12公里。
4. 大选侯：勃兰登堡的腓特烈·威廉，FriedrichWilhelmvonBrandenburg（1620－1688年），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因其卓越的军事和政治技巧被称为“大选侯”。（译者注）
5. 额欧桑德·冯·歌德：JohannFriedrichEosandervonGöthe（1669－1728年），巴洛克后期的建筑师，他最著名的作品是柏林的夏洛滕堡宫。（译者注）
6. 克诺伯斯多夫：GeorgWenzeslausvonKnobelsdorff（1699－1753年），建筑师，代表作有位于波茨坦的无忧宫等。（译者注）

二、普鲁士政策，支持还是反对

1. 普鲁士宪法颁布的历史背景（1832）

如果说邦交是自由主义的唯一标志，那么普鲁士在这一领域里的成就无疑是空前绝后的。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我们不追求规则本身，恰恰相反，我们追求的是勇于制定新规则的那种精神。我们呼吁大家把自由二字融入自己的生活和血液中，从而使自由这个概念保持其最本真的涵义；这就意味着，民众不再把宪法当做其攫取利益和满足私欲的工具，而会把它当做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武器；宪法更加不会向独裁者抛出橄榄枝，而是会为民众杜绝这样的可能性。宪法是否能够像锋利的宝剑一样来保护民众，为大家争取合法权益呢？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司法这一尚方宝剑从来都握在征服者和法官们的手中，人民大众只能通过示威游行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掌握宝剑的统治者则可以肆无忌惮地任意挥舞，惩处那些不够顺从的人。大众的抗争换不来法律的公正，只能将自己完全暴露在统治者的皮鞭下。如果普鲁士能够颁布一部长期有效的宪法，就能满足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要求吗？不，这才走出了第一步，还远远不够。现在就请读者们沉下心来，和我一起翻阅这个国家厚重的历史，看一看普鲁士的勇士们是如何在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却拒绝暴力的前提下，为民众创造出一个清平的国家的。挑战普鲁士旧秩序第一声呐喊的回音还未显现。或满怀希望、或心怀忐忑，普鲁士的人民始终在等待着国家给出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答案。正因为迟迟没有结果，大家就会理所当然地对普鲁士抱有一种反对的态度。大家敬重也好、仇恨也罢，同情也好、厌恶也罢，我们都并不能指明一方反对另一方的理由。我们只知道，那些怀揣着改变国家梦想的先驱者们，总是在坚守着自己的阵地：那个能够让他们坚定自己信念的地方，就是他们逃亡的地方。面对普鲁士的问题，大部分人要么袖手旁观，要么充满了道德上的厌恶。尽管这

样，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说一句话，大家都守口如瓶。只有普鲁士宪法中所宣扬的精神才能召唤异见者，如果反对的目的不是为了欺骗，那么它就会是最有生命力的一种表达不同看法的方式，因为宪法本身就是以保障公民自由作为其最基本的指定方针和原则的。下面的分析将会证明我的这些担忧不是空穴来风。

到底是什么样的需求催生了制定一部宪法的愿望？毫无疑问，是想要拥有一个公平的法制环境的需求。什么样的律法才是与时俱进、适用于时局的？是传统的？是旧风俗？还是把大家那些一致的看法当做律法？还是遵循那些历经时间考验仍旧永不褪色的、建立在理性平等基础上所签订的契约？普通大众一直在这些解决方法中徘徊求索，而贵族们的想法则大相径庭：要么就走正常途径，通过内阁决议来制定律法，要么就只对旧的律法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改革（这个改革不是革命性的彻底推翻，而是小缝小补），这样经过改革的律法并不关注当下这个时代的需求，而是从尘封的旧档案中，从斑驳的羊皮卷上，从厚重的史料里总结而来的。然后再为普鲁士所用。如果你认为普鲁士的现行政体是独裁的话，那么你就只理解了它的表象，而未深入其本质。只有弗里德里希二世制定的法律才能真正地被称之为独裁。假如他能够在制定律法之前征求民众们的意愿，以大众的需求为准则的话，那么他的每一步尝试都会走在追求司法公正的正确道路上。但是，民众的需求总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公正，怎样的法律才能让我们感受到公正呢？如果我们认为自己很健康，哪位神医能够治愈我们呢？这就是人类最大的弊端。各届政府都不会无条件地不断满足民众提出的各种需求。他们早就知道，且为此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只能抽空赞美一下自己。所以，执政者越想要讨大众欢心，就越适得其反。这种事无巨细、无微不至的细致周到就是普鲁士政府的风格。就如同小鸡在母鸡强大而丰满的翅膀下温情地吱吱叫，对妈妈不求回报的保护充满着感激之情。但是，这样的信任必须被打破。国王坚信，解决问题可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一是战争，二是承诺把颁布的法令组合起来，制定一部

“基本法”。整个国家一同遵守这第二个承诺是毫无疑问可以实现的，只是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人们犹豫着，拒绝了州议会请求永久得到保护的申请；我们不愿意给大家造成这样一种错觉，就好像恐惧会给威胁者的东西，和爱赠与希望者的东西一样。一般来说，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可以不理会父辈给大众的承诺，甚至可以简单粗暴地随便将承诺抹去。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假设！事实上，父亲的意愿对皇位继承人来说是神圣的，遵从父亲的意愿就是尊敬父辈的表现。还有！他上台的第一个政绩就是这部宪法，同时也面临整个欧洲其他国家的挑战。

历史上对此的看法也分成了两个流派。一派认为他是一件艺术品，另一派则认为是自然的产物。这一对比可以被称作机械主义和自然主义。可是如果你想把其中的一部分归结到自由主义上，把剩下的部分变成其对立面，那么就会得到错误的结果。欧洲各国的实例证明，这两种路子都是可以走通的。比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还有俄罗斯都各自选择了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这些国家所制定的政治制度不仅从民众的需求出发，而且正是通过民众的抗争才得以实现的。德国的情况大多时候并非如此，德国人具有崇古精神，对中世纪的思想颇为推崇，倾向于把古代的规则用于今世。并且乐此不疲地查阅史料，把过去和现在进行类比。毫无悬念地就找到了已经失去效用的机械主义。符腾堡市住着的不能被称为符腾堡人，巴登市的居民也不是巴登人，魏玛市里没有魏玛人，汉诺威里住着的不能称之为汉诺威人，原因很简单，我们虽然是德国人，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国家。普鲁士常常被如此讥讽：那个能够让他们坚定自己信念的地方，就是他们逃亡的地方。黑格尔抽象的理论也许就是源于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起源于普鲁士，也结束于普鲁士。是的，这个讽刺从普鲁士的教义中得出，逐渐家喻户晓。比起英国，欧洲人更喜欢谈论普鲁士，这其中的原因和他们仇恨北美的国家是一样的。他们看到的普鲁士人就像原始人一样。（事实上，萨克森有一个神话，说他们是在树上长大的。）正是由于这样，德国人一直以来的思维就是：不应该使用奇特

的、新颖的东西：即便是改革也都是遵循英国的老路子。谁不惊叹于英国的历史？谁没有为德国最终未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感到痛心？彼时的普鲁士也存在同样的顾虑。弗里德里希二世因为想要推行新政、对政府进行改制、支持启蒙运动而备受旧势力的指责；比起那些世袭贵族，他更注重启用有功之臣，为其加官进爵；他指定了一部法律，这部法律和旧秩序大相径庭。普鲁士在逐渐摆脱旧时代的糟粕。完全遵循旧制度进行改革根本不能被称之为进步。法律的理智与否，不取决于容易激动的人群的意愿，也更少受公知们的言论影响，而是因为我们信奉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就是我们的信条。因为这种理性主义在历史中显露了，所以我们必须虔诚的拜倒在它的力量下。这是一个咒语，这个咒语可以使普鲁士的青少年很快成熟，使老人（“为过往的一切美好干杯！”这是马尔堡的一句祝酒辞）焕发青春。这个国家的宪法就是建立在这些过往的历史条件上的。

德意志政府最大的特点就是邦交。我们的先辈们不赞同武力，不承认强权，更加不可能在独裁的环境下制定律法。律法不健全的时候，一个人到底欠了别人多少东西，需要双方相互协商决定。改革为这样的方式画上了句号。改革引进了罗马的律法，吸收了罗马律法以至善至美为标准的要求，完全摒弃了最初的法制观念。这样的律法是博学的产物，并且只可能在王侯们的积极推进和保护下才能发展起来。宗教的推动力只能够起到一定程度上的推动或者阻碍的作用，王侯和平民在反对贵族阶级的独断专权上是站在一边的。因此就出现了一个新概念叫“君主立宪制”。也就是说，掌管国家权力的公务人员是从皇族中挑选出来的。然后再由皇族议会成员组成内阁，共同管理国家。内阁成员通过协商和退职来进行更替。反对这种君主权力的斗争形式表现为两种状态，革命和复辟。这两者都针对的是现有的制度，两者都建立在历史和准则的基础上。不同的是，一个代表知识，一个注重利益。每一方都有机会赢得权力和大众的支持；不久的将

来，普鲁士也会面临这样的抉择；更何况普鲁士还有自己的杀手锏，武力。我们有理由害怕吗？这难道不是贵族统治和民主政体之间的斗争吗？

普鲁士宪法的起草人有权利选择走哪一条路。现今德国的每个州的法律都必须以宪法为基准。人们赞扬宪法中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精神，歌颂宪法对贵族、城市居民和农民阶层一视同仁的原则，也就是说，不同阶层的人也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这样一来，贵族们在议会中的特殊优势又从何体现呢？她向政府提出了哪些要求！贵族阶层被赋予了许多额外的权益，修道士和神职人员，过多的免除其税收等等。这就是我上文中所说的，在以理性作为准则的宪法中，还不得不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的意思，因此，我们只能希望这一特权永远不要出现。农民阶层受教育程度低，因此就极有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自己的权力转让给了农场主。当然，即便是受过一些教育的城市居民，他们的知识水平也不可能与比如南德城市里的居民相媲美，那些能够当议员的人，大多数都是国家公务人员，本来就是由政府任命的。谁想联合其他人一起反对贵族阶级的决议，就必然会成为少数派，政府的力量也十分薄弱，就像莱茵河边和威斯特法伦的政府所证明的那样。

中世纪既有自由，也有特权。这两者，应该被授予普鲁士的贵族阶级还是不应该？普鲁士需要引入议会制度吗？普鲁士的国王们是否想开具永久有效的通行证？他们的财力也支撑了旧的社会等级。可是现代社会需要国有资产来支撑，而不是依靠偶尔注入的私有资产作为激发经济活力的唯一途径。复辟旧的社会等级制度可能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造成毁灭性的摧毁和打击，单凭某些世家大族的一己之力，是不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制度的瘫痪的。王公贵族们确实掌握着税收的去向和用途，而且大部分税收都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得来的。因此，当律法还进一步赋予了他们在紧急状况下征收苛捐杂税（战争税、粮食税或水税）的权力的时候，那么这样的特权也必然是暂时的，不久之后出

现的新概念“君权”才使得君主的权力从永久性变为了在一段时间内有效。但是，这并不能迫使他们交出固有的权力，因为他们知道，比起政府，他们能够更少地受那些令旁人无比厌恶的各色税收的影响。那个时候，骑士还可以不用上税。如果一个贵族犯了抢劫罪，并且抢劫的形式并不是暴力夺取，而是巧取豪夺，那么他还是要照样认罪服法吗？贫苦大众能够得到上帝的庇佑，在贵族面前享有平等的权利吗？高级教士也是议会中的一员，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不劳而获地攫取经济利益。尽管受英国的影响，普鲁士仍存有主教和大主教，但教士已然不能够独立成为一个社会阶层了。过去他们有固定的俸禄，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如今，他们只关注教堂的利益，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地方，宗教是在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下才得以广泛传播的，那么这个地方一定就是普鲁士。农民阶级不再受到欺压，并且还有了自己的土地。那么这些失去了特权的阶层应该重新夺回自己的利益吗？立法者也要将普鲁士农民阶级反对贵族阶级和奥尔布雷西特公爵的暴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人们总是想站在历史的肩膀上，根据当下时代的具体要求，来制定一部合情合理的宪法，可是对于普鲁士来说，这条道路几乎是走不通的。勃兰登堡和波梅里施的公爵只能在自己管辖的权力范围内维持旧有的等级关系，还要以一种特殊的、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方式来维持。他们是最穷困也最弱势的公爵。城市需要他们去建设，饥民需要他们来救济。边疆的城市施行的是共和国政体。因为它们起源于殖民，然后自行制定律法，因此，这些律法不是以保护王侯公爵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而是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保护者的感激和赔偿。最初崇尚武力的公爵能使自己的公民受到良好的保护。普鲁士的情况则不同。一个几乎互相之间没有什么联系的城市联盟体，因商贸和农业而繁荣起来的国家，却不能够实现律法的统一。乡村贵族和一些强大的城市如但泽西、特龙、埃尔宾、库尔姆、柯尼斯堡联合起来，那些被认为是国家主人的德意志骑士，已经逐渐失去了他们的荣光和无上的权力，国家也在对抗波兰的战争中丧失了独立权。所有的这一切都会改变一个时代，但是将它完全地改头换面是不可能的。每

一次改变都有遗留问题，因为时代的洪流总是滚滚向前，难以完全控制。最终，普鲁士政体中的新增部分总会缺少适应当下公序良俗的内容。新的时代不仅仅使莱茵州和威斯特法伦改变了其社会和律法制度，而且已经完全摒弃了旧时代遗留下来的糟粕，成为了新时代产物的展示台。想一想莱茵河下游的城市，比如于利希、克里夫、博格等改革时摧枯拉朽的情形吧！除了无休止的政治变革，还有宗教中的守旧派和改革派之间的争执和斗争，这种斗争的力量足以使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只有通过重新建立新秩序才能够浴火重生。

也许我们错误理解了历史条件这个概念。我们没有创造风景，而是参照英国的先例，成立了国会和两个议院，引入了立法动议权。第二个议会代表的是平民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第一个议会则是永久性的、不能被变动的。大家讨论普鲁士领地的世袭问题。我会在法官的面前和判决之前感到害怕。这里将会出现的是哪条理论！贵族阶级的钱控制着第二个议会，第一个议会的决议则是由那些世袭贵族根据教义所制定出来的。如果要讨论世袭权力去留问题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大帝就会出席议会，坐在旁听席上，听取比如最新的“官方消息”，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王权的威严，要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还相信，自己能够在首都里亲手建立一个国家？

我们不是傻瓜，不会让过去的糟粕成为如今的笑柄。我们敬畏先贤们统治国家的智慧，然而，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尘封在历史中，让我们的时代萌发出新思想和新希望。我们不怕与那些普鲁士的红衣教主、皇室贵胄和统治者们进行斗争！我们这个时代不再受任何某一种思潮的影响。许多谜题已经解开，那些北方的奥秘也必将大白于天下。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闪光之处，只要对某条律法持有反对意见，你就能够挑战保护着它的那些势力。如果俄狄浦斯来了，那么斯芬克斯就会一败涂地（一物降一物的意思，古代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怪物，最后被俄狄浦斯所杀）。

2. 三位普鲁士国王(1840)

当我还在绞尽脑汁想着用什么方式描述腓特烈三世生平时，就听到了腓特烈・威廉姆三世去世的消息。更令我震惊的是，民间早就流传着“国王活不过今年”这个消息了。死者生前长时间深入简出的生活不可能让民众获悉自己的健康状况。每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因为长时间不见，尽管民众会惊异于他的面貌和上次相比衰老的速度如此之快，可是国王的气色和尊贵的气质还是和往常一样，因此，大家应该有理由相信，国王的寿命不会太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愈发对民间流言的准确性感到震惊。民间迷信普遍认为，每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普鲁士就会经历一次王位更替，或者经历一次大事件，人们把它称之为霍亨索伦王室家族的劫难。即便去剧院，国王也会坐在为其专门准备的看台的红色幕布后面。因此国王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可能撑不过圣灵节这个消息，只有那些经常出入王宫的人才有可能知道。

即将登基的新国王跟随着弥留之际的老国王，一起出席腓特烈大帝的纪念碑奠基仪式，难道不令人动容吗？怎样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过去、今天和未来都压缩在一起！梦想和希望必须保持鲜活，而忧虑却要消逝，也可以关注其他的方面，比如考虑一下异见者们的看法。谁能够了解已逝之人的内心世界，民众们真的相信新国王能够知道老国王的想法？是什么造成腓特烈三世必须把追忆普鲁士王朝开国帝王对整个欧洲的态度当做执政生涯中的最后一件在公开场合做的事？这是对过去的补偿还是对未来的指示？浓雾把影响历史进程的英雄人物的功绩遮盖住了，只有在遥远的未来，历史学家们才能拨云见日，还原真相。

埃及人热衷于谈论古代君王们制定的刑法。大家可以长时间乐此不疲地讨论，从一小段断章取义的碑文中，就可以编造出关于腓特烈三世的许多不实的消息。人们往往倾向于选择那些自己认为对的信息，将它们组合起来，形成对人对事的看法。根据这一点，民众甚至可以杜撰出腓特烈三世是一个谦恭的人，尽管实际上他性格很骄傲。更有甚者，也许你称赞他的那一点，正好是他自己生前特别讨厌自己的原因。国王就像空气一样，他们会因为一件事，被成千上万的民众所咒骂，同时也被另外一群支持者狂热的赞许。一场暴风雨可以使一个母亲失去孩子，比如孩子不幸被闪电击中，同时，它还可以浸透焦渴的大地，带来期盼已久的甘霖。

民众很容易相信蒙田曾说过的话，即“统治”是最艰深和困难的事情，或者如一则意大利谚语说的（乌克森谢纳[注]认为这个概念颇具讽刺意味），统治是最不需要动脑子的事情（这个观点已经被莱比锡大学教授阿达姆·艾辛伯格在他1676年所著的书中驳斥了），除此之外，民众们也很容易遗忘那些对已逝之人的评价，后世的人们不可能自己取消那么多感动的瞬间和个人利益，普鲁士王朝和腓特烈三世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个不快乐的青年很早就开始放弃对命运的抗争。在控制他的激情和感情的过程中，他也锻炼出了面对幸运时的淡然心态，他接受命运的馈赠，能够在自己完全没有预料的情况下，平静地接受一切。每一个过分要求都使他担心不能够克制自己的冲动情绪。即便在最后执政的时期，他也没有放松对自己的克制。我们应该放弃一个对内强权，对外封闭的普鲁士。腓特烈三世的脾气比较容易冲动，所以要尽量避免自己做出草率的决定，这对国家的繁荣富强来说也许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因为当时很多人都抱有狂热的思想，有些政治家还特别喜欢宣扬布伦瑞克公爵的新宣言，武断地表达对时局的看法。腓特烈三世的伟大功绩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杜绝了国家陷入动荡的可能。

等待的时间也许已经结束，战争的阴云不再笼罩着整个国家，普鲁士渴望着积极的改变，国家体制已经开始要发生剧变，普鲁士、德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在拭目以待，想看看腓特烈·威廉姆IV作何反应。新施行的政府议会统治代替了皇位世袭更替，这样，民众就不用再担心被一个只懂得用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来治理国家的孩子所统治了，而是会看到一个有能力监管政府执行力的成熟男性治理着国家。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对他来说就像是一本有名的书，他可以自己选择学习书中的哪一个部分，在书中任意做标记。当书中出现了很多处标记的时候，在柏林流传开来的新年就会证明一个新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用了很长时间才摸索出来的、效果突出的社会体制。

人们绞尽脑汁地想要猜测新国王的政治信条，大家把它称之为高贵气派；有些有天赋的公民不会感谢当时的王储将自己推荐到部委就职吗？大家不会把新国王优雅的、令人满意的举止与同情混淆吗？大家把他称作是史蒂芬等思想家们著作的忠实粉丝。但是，如果当时的王储史蒂芬认真考量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思想活跃、但却不脚踏实地的思想家们不安稳的生活就是他们太过于相信自己的政治梦想所导致的。当时的王储非常喜欢被荣耀加冕的祖先腓特烈二世，这样的偏好怎么才能与哈勒、雷欧、史蒂芬等，认为腓特烈大帝只不过是一个加冕了的雅各宾派而已，主张的政治理论相符？

人们总是赞扬新君主的思想，把他的远见卓识和聪明才智记载于史册。这位新君王从来不赞成形式主义的繁琐的军事操练，并且认为传播文明比增强军事更加重要。他喜欢与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打交道，因为很多人都能从这些人的身上得到快乐。就如同他给夏米索写的那封热情洋溢、清心寡欲的信中所说的那样，他与这些有知有识之人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到多么的放松和自然（参看“夏米索的生活”第二卷，93页）。王储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画家，因此他应该对作家的语言表达并不陌生。当时的情况证明，大家总是想让他当一些匿名小册子的作者！大家对所谓的高贵的爱好一无所知，而是更习惯于遵循

权威。他的道德观得到了赞扬。他参观了公认的虔诚牧师的教堂。他如此支持神学是否是出于爱好，亦或是被传教士过人的演说才能所说服，现在的我无从得知。不管怎样，宗教在他身上的烙印之深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说，他有可能推崇的是理智信教，而不是盲目的虔诚。毫无疑问，新的国王更喜欢对历史事实进行抽象，当然，他对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也有一定的了解，因此，历史的进步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除此之外，他对理解重建新时代的影响也并没有敌对情绪。腓特烈四世从来不做冒险的事情。他的脑海里一定有一个目标，尽管目标是什么需要时间去证明。他从不会疏忽国事，并且还乐于听取不同的意见。尽管他信仰基督教，他还是会为自己对公共事务不熟悉而感到悔恨。他宁愿改变发展方向，也不愿意重走回头路。他的内心热情似火，他的理智会克制住强烈的情感。当我们能够运用上天赋予我们的能力控制住自己情感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有成就感。我们可以尝试画一幅肖像，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个尝试纯属敷衍。

范哈根·冯·尹泽的思想催生出了许多热衷革新的人物，以至于我都很好奇，他们中的某一个，比如当时的改革家根茨（在腓特烈三世登基的时候就毛遂自荐地写了一封请愿书），到底向新的统治者提出了些什么紧急的建议。如果按照忒勒玛科斯为王室继承人们准备的文书中所主张的理念来做，就会和马基雅维利做的一样少。王侯不应该信任一位奉承的臣下，蒙托尔总是如是说；弗劳伦迪尔说建议通过一方政治力量压制住另一方政治力量；但是我们没有生活在凡尔赛，也没有生活在佛罗伦萨。还是人们把好的教育条件都给了皇室！如果大家只在确定的某几种情况下使用它们，它们就会显得特别可笑，或是它们认为贵族群体天生就是应当受到嘉奖的，这就是生活在19世纪文明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对自身社会地位的理解。更困难的是给出一个能够解决当下问题的建议。如何解决天主教的问题，如何开启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的通商；如何开始实现制定宪法的梦想？给新君主提建议？他花了很长时间来观察父亲是如何管理国家的：因此早就做好了

接管这个国家的准备了。胸有成竹者，必定会功成名就！ 腓特烈四世很有可能震惊整个欧洲。

我们说了太多关于腓特烈二世的事情。一说起他，第一个跳入你脑海的是什么？西里西亚战争？君主集权？不，都不是，你应该赞叹的是腓特烈二世的个人魅力。腓特烈二世自由的、独立的、开放的思维方式是他的核心魅力所在。你可以在腓特烈遗留下的文件中找到那些在现在看来有些危害国家发展的观点。.毫无疑问，带着对腓特烈大帝的无限崇拜，民众们当然对他的接班人有着更高的期待；推崇过去通常会导致对现实的不满。

如今的统治者们能从腓特烈大帝的身上学到些什么呢？值得学习的方面更多的是人，而不是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腓特烈二世的所有的做法，而是要更多地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认为提供治国理论的理论家们都是骗子，比起未来，他更注重的是当下。腓特烈对宗教的看法虽然不利于教育，却有利于教堂，并且还能够推动科技进步。他的做法不利于促进新事物的形成，但却有助于打破旧的糟粕。我们可以把他当做武器来使用。这种泾渭分明、不带偏见的性格正是腓特烈二世身上最值得后人学习的品质。如果你能够耐心读一读他的批文以及决议草案，你就会感觉到，他的痛苦没有人能够给予安慰。是他的理想和热情支撑着他积极应对每一个突发事件。民众如果要控告一名大臣，就不必害怕这一诉讼最终落到了对方的手里。

民众对腓特烈四世的期待是急切的。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双亲开追悼会。幽暗的云杉树林埋藏着双亲的遗体。民众观察他观察得过于仔细，就好像真的能从他的眼睛里发现除了泪水之外的其他东西。他最终还是没有彻底推翻父亲的政策，没有让任何一位支持旧秩序的臣下卸甲归田。但是，他始终没有停止尝试。或许接下俩的一步就是重新竞选部长，克里翁已经摩拳擦掌，削尖了笔，把手臂放在新的历史书上，抱着严肃活泼、满心喜悦的希望倾听着。

1. 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 Gustafsson Oxenstierna af Södermöre（1583～1654年），瑞典政治家。首相(1612～1654)，他奠定了瑞典中央管理的基础。（译者注）

3. 巷战歌（1848）

巷战！巷战！铁壁铜墙、钢铁长城！抗争吧，向往自由的同志们！肉体消亡，灵魂永生！筑工事，挖战壕！拿石块，垒长城！端起枪，拿起炮，占领每一条街道。

看吧！敌人来了！不要害怕！不要退缩！用子弹击穿他们的身体！瞄准镜支离破碎！墙壁伤痕累累。亲爱的兄弟们，挺起脊梁，永不后退！

用犀利的目光，消灭敌人！发射炮弹！军官们，能否放手一搏？命令你们的士兵！向着国王，开炮。

我们谨慎地穿行在街道小巷，牺牲了一个，又有人顶上。攻占了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小巷，直到第五条小巷，所有人都升到了天堂！

顽强坚守三天，当黑红金旗帜第四次飘扬起来，德意志民族就能得到他们梦寐以求的渴望！

4. 要不要州议会（1848）

那些深刻影响了人类的大问题，往往都是从小问题发展而来的。在葬礼之后，新君主走到柏林国民议会颁布决议的地方，想要知道议会的看法是什么。他发现，现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热烈地讨论着选举法和州议会。其中有一位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因此，大家就把他选为议会的主席，尽管这个职务并不是那么令人高兴，但是他也不能够拒绝，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每个人都认为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决策是公民义务的时代。经过拉锯式地长时间争辩，陪审推事Jung，Oppenheim博士和工厂主Lipke与24日向部长Arnim提交了共同签署的反对创立议会的决议。

在此期间，问题变成了制定议会的标语和党派的标志。那些看过3月18日和19日革命的人，根本不想成立一个统一的州议会，而那些看过暴动的人，则认为我们需要州议会。人们之所以观点不同、互相争论的原因不总是出于责任感。我的观点是，我认为问大众这样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你们想要一位君主立宪制的国王吗？你们觉得内阁制好还是维持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好？等等。这样的问法看似是给了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实际上却是变相地胁迫了民意。因为总有些不明就里的群众盲目地回答道：我们要君主立宪，我们要取缔社会等级等等。可是大家不会去想，只有我们的国家先有了宪法，才会有下一步的君主立宪，可是我们的宪法现在还是一片空白。州议会通过集体决议，承认了国王的统治地位，这就表明了，州议会是受控于君主的，而宪法则不同。因此，成立州议会是否是实现君主立宪的有效途径，还是一个有待讨论的话题。

州议会像一个周岁的婴儿；它为我们的政治环境注入了新的血液，也使我们原有的观念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而地方利益相关者则对大家给予州议会的这种好感持怀疑态度。书店的架子上还摆放着许多过去议会会议的照片：大家觉得现在的形势一切大好；期待着过安宁的日子，与周围人建立亲密友好的关系，股市的行情也是一路飙升。过去备受压迫的人会感觉到，他们的时代来临了。他们想像罗马人投降的方式那样，让外套飘在风中，用足够让我们坚信不疑的谎言帮助更多的人。所有的这一切都非常糟糕，会使得国家机机构的决策依赖于君主的恩赐。

有人说，我们不能够抹杀议会。难道你期待着它自己自动消亡吗？我承认，我不愿意肉体坐在议会会议的椅子上，脑子却想着如何才能挨过这么长的时间，想着会开完我要去干点儿什么。事实上，许多州议会的议员都是这样的。他们低着头，脑子里想着：我怎么会干这个事情来的？我是贵族阶层又如何，没有宪法、没有立法权、没有管理权，只有前来定期开会观礼的权利。我们早已经觉得，自己已经不在像1815年时期的贵族一样拥有无上的荣光了，现在的我们除了在议会里面以州议员的身份出席、去杜塞尔多夫、明斯特、柯尼斯堡和布雷斯劳代表民众的利益出席一下会议，还有那一点可怜的在2月3日为君王授权的自由之外，什么权力都没有。

政治应该以此为前提，他们做好如下思想准备：

1. 州议会是不完整的。
2. 州议会的功能并不健全。
3. 有可能受到民众很强烈的抗议。

这难道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和平和有序能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吗？

此外：德意志国会议员需要从州议会议员中选出来。德国的民众到处都在激烈反对。法兰克福议会宣布，议会绝不会吸收那些想要代表普鲁士民众的贵族做议员。这一步重要举措之后，又产生了新问题，这个问题则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为了解决乱象，民众要求取缔州议会。这时候的普鲁士急切地需要整个德意志民众的同情和支持。

首先，我们要组织召开立宪大会，这样才能够讨论立宪问题，才能够吸引那些新阶层的人士（由国会决定的）参与其中，或许这些新的阶层比我们更加的重要。如果德意志国会想要开会讨论4个以上的、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的话，那么德意志所有国家的等级代表会议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格为州等级。为什么我们要讨论制定选举法？此刻它涉及到的只是普鲁士的立宪大会，这必须要建立在充分的书面材料上，不是单纯的 – 数量上多，而是满足需求即可。（代曼）的知识，足够为立宪大会草拟选举法。他也足够公正，能够从历史的角度来考量，而不是一味地听从君主的命令。

重新再谈一下之前所说过的那个有待讨论的话题，即没有州议会的君主立宪。我觉得这简直太不择手段了。我们的立宪制君主还太年轻，是按照刚刚制定的宪法选举出来的。普鲁士法律很快出台。公民必须用平和的方式来履行言论自由的权利。通过呼吁民众，君主宣布成立立宪大会！只要我们遵循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原则，那么无论我们以什么形式组织选举，都会使那些能够掌控现在和未来的人当选。因此，那些诽谤选举是“暴力胁迫”的言论，无疑是站不住脚的。国王是时代的代言人，他的所想即是我们所望，他所颁布的法律就是自己口述的合集。他甚至可以干脆这样说：我近日以来向大家许诺了很多，取消了阶层，内部的，外部的，德国的，普鲁士的，柏林的，没有人能说：没有贵族阶级的支持，国王就不应该成立部队，不应该戴德国的帽徽等等，只有在选举问题上，你们才想谈论社会等级的问题？最危险的问题是，最应该恐惧的自私在哪里？

统一的州议会包括对我们很友好的和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将会在新的选举中得到一切！过去有优先权成为州议会议员的那些市议会议员、乡镇议会议员等人，新的选举法施行以后，也失去了优先的特权。我也没有发现大家对州议会有任何的诽谤。比如这样的话：有那么多人，为什么不是他？温和一点儿可以这样表达：州议会就是君主仁慈的礼物。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够马上取缔固有的社会阶层。他们想要参与州事务，当然也包括参与立宪大会，制定选举法，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默默地为改变家乡做出贡献。情况也有可能是这样的，德意志国会只希望各个州的贵族阶层参加，而不希望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在柏林，实现各个阶层的统一完全是武断和偶然的，没有任何一个阶层的人能够伤害那些反对统一的人。

不要受那些破坏法律、暴力取缔、单方面专断的影响。这些都会把你们那些好的、诚实的、自由的想法埋葬。如果我们有了宪法，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自上而下地终止这种单方向的统治。可是现在，当这些禁令撼动了君主统治根基，推翻了那些在不久之前还被大家所承认的法律条款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选举法不是国王制定的，而是民众制定的，是一种短暂的胜利。

卡尔·古茨博士

5. 普鲁士和德意志王位（1848）

从崇高的、爱国的立场看来，人们不能苟同，南德由于我们的行为导致的强大巨变酿成了三月18日和19日的事件，并且通过这沉痛的事实，在德国重生之际否定了普鲁士。因为不论人们针对国王本身作何评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直指国家，直指普鲁士，以及更加敏感的德意志本身。

人们提议统一德意志，前提是选出一位短期或者长期的首脑。自从普策尔的《两个德国人的通信》（Briefwechsel zweier Deutscher）以来就已确定，思想先进的、德意志的、慷慨的革命党派本身就已经一心向着普鲁士支配权了。南德的代表心怀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组织计划来到这里，首先支持同样的精神、同样的意见，而到了3月18日和19日，普鲁士就突然变得“不可能”了？这种行为在政治上是轻率的，并且有双重的不公平性。

为了说得更明确一些，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在奋斗？我们希望德意志的君主集体归于统一的政权，在法兰克福（地点选得并不好；莱比锡，哥达，魏玛，纽伦堡会更好）选出值得崇敬的、有威严的代表，代表他们的利益和回忆，并让一位暂时的或长久的，世袭的或非世袭的联邦首脑统治整个帝国。如不从十分重大的意义上废除我们的君主，这就是行不通的。较小的君主好像并没有反对顺从这种愿望；而诚然即使是更大的君主，那些叫做国王，或者因为封地的原因仅仅应当称作大公或是伯爵的那些人，我要说，他们本身对联邦有足够的热忱和情感，以至于他们已自愿交出他们的统治权，在祖国的祭坛前承诺让位了。甚至有一位国王认为自己无力再反对这种趋势，便放弃王位，让他那位更支持这种理想倾向的继承人上台了。人们也一直只

希望得知奥地利领地的个别地区愿意表示支持，而且即使维也纳的政治运动——梅特涅的倒台在我们的心中引起了对于昔日皇帝家族的短暂支持——也只能是暂时的。为什么只能是暂时的？因为首先，当前皇帝的性格并不令人满意，其次，维也纳的暴动缺乏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合理的自由滋长的基础；第三，法兰克福的人们不可能再愿意德意志再一次陷入哈布斯堡家族在全欧洲范围内的政治牵制之中了。为了重建德意志，人们一定不能再将涉及奥地利的因素牵扯进来了。奥地利只能是名义上参与其中。

那么现在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就是普鲁士的支持了。普鲁士坏的部分的确已经开始从内部分崩瓦解了，而且随着同其它德意志邦国的融合，还会进一步瓦解；普鲁士好的部分对德意志而言却如此至关重要，以至于倘若将普鲁士并入德意志的这一想法仅仅因为一个事件——我们稍后会加以讨论——仅仅因为国王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成了泡影，那就会是愚蠢和盲目的。你们在海德堡和曼海姆能给出什么样的替代？在千人集会上宣传说自己受到威胁和诅咒，唱歌等等是很简单的，但是对于事实冷静的考虑应当会迫使你们抑制住自己的不满，并且不要因小失大！

孤立普鲁士，便会孤立普鲁士如今仅从名义上受宪法制约的普鲁士国王——不应当随意把此人抛在一边——就可能因此对重建德意志构成重大威胁。现在各省的精神领袖都在反对普鲁士政权，波美拉尼亚和乌茨寇马克的法国武士激起了农民疯狂的老弗兰肯式的[注]忠诚和贵族的愤怒，军队不悦，军队的许多首领都心存怀疑，整个管理机器还在老旧的轮轴中运转，波兰期待着和平的不流血的复辟，可能会在演说的噪声和兄弟情谊的说教中就让这事情不了了之，武装完整的统一的俄国清楚地知道，它想要什么都能做到，不受波兰的阻挠，而普鲁士又毫无准备，处于分裂中，犹豫不决，国王又心存不悦，你们的抗议使他变得冷漠，东边的大潮涌来……那该如何是好？南德和西德

的统一只是纸上谈兵，对于帝国军事力量的怀念又不能鼓舞士气，不能产生信任。

普鲁士的历史使命是成就自己，随着历史潮流发展，并且不断发展、扩张。德意志若是吸纳了普鲁士，只会变得更强。你们为何要拒绝普鲁士？它难道不是一个愿意与你们合并的新的普鲁士吗？你们还不信任那被你们讥笑的柏林吗？不正是它在此刻独力向你们证明了德意志如今仍然可能抵抗暴力入侵和无理要求吗？柏林成为了德意志精神上的首都，不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勇气，而且也是由于它出于政治和社会上的考虑而在此提出的诸多问题。人们几乎不可能脱离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简化抽象，柏林的民众燃起了激进的情绪。

我认为现在对普鲁士的孤立既不明智，也不公正，并且体现在两方面：对普鲁士人民的不公，对普鲁士君主的不公。3月18日犯下重罪的是所有德意志君主的罪过。在维也纳像在柏林一样对群众开了枪，废黜梅特涅之后若是没有立刻提出可行的妥协政策，这里就也会上演同样大规模的杀戮了。梅特涅已经摇摇欲坠，以至于一场街头运动就让他倒台了。柏林的斗争纯粹是一场屠杀，人们为军队本身、为军事国家、为警察暴政的国家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简言之，它就几乎是一场个人的歼灭战。每一位德国的君主，身处在这些将军、这些具有军事头脑的亲王和这种已有百年历史的傲慢的包围之中，也开了火。为此，国王本人完全不需要成为“伯劳鸟”（刽子手）和残杀者，他为此向海德堡人民发表了演说。这纯粹就是他的地位导致的偏见的体现，他军事素养的体现，他顾问的应声虫，他兄弟和所谓青年时期的朋友的傀儡，他们假装虔诚，或多或少蔑视人民。人们还要算上他自己对他在位以来八年时间充满争议的统治的情感中有多少不安和依赖，在此期间，他作为一位已逝的时代风尚的浪漫主义腔调的拙劣模仿者，作为永远在绕圈旋转的时代的旋风，他凭借不可否认的意志，想要做得公正、明智、崇高，凭借他的良知，想要表现得善良、公正、明智、高贵，却总在世界面前显得完全相反：他正是最不公正

的，3月20日，他见证了对完满的回归和新生的兴趣，他拒绝高举帝国的旗帜，并且拒斥了一位最近影响他内心的人，不愿从德意志事业的热情中冷静下来。为了实现在法兰克福制定的计划，我们还需要我们君主的人格担保。后悔还来得及，对于众望的需求，普鲁士国王被唤起的热忱还能在法兰克福决议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除非群众一开始就做出强烈的表态，否则为何要抓着19日在柏林、卡塞尔、卡尔斯鲁厄、汉诺威发生的事情不放！在有些我不愿明言的城市里，我们君主用语言谋杀的人比柏林这里的枪杀还多。

只要我们愿意转向君主立宪制，德意志在普鲁士旗帜下的重生就是当下唯一有效而且最有前景的解决方式。你们若希望德意志的统一终得圆满，就只能让最强大的人坐上最高的位置，而你们觉得他人格中缺少的东西，就由他的人民中的天才人物来弥补吧！

这些观点若是不被接受，若是因为无法克服的一己之否决而失败，就会出现如下情况：我们首先出卖俄国尚不知情的波兰叛乱，因为在泛斯拉夫的领导下变得和平的波兰可以轻易同沙皇和解。第二，俄国入侵时会看到一个支离破碎的、缺乏军事秩序的德国，一个当下自我混乱的普鲁士。最后，第三，谁能保护我们——面对背叛，面对根深蒂固的、令人恐惧的……密谋？所有这些事件都潜伏在不远的未来，倘若南德的拒斥和抗议就像起初那样继续下去，那么，那位以人民的伟大使命为己任的普鲁士国王就会明白格维努斯在最新一期《德意志报纸》（Deutsche Zeitung）中对他说的话了。

---

1. 弗兰肯（Franken或Frankenland），又译法兰克尼亚，是德国的一个历史地区，大致范围是巴伐利亚州北部、图林根州南部、以及巴登-符腾堡州一小部分。

6. 因诽谤而辩（1850）

本报第43期里有一位匿名者——编辑部居然对此人表露敬意，将他恶意的怀疑用政治文章的大写字体发了出来——在下面签字的人可能因此就不能再做皇家剧场的“技术总监”了，因为——他缺乏一些必要的戏剧理论知识？不。或者人们认为他虽然不是共和党人，却仍然是一位拙劣可疑的作者？也不是这个！那么是为什么呢？他做了某种更加令人厌恶的事。1848年，他为了参加“三月革命”，特意来到了德累斯顿。那位好心的“旁观者”小心翼翼地说道：“似乎如此。”好一个微妙的“似乎如此”！为什么不更大胆一些呢？为什么不直接说，我指挥了路障的设置呢？

1849年五月我在德累斯顿——其实我并不需要去那里——的确受命建造一处路障。五个神志健全的人拿着石头威胁我接手。我跟他们说：放了我吧！我不是建筑师！没用：“见识应当已经教给你了！”我一开始并不温和地说：各位，为了德意志的统一，我通过文字所做的比我在这里用石头能做的更多！让我从当年的君主暴动中脱身吧。当然了！我的“旁观者”要问了，我为什么不能也藏在某个地下室里呢？我为什么就在1848年那个三月的星期日在柏林的城堡前，并且看到了不受限制的人群狂潮和暴怒呢？那位拙劣的“旁观者”说，警察总督米努托利（Minutoli）先生也需要为此作出报告。从历史的兴趣来看，没有人能比我更希望那位友好的，并且在平和的日子里日进斗金的冯·米努托利先生来讲述一下他当时的经历了。然而我却希望，菲利斯·利赫诺夫斯基(注)还活着，并为我作证，他当时命令我说：“朋友，您必须讲话！您必须如此！我不会放过您的！”“说什么？”“说您想说的！我嗓子已经哑了，说不出了！说吧，安抚他们

吧！”——那好吧，我说，我在那爱国的、天性所导致的、勃兰登堡市民式的、对故城的激情中——那时还没有意识到后来可能会被解释为革命的放肆——听从了国王所说的：“来给我建议！”我向他呈递了一封信，在信中向他建议，在崩坏的秩序中给出某种新的思想，把群众从法律上连结到一起，分散精力，最好是市民武装的思想！“您说说这个吧！马上！就在这儿！到这边来！我不会再让您走的！”我说着，而群众——所有的妥协他们都几乎不懂——又被传播了某种新的、暴力的、简明易懂的想法。人们都知道，国王对于那个周日早上在城堡发生的事情表示了感谢。当然了，自我吹嘘，没有公职就自诩为政治家！非常值得赞扬，不像那个混在“游行的学生”中的胆小鬼一样跳到面粉袋里，并且喊道：火还烧着吗？当时谁要是跳到了面粉袋里，当然就永远都被染白了。

这件事还继续这样发酵了几天。我的“旁观者”说，我在3月18日之前就已经开始“筹划活动”了，那么我就来给他说说我在3月18日前后做了哪些“筹划活动”。6日，我携妻儿到柏林度假。从那时起直到18日，我在俄罗斯旅馆（Hotel de Russie）写作戏剧《欧特弗里德》（Ottfried）。从3月22日到4月22日，也就是在革命达到高潮的期间，我守在一个孩子的病榻前，和一位夫人临终的床前。哦，你这讨人厌的“旁观者”啊！我如此详尽地回答你恶毒的控诉并不是为了什么“技术总监”（缺这个职位的不是我，是那家机构），而是因为席卷柏林的这些揭底之论，这些谜样的言论：这个人昨天在某条路上！人们看见他在这儿和那儿同某人以及某人交流，等等，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是真真正正的耻辱，让人想起最阴暗的罗马告密者风行的时期。

如果有人说我在我所担任的形形色色的岗位上为德国的舞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了贡献，并且在皇家剧场做出了美学上的进取，却还是如此“不知趣”，在政治事务上更偏左而非右，那么我就也无能

为自己辩护了，并且不会作出辩护。不过对于这种在我人生中绞尽脑汁、图谋不轨的指责，我将报以蔑视。

1850年2月23日于德累斯顿
卡尔·古茨科博士

---

1. 全名Felix Maria Vincenz Andreas Fürst von Lichnowsky，温登堡伯爵。

7. 瓦尔哈根日记（1861）

我们不想重复某些报刊中关于从柳德米拉·阿辛(注)舅舅的遗物（二卷本，莱比锡，布罗克豪斯出版社，1861）中透露出的关于她的新信息中找到的负面内容了。表示敌意和轻视的人主要来自认为同这本日记中的积极方面相关的地区。

1835-43年间（就是上文所说与那两本日记相应的年份）经历过个人歧视的不满与压力的人，瓦尔哈根的记述为他们说了话，他们原谅了其他人想要谴责的大部分事情。再次经历那个悲伤的充满迫害的时代以及最终倒台的暴政，并回忆起最小的细节，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刺激。能说出如下内容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享受：不论如何你也参与了你生命最深沉的呼吸，感受到了同样的强盗暴力，期待着同样的更好时代的太阳光辉！古老的氏族在这份瓦尔哈根的记述中又一次遍历了自己的生活。

而这也是这份出版物积极的一面，它传扬对时代和人民的奉献，对谨慎时代、对外来文化、对陌生命运的崇敬和虔诚，并且完全以对未来的憧憬满足自己，而我们对未来总是怀有同样的匆忙期待。对时代的追求越是广泛，时代精神的作用越是普遍，这种对于个人生活的关注，对于个体事务和个人事务实际观察的意义就越重大。瓦尔哈根此前的观察并非完全出于好奇，更不仅仅是因为喜爱命运女神好诽谤的低语；它源自于一种个人崇拜，我们对此不愿加以谴责，也不愿对它有可能的反常作出评判。

这两卷书中有什么样的精彩信息，所有报纸都已经说过了。我们的确能够理解，用一种比一般因人而异的特性更加令人起疑的方式写

日记是有可能的；我们面前摆着的这种艺术或者非艺术的最终成果却可以令人有所启发或者有所得。可以假定的是，具有一定分辨力的人不会认为这些匆匆写下的说法是权威的——可能会在心中否决其中可能值得各种赞扬的内容——然而这些爆发可以净化空气；这种谨慎会被它们向外传播。它对位高权重的人已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至于他们必须一直承认：虽然这里没有警告有捕人陷阱的加害，不过每一步都要小心，不要粗心，不要草率。

我们也必须看到这部出版物最有趣的一个作用，我们可以了解某些崇高领域中最不寻常之事，还有看起来几乎难以置信的（自然性）。这些关于上文提到的年间的宫廷、君主、普鲁士的政治家的轶事可能有三分之二都是不正确的，或者只是空穴来风；但总还能留下足够的内容，给我们一副这不断动荡的图景，围绕着出众的世俗权力上下摆动。狂风就这样总是在独立的高大教堂周围回旋，在传说中魔鬼早就已经在那里玩他最有趣的游戏了。瓦尔哈根让君主和统治者说了足够的话，分享了足够多的从权贵嘴里说出的言辞，那是他亲耳所闻，唤起如下想象：时间以及千般责任的确会让你们这些统治者感到惶然，它们就威吓地站在你们身边！这世俗世界中未完成的建树就这样来回追赶你们；莽撞、愚鲁和某些人类的苦难就这样带来了并非（！）绵延不绝的后果，我们这些远远站着的人们几乎察觉不到其中的缘由！报纸中的一切都如此冰冷完满，然而在舞台背后这里的一切都如此热切地沸腾着，波动着，才刚刚成型，如此不完整，如此瞬息万变！这些手可以创造出强大的工具，却并未掀起狂风巨浪！我们很久以来都没有像这本日记中所说教的那样对真理和正义的胜利怀有信念了，它将世界的掌权者展现为同我们自己一样需要帮助的人们。

---

1. 柳德米拉·阿辛，全名Rosa Ludmilla Assing（1821-1880），德国作家，曾用笔名Achim Lothar和Talora。

8. 瓦尔哈根日记的暂时结尾（1862）

关于瓦尔哈根日记的存在，以及由提早出版引发的震惊还有多重的思考，我们无需赘述。现在公众可以读到它，这仅仅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算计。它本身就是一种指控，而眼前的例子不论如何都无需陈庭审判，因为人们只需承认与此相关的仅仅是文学历史上的事件，心理上的谜团，同一位杰出人物生命中至今未公开的不寻常现象有关。作者本身应当期待那些一直心怀嫉妒并愿继续如此的人解除戒备，他这么多年以来为我们展现了一副中庸的楷模，并且向着时代和世界的核心努力。看到他现在突然这样完全偏离他之前颇有建树的轨道，是十分令人疑惑且十分奇怪的，以至于它仅让我们应当从心理、生平和时代历史的角度上允许将一本书的出版打上逝者的烙印。一位重要人物变得头脑混淆，本身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场既有趣又有益的好戏。

这些1848至1849年间的记述几乎达到了疯癫的边缘，不过，对于共同经历的日子，难道我们就不对自己的感受和思想加以任何病态的夸大吗？谁当年没有站在街头，想要高声喊叫，为了警告人们危险正在逼近？为了揭露虚伪的民众领袖，用庄重的抗议揭发变节者，倾泻所有时代的诅咒？伴随着大炮的滚动和轰鸣声，伴随着人群上迸发的欢呼声，伴随着刚开始的防御工事建筑的噪声，兴奋的幻想，对祖国、对自由的热爱一通高涨，对啊也只有官员客厅和君主内室中平时最安静的想法，为了使他们的意见生效，便设定了莽撞的、虚伪的、同最微小的智慧背道而驰的律法。每天都有新一颗新的炸弹爆炸，为了点燃思想的火焰；还有瓦尔哈根在此处仅仅言简意赅地写下的：“都是些流氓、混蛋、无赖！”我们自己也曾时常喊出或者在牙缝间

挤出这些话来。它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时代最忠实的、最生动的景象，却不幸在它本应为我们呈现的事物之外又将我们引得太远，引向徒劳无功且毫无用处的过去的一年又一年。年轻的一代总是还未领略上一时代，便踏上了舞台，用不上从前的经验。倘若我们当代以及我们的政权本身也无能为力的境况被拯救之时，人们已经忘记了1848年和1849年的教训，那便会是我们祖国不可估量的不幸。

因此，为了让德国在灾难性的危机面前总能够再一次从这些有用的记述中获得忠告，人们应当平静地接纳这份出版物的古怪之处。那些此处描述为“流氓”和“混蛋”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还活着，却并不应当相信，因为他们在此处被这样称呼，人们就会真的认为他们是这样，并且在历史中这样彪炳他们。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应该已经足够实实在在地为他们的行为负了责任，可是这些人也会认为，公众相信他们的悔过，相信他们的良心发现。不论如何，这两本新出的书的语气表明，这份“日记”的编纂者的确受到那个时代的伤害，并且常常因为他的期待受到背叛而感到心碎。这种痛苦让人感受并呈现的那种真实，实际上是令人不安的，并且使我们不仅与他描述中的刻薄本身和解，还使我们与瓦尔哈根性格中的某些方面彻底和解，我们此前并不能与之交好。我们在此遇见一种对新时代正义的信念，对自由的最终胜利的信念，对人民的价值与高贵的信念，他在最著名的自由英雄的作品中并不能找到更加美好的信念，不能在富兰克林身上找到更纯粹的信念。

这些新书也会在许多方面提供用多种方式了解它有趣内容的机会。我们的报纸篇幅有限。只有一个评价是我们不愿克制的，它同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政治特征相关。那些年的确有大范围的混乱，然而最混乱的还是发生在柏林。我们此时所想并非是巴塞曼式的人物，不是无助的被人耍来耍去的国民军，不是在任何时代都难以征服的柏林街头精神，而是智识的领域以及享有特权的政治家。后者奇怪地招募了反对派的公职人员，让已有部署的军事人员退役，瓦尔哈根本人就是

这样一位已有部署的外交家。这一领域中的来来去去，发生的事情，还有先见之明，诽谤污蔑，搬弄是非都如此令人瞩目，以至于关于王位的危机，人们对民主领域的关注远远少于对国王如何培植自己的党羽的关注。虚荣、不可靠性、复仇、恶意的幸灾乐祸再次同一种无赖式的幻想相结合，毫不间断地警醒自己和他人，并且想象着一艘在风暴的旅途颠簸中沉没的小船。这便是那种人和那一地区的令人担忧的性格，众所周知，他们的目的是德国的霸权，并在危险之中目注于战争。人们若考虑到战役初期或者屠杀前夕这些特殊的柏林-普鲁士的因素，如此非凡的智慧，如此非凡活跃的想象（仅仅是因为恐惧！）——同八分之三拍的长篇大论中的相结合——就会令我们忧心忡忡了。

三、3位柏林戏剧大师

1. 恩斯特·劳帕赫（1840）

劳帕赫在柏林的情况似乎有些尴尬。他的朋友有时候也会觉得他写的新剧索然无味。可是，我的观点却是，比起总是一成不变地上演老作品、一直在用同一种戏剧效果来说，他的新作品也不是差得不堪入目。劳帕如此赫幸运的现状是值得被艳羡的吗？他每年的固定工资是600塔勒，每上演一幕他的剧，就额外收入50塔勒，尽管他写的戏剧并不应该再继续上演了。不管怎么说，几乎他写的每部剧本都很受青睐。如果其他的戏剧家把自己的戏剧搬上舞台的机会少的可怜，那么整个戏剧圈子就会裹足不前！只有与舞台紧密联系，不断地探究表演，才能够体会到戏剧的力量和魅力。因为如果你没有机会亲眼看到自己的错误，那么就永远学不会如何避免犯错。显然，劳帕赫阻碍了戏剧文学的发展。剧院会优先选择上演他写的那些传统的戏剧，每年只有4部新剧上演，其余的时间都在演出传统戏剧。

还有一个问题：（劳帕赫写戏剧的动力是什么？）要成为戏剧大师的热情？不，他只是被认可了而已。亦或是坚持不懈的精神使然？不如这样说：我甚至相信，劳帕赫是在衡量过他的能力之后才坚持走戏剧道路的。大家还必须再给他十年时间：每年4部戏剧：十年之后就有40部戏了！这之后会遇到瓶颈吗？如果劳帕赫吸收了柯慈卜戏剧的多样性特点，那么戏剧的发展就会少走很多弯路。观众和读者总是相信席勒笔下的历史，总是喜欢在同一个剧院里欣赏同一个演员的表演，——我们不能责怪观众如此选择，因为尽管我们提供给观众的戏剧形式很多样，可是内容都差不多，毫无新意。还有那些演员，因为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浪费在记那些特别容易的旧台词上了……

2. 路德维希·蒂克㊟及其在柏林的舞台实验（1843）

千真万确，继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之后，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有幸要在柏林皇家宫廷剧院上演，并被确认为下一场演出。人们相当一致地认为尊敬的朝廷议员蒂克是此事的始作俑者。门德尔松已经准备好为合唱队配乐了。语文学家门已经准备好了深奥的论文，好用来填满柏林报纸的缝隙。

然而美学的、生动的、生活在时代中并且为时代而生的评论却无法苟同于这种喜悦，相反，它必须带着公正的反感看待这种伪艺术的行为。它必须直言不讳，从表面上复兴古老时代荒废的余烬所浪费的精力，对于现代而言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贬损。是啊，不仅仅是一种贬损，而且是一种对现代的侮辱。

蒂克无视我们的时代。他喜欢在这种对于他所处时代的恶意中取悦自己，随心所欲，在德勒斯顿读书的夜晚，在无忧宫的橡树下，凭借他的影响力，剥夺了现代的生动的权力、生存的权力。诚然，他乐意在私人剧院里将从埃斯库罗斯到郝尔拜㊟的所有戏剧按照他的版本排演出来，仅有一个民族，仅有一个时代以及和其权利相适的舞台应当在时代面前保留，成为业余爱好者的牺牲品和对同时代的文学史性的抗议。冯·屈斯特纳先生倘若软弱到了自愿——或是为了票房考虑——成全这种同他的编剧理论相去甚远的妄想，那就不妙了。他的影响力要是如此微小，以至于他不情愿地成为了对他说出的愿望的驯顺的仆从，那就更不妙了。

路德维希·蒂克用以向我们的时代展示他彻底的蔑视的途径，是一种半吊子的实验，建立在沙子上，不论如何也不会对艺术和文学有半点用处。《安提戈涅》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爱人吗？《美狄亚》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悲剧母亲吗？在一个表演艺术刚刚能够展现自然的真实以及直接的灵感的时代，我们需要说抑扬格的男女诗人们吗？为了启发对更高级的表演艺术的感悟，我们需要这种帮助吗？——它以不合比例的音乐支撑着，通过朗诵戏剧只能达到暧昧不明的效果。古代悲剧的世界观于基督教而言值得赞美吗？于现代诗人而言值得学习吗？——他要展现的命运与那盲目的、绝望的、呆板的古代的命运全然不同。诗人、演员和公众通过这种空穴来风的东西能够变得更完善、更圆满、更高贵吗？

我听说，这种古典幽灵的朗诵也完全不能达到此类实际用途。那么这种东西的意义就仅限于其自身，仅仅是文艺历史学家的纯粹实验，满足艺术美食家的胃口。那么人们就必须由衷为这种冒牌货感到惋惜了，他们把这由灯光照亮的，关在房间里的，由现代音乐伴奏的悲剧当作古代世界的希腊悲剧。要是把跑马场的屋顶揭开，把木地板和草坪掀开让跳舞的合唱团站上去，给出一些看起来跟罗马和西西里的古代剧场遗迹大概差不多的东西，我们就会带成群结队的中学生去看你们的古典戏剧啦！将要作为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 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它们本身，并不是你们清白的才学，并不是你们对于昔日的无害的欣赏。不，你们拿狸猫换太子，带着显然的论战倾向。你们向公众捏造出了一种从未存在过的艺术流派，为了你们的虚荣，为了你们对不幸比你们更年轻的现代的厌恶！为了绕开“时代的偶像”，你们捏造冒牌的神灵，从未存在过的神灵，灯光下的英雄、神像、依赖提台词的人帮助的俄狄浦斯、站在升降台上表演的克瑞翁[注]、懂得对位法的合唱队！你们从一开始就是谎言、不男不女、像陶土管子里吹出来的空幻的肥皂泡！你们这样背叛你们的时代，这样欺骗艺术，应当感到羞耻！

蒂克整个文学生涯的基本特征就是轻浮。一切机巧、一切将自己作为组织机构运转的、一切空幻并想成为实际的，一切胡思乱想并且装作迫不得已的样子的，我都称之为轻浮。蒂克的出发点从来都没有脱离纯文艺的准则，从来都没有达到适用于一切艺术的伦理准则。他从来都没有认为有任何事物比形式更加崇高；内容于他而言是种负担，削弱了严肃性，只有在可能在玩笑中颠覆神明的时候，万能的上帝才会被欣然接纳。有什么不能作为他的艺术素材的？是啊，他一贯是讽刺的，但是讽刺是有限度的。讽刺应当止于偏见。我们用偏见这个词指代的不是那种学术上的死板迂腐或者艺术上的飞扬跋扈，我们指的是那种从意志到行为，从手段到目的，从开端到终结的偏见。在你的小说、你家庭生活的夏夜之梦中讽刺吧，在精灵和侏儒之中讽刺吧，它们在你才华的绿色林区中让你着迷，任你利用——然而在严肃的神圣领域闭上你的臭嘴吧：历史、道德、国家教育、评论还有舞台，还其本来面貌，让舞台作为更崇高的道德的承载者和喉舌吧：这些观念中至少不容讽刺作为管理者插手。

若是回顾蒂克的文学生涯，人们就会本能地皱起眉头。人们看到了什么？一个活跃的、忙碌的、跃跃欲试的精神，不知如何运用他的才能，至少不知如何以写作活泼诙谐的文章以外的方式运用他的才能。戏剧好像是他的下一个职业。他倒是乐意成为演员，并且想要在这个施罗德（Schröder）劝他不要涉足的领域中做出伟大的建树。他揶揄那位无法演出的喜剧演员伊夫兰德[注]，却丝毫没有寻找替代演员的迹象。他和同伴施莱格尔向荒唐的方向进发，而他们后来必须承认，他们已经很久没有搞出蒂克后来在戏剧理论文章中必须阐明的那种无能的浪漫主义产物一样的破坏了。《伊翁》、《阿拉科斯》、《屋大维》等等并没有为被取笑了的方向给出任何补救，出于绝望，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卡尔德隆、莎士比亚、歌德，而人们反过来又过度赞扬这些，以至于在旧文学和新文学之中在形式上产生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将古典文学的概念僵化成了一种无比宏大的、值得极高崇敬的事物。蒂克在人生中的每个阶段都在抨击新的文学，对于旧文

学却只会兴高采烈地颂扬，蒂克毋庸置疑拥有丰富的素材，毋庸置疑拥有舞台经验，却写不出任何一部剧作。写不出悲剧，写不出喜剧，只字不提表演艺术，这些浪漫主义的小团体尚未轻率地、尚未以那种对于生产而言最危险的方式带来恶名。这么多笑话，这么多戏剧经验，却写不出一部喜剧！意识到自己的无能，这位志向远大的人一定受着折磨，并且对于他的时代如此不满，因此他才更愿意投身古典的舞台，为了不受同时代相关的非议 ……

---

1. 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年5月31日- 1853年4月28日）是德国诗人，翻译家，编辑，小说家，作家和评论家，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元勋之一。

2. 索福克勒斯（约前496年－约前405年），古希腊剧作家，古希腊悲剧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并称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他的戏剧作品如今只有七部完整地流传下来，其中以《俄底浦斯王》最为出名。《安提戈涅》是他在公元前442年的一部作品，被公认为是戏剧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该剧在剧情上是忒拜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但是最早写就的。剧中描写了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将自己的兄长，反叛城邦的波吕尼刻斯安葬，而被处死，而一意孤行的国王也遭致妻离子散的命运。

3. 欧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古希腊剧作家，一生共创作了九十多部作品，保留至今的有十八部。《美狄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美狄亚的父亲是科尔喀斯国王埃厄忒斯。美狄亚被爱神之箭射中，与率领阿尔戈英雄前来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一见钟情，帮助伊阿宋盗取羊毛并杀害了自己的亲弟弟阿布绪尔托斯。不料对方后来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名稚子杀害以泄愤，最后酿成了悲剧。

4. 路维·郝尔拜（Ludvig Holberg，1684-1754），作家，散文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出生在挪威卑尔根，生存于丹麦-挪威时期，之后生活在丹麦。路维·郝尔拜被认为是现代丹麦和挪威文学的创始人。

5. 克瑞翁，古希腊神话君主之一。以底比斯摄政伊俄卡斯忒之兄为主要代表人物。俄狄浦斯凭此得位。曾令于七雄攻城之后不得将波吕尼克斯给予埋葬，并以违反相关命令为由将安提戈涅处死。其事迹见于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之相关记述，晚年为入侵底比斯之先王后裔杀死。

6. 伊夫兰德（August Wilhelm Iffland，1759-1814），德国演员，剧作家。

3. 比尔希-法伊弗夫人㊟和三个火枪手（1846）

冯·屈斯特纳先生似乎以剧场总管自居。媒体的所有辩护，他被人不公地攻击的《剧场规程》（Theater Reglements）的全体段落，于他而言都比不上220000个塔勒。尚不能确定这收入是否完全归功于经营有方，还是更多的是对戏剧日益高涨的热情以及由铁路带来的外地人进城的必然结果。不论如何，对于一个应当做为柏林皇家剧场的艺术机构而言，过于重视数字都是危险的。对于“盈余”的激情于剧场总管而言是最危险的病患，有可能变成狂热的激情，同时一切品味和艺术精神都会陷入迷乱。

我说过，柏林剧场的新规受到了不公的非议。它们读起来十分严格，对于过去已经遭受谴责的弊端以及应当避免的新弊端而言，却是必要的抑制手段。它的起草应当是遵循了某种体制上的程序，也就是说，再制定规程的过程当中应当选举出一定数量的皇家剧场成员的代表。一切报刊中的闲言碎语以及背景中的不满都应当可以通过体制上的程序而避免。然而现行的规程却以这样的一个想法为前提，即显然应当仅考虑效益、并且假定每个勤勉努力的艺术家都有同样的想法。对它的反驳以及闹出的非议暗示着其中缺乏考虑，仿佛自由的捍卫被从诚恳的艺术创作中盗走了一样。冯·屈斯特纳先生的剧场规程并非完美无缺，然而其主要基本原则还缺乏认可。

而且，人员的改善仿佛至少也在演艺事业中受到了关注。挂在冯·哈根小姐美丽的希腊脖颈上的整个戏码目录的重负也应当减轻了。能够将她的一部分职责分担给别人，并且可以在外出期间（在戏剧最

景气的月份里）将她的部分扔给别人处理，就像交在她的姐妹奥古斯特手中一样，她一定十分开心。费莱克小姐来自奥地利城堡剧院，那里有最好的女性舞台力量的真正花朵之一，超越了柏林，身材高挑，可塑的高贵形象，略显尖锐的声音，并且表演中富于情感的转调技巧还没那么滴水不漏，每次仅仅是将角色表演出来，而不是创造出来；不过这位演艺人才还会再继续同角色一起进步。费莱克小姐不具备充满“喜悦与激情的”女性气质的直接诗意的爆发，是汉堡来的威廉米小姐所具备的，这位演艺人才在易北河享有盛名，并且如人们所听说的那样，她同样会从冯·哈根小姐仁慈的让位中获益。在柏林就这样聚集了一群具有魅力与才能的人，他们的到来给冯·屈斯特纳先生带来了许多荣耀。克拉拉·斯蒂奇的纯真，夏洛特·冯·哈根的举止轻快、富有才华的女性角色，费莱克小姐的沙龙贵妇，威廉米小姐充满活力的悲剧女主角，拉瓦拉德夫人宽容内敛的角色，科勒林格夫人的美狄亚和芝诺比阿[注]，比尔希-法伊弗夫人。

停！我们从人事领域来到了剧目领域；因为冯·屈斯特纳先生看起来好像是考虑到这位成绩斐然的舞台女诗人的创作才能才招揽她的，而不是因为她的表演能力。对他而言，她作为小说家比作为演员更加重要。他想要第一手获得她的作品，并以此用比尔希-法伊弗夫人来弥补伍尔夫夫人的离开造成的巨大空缺。

我人生中见过两次《辛科》（Hinko）的女作者的演出。一次是十三年前在慕尼黑演的玛丽·斯图亚特[注]，另一次是两年前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演的玛丽娅·特蕾西亚[注]。两种刻画都给我留下了可以说是极好的印象。她的表现之中有种丰富的，饱满的东西。这位声音洪亮的演员说话时虽然带有一些拜仁州的方言口音，对于玛丽·斯图亚特而言有些奇怪；但是南德方言毫无疑问是适合玛丽娅·特蕾西亚的。因为玛丽娅·特蕾西亚基本不应当像一位柏林皇家剧场的演员这样讲话。比尔希-法伊弗夫人赋予了玛丽娅·特蕾西亚丰富的思想活动和有力的肢体动作。专家们可能会指摘她太过夸张，另一些人则可能会觉

得她千篇一律。够了，对于她作为艺术家做出的贡献，我承认我不愿作出评判。

我本人作为一位剧作家，也不敢对她的作品多言。她远远不止是我们德国的安斯洛夫人[注]。她在巴黎就像罗德岛的巨人一样，掌握了从塞纳河彼岸的剧场到圣殿大道上的德拉斯梦-科密克剧院的全部剧目。对于法兰西喜剧院来说她太过古典，对于圣马丁门而言又太浪漫。她的灵感忽而来源于自身的幻想，忽而又来源于德国和英国的小说（不是法国小说，因为法国的剧作家还得向他们的传奇作家借鉴呢！）这位小说家的舞台经验、布景的想象力、对灯光的驾驭本身以中肯的眼光看来是很突出的。她的才华便是对其自身的称赞。

然而冯·屈斯特纳先生对于比尔希-法伊弗夫人的欣赏过于热情，这是不幸的。他应该对此慎重一些。他应该意识到，一篇以

（《奥地利的安妮[注]》

四部六幕剧，由夏·比尔希-法伊弗根据大仲马小说

《三个火枪手》任意改编

第一部：一张手帕

第二部：火枪手

第三部：红衣主教

第四部：十二天之后）

为题的戏剧不论是否这样摆在公告牌上，都是不适合皇家剧场的。冯·屈斯特纳先生应当提高警惕，不要因为这样的错误让反对者抓住把柄。

可是实际呢！这三个火枪手把亚历山大广场和御林广场弄混了，没去国王区，反而走上了皇家剧场的舞台。角色已经分配好了，亨德里希、杜林、哈根、科勒林格，为大仲马搬出了最好的班底，把他的三个火枪手套上比尔希-法伊弗夫人的制服上了场。冯·屈斯特纳先生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剧目才能完成每年以220000塔勒“证明”自己的任务。尽管布吕尔伯爵要气得活过来，尽管李德伦伯爵在人行道上要在椴树下站住一小会儿，在街角阅读最新的戏剧广告，微笑着，非常讽刺地微笑着，冯·屈斯特纳先生也还是要上演比尔希-法伊弗夫人的《三个火枪手》！

以前的做法是这样的：当比尔希-法伊弗夫人完成一部作品，这部作品就会交给剧场总管。李德伦伯爵会查看这部作品是这位多产的女作家自己写出来的，还是象有些大胆的人口中所说，是把某部小说“残害”后的产物。如果是原创作品，比如《鲁本斯在马德里》，就会受到礼貌的接受和上演；而“烂文”则会被送到国王区那边。辛科、法伊弗罗塞尔、敲锣的托尼都在那里，还有那些并非由比尔希-法伊弗夫人亲自创造，而是从斯托奇、杜林、斯平德勒、布尔沃等人的小说中连带相关情节一同借鉴来的高贵角色。李德伦伯爵（不是作为骑士，而是作为艺术的评判人！）也会把那三个火枪手送去国王区的！

冯·屈斯特纳先生还没上演过哪怕一部尤里乌斯·莫森[注]的戏剧，他遵从的是另一套原则。他把三个火枪手招募过来，给他们披上光鲜的外衣，比尔希-法伊弗夫人如果要把《永远的犹太人》给他“加工”一下，他毫无疑问也会照单全收。那么我认为，这种原则应当受到谴责，应当成为众矢之的。我认为，冯·屈斯特纳先生的上级应当明确告知他，普鲁士国家并不那么急需这220000塔勒，或者换言之，并不需要多出来几千塔勒。我认为，哪怕比尔希-法伊弗夫人也可以谦虚一下，说：“剧场总管先生，媒体在反对您！您让那已经在导演的抽屉里躺了十年的剧本排出来吧！请您不要给我树敌了！”权利和放

纵总是结伴而行，那里的人们认为：只要我们坐在管子里，就可以亲自坐收渔利了……

所以，冯·屈斯特纳先生该让他那位受到群众抗议的宠儿收敛一下了，该当如此！不论人们是否相信，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写下这行字的。对于每种真才实干，我都依照其价值的级别来看待它。我还从来没有写过反对比尔希-法伊弗夫人的东西，我乐于看到她坚定的笔端流露出的创造才能获得成功；我会尽量避免对她原创的戏剧品头论足；我不愿取笑，不会亲自为了这份抗议中讽刺的部分请求原谅。然而冯·屈斯特纳先生值得受到最尖锐的反对，他已有月余没有上演新东西了，在柏林的报纸中以官方口吻用各式各样筹备的借口搪塞公众，然后突然在一片寂静中，在最适合上演戏剧的时候，带来了一出本应属于国王区的比尔希-法伊弗夫人的剧！柏林的各报刊会觉得这行得通吗？它们会不会一致拿起枪来反对这《三个火枪手》？尽管我一行舞台戏剧也没写过，却也还是会认为柏林皇家剧场这种出自值得蔑视的盈利欲望把这种常常用不到二十四小时工作时间凑出来的胡编乱造的东西列入剧目表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

---

1. 全名Charlotte Karoline Birch-Pfeiffer（1800-1868），德国演员，作家。
2. 芝诺比阿（240－275）。帕尔米拉王国国王奥德那特之妻与继承人之一，她上台以后否定了亲罗马帝国的政策，并将其赶出了埃及、叙利亚以及土耳其。后被罗马帝国统治者奥列良所击败，并将其押至罗马城游街示众。
3. 苏格兰女王玛丽一世（Mary Stuart，1542-1587），是苏格兰的统治者（在位时间1542年12月14日—1567年7月14日）以及法国王后（1559年7月10日至1560年12月5日）。
4. 玛丽娅·特蕾西亚（Maria Theresia，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之女，皇帝弗郎茨一世的妻子，皇帝约瑟夫二世的生母，哈布斯堡王朝最杰出的女政治家。
5. 全名Marguerite-Louise Ancelot（1792-1875），法国女作家，画家。
6. 奥地利的安妮（Anne d‘Autriche，1601年9月22日－1666年1月20日），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王后（1615～1643），路易十四的母亲。她是17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女性

之一。

7. 尤里乌斯·莫森（Julius Mosen，1803－186），犹太裔德国诗人，作家。

四、文学柏林

1. 星期天文学社（1833）

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柏林星期天文学社，还有它的竞争对手星期三文学社吧？你至少应该还没有忘记，星期天文学社于四五年前在柏林成立，组织者名叫萨菲尔。该社的名字之所以如此特别，是为了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为了和星期天撇开关系，让后世因为这个社团的神秘感去猜测，从而引起对其的关注，正如威廉姆·阿历克斯是这个组织狂热的爱好者，他曾经为这个社团捐赠了很多钱财。萨菲尔成立的这个组织很快壮大了起来。不过他的学生和仰慕者的数量几乎和敌人一样多。萨菲尔认为，幽默是不需要习得的技能，天马行空的想象可以填补所有的空白，一个人是否有天赋，你在学历证书上是看不出来的。这些就是你能成为一名作家的信号，这个萌芽先从被对手打掉牙齿的牙床上萌发出来，最后再归入他的旗下。

那些在马路上叫卖的丝绸贩子，不去仔细称量自己的货物，而是用心的在推敲萨菲尔所著的书中的诗歌韵脚、哑谜、字谜和谜语。法院的陪审员把离婚法令、诱奸法和打架斗殴法工整地抄写下来，在贝伦街的文学研讨会上与其他人激烈讨论，即便是这样，他们也是十分受欢迎的。在萨维尼学潘德克登法学的大学生们会进行幽默的旅行，用他们的作品装满“邮政快递”和“信使”的邮袋，从而形成了举世闻名的邮政署文学社。彼时的犹太人也已经成功举办了诗歌节，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他们那些天生优质的文学细胞，除此之外，他们还在犹太教救世主的庇佑下，竭尽全力学习一些文学技巧。那个时候是文学社的黄金期，获得了很多成果，也吸引了很多的捐赠。之后，我的朋友哥廷恩也曾经担当过文学社的负责人。还有一个文学社，也想成为流行的风向标。这个文学社是从萨菲尔文学社中分离出来的，因

此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说他们与星期天文学社源自同门，属于同一流派。本段一开始提到的这两个组织［“蔷薇与藤蔓。小说，诗歌的配图和谢拉皮翁兄弟的讽刺小品。”］有一个共同的副标题注解“星期天文学社档案馆捐赠”，除此之外，它们还给出了文学社过去是什么样的、现在是什么样的以及将来可以向何处发展的标准。

20位文学家在这里交流了他们的感悟、想法、见解和灵感。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该用什么顺序来发奖呢，按照姓氏？那就会把叫路德维希·施耐德和路德维希·立博的两个人放在一起，当然，他们两个也刚好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最近才被授予了同样的两块功绩勋章。路德维希·施耐德（auch Both genannt），著有《保家卫国的信条》一书，我想说的是，路德维希·立博，从“我的自白”出发。确实，像大家说的一样，所有的一切都很是详尽，我满足于展示，这两位所写的都是些老生常谈、毫无新意的，都是从海因里希·施密特、费舍尔和施耐德处借鉴过来的。1832年，费舍尔在新年歌里面是这样说的：

一年又过去了！想在书里找回时间无疑是白费力气！

时间有多廉价，人们问作者，如果书中没有时间，那么还有些什么？有很多这样的可笑问题。威廉姆·乔治的“讽刺故事”之所以能引大家发笑，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出奇的无聊。读者们会听到：“根据以往的经验，狂热爱好者往往蠢到家，但是蠢到家的人却从不痴迷。因此，我们可以说，热情是狂热爱好者的专属特点，就连蠢货也理解不了。”。这简直太在糟糕了！“这些粗暴的污蔑大多是针对那些高尚理想的。”我很有兴趣，如果John Bull能够实现第二句歌词，我愿意去让第一句歌词成为现实。“暴民的幽默与未加工过的铁很相似，需要在上面涂上抛光剂，才能让表面闪光。”。“乔治先生，您总不会自己嘲笑自己吧？”想要让自己变滑稽，这种尝试本身就很滑稽，会让您变成傻瓜的。哈！这就够了。

斯密特先生有着丰富的想象力，这些想象力成就了他的荣誉。现在的短篇小说连当时的平均水平都赶不上。

2. 以松柏祭夏洛特·施蒂格里茨[注]（1835）

走出你的蜗居，你这名为“民众”的德国乌合之众！走出你软弱无能的暧昧，你这皮肤褶皱的阉人！你们以健康的、红颊的、微笑的理智承载道德与自豪，意欲何为？你们耸起肩膀、你们谨小慎微。你们道德散漫，乐于思索世界历史中的重大问题，并因自己是大型管风琴的最小音管而骄傲，你们有何作为？你们的基本原则已然腐朽，因为你们并未在历史的土地上树起燃烧的尖锐围栏。你们必将感到颤抖，倘若你们一直以来的自我牺牲——不论目的是否是为了事物的秩序——在现在及未来都极其微小，不停坍缩，无足轻重，仅会成为万千众生之一！你们感到惊恐，仍有人进行灵魂的自我审判，流淌血汗在精神中秘密筑起高楼，宁愿埋骨于自身的废墟也不愿就此为世界所吞噬，如同人们在街巷、学校、教堂、对话中向你们提出的那样！自从年轻的耶路撒冷之死和桑德谋杀案[注]之后，德国也没有什么比诗人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的夫人之死更令人震动的事件了。倘若谁有歌德的才华，并能容忍被人指摘模仿歌德，此时便可写就一篇同《少年维特之烦恼》比肩的不朽佳作。因为现在四处蔓延的正是当今的文化状况，可是其上耸起的坟头却又如此具有独创性，即便诗人的狂想也结不出更栩栩如生的果实。

有位牧师在这妇人冬日的坟前诅咒她的所作所为。这是他的职责。可是我们并非皆领受过神职，未曾在十字架前发誓，人们却还是能在周围听到各种嗡嗡低语，说她神志极度错乱、神经衰弱、听信邪门歪道，但凡有一点忍耐力的人都自豪地拍打着胸脯，机灵地把自己的内里翻出来，为了展示他们十分健康、毫不纠结、完美无瑕：他们

还笑着展出他们在哥达从阿诺德的枢密院拿来的地籍，胆小却又无畏的哲学家则信奉古老的德行准则，认为自杀表露了最大的懦弱。只有少数人认为这里上演了一出宏大的文化悲剧，在那对我们这一时代之痛苦了然于胸的精神的审判面前，本剧的女主角在最后一刻会被宣告为神志健全。此处根本不予审判，仅有宣告。

这悲剧一幕的第一主题也正是爱情，因为这位高贵的夫人带给她丈夫的是一种牺牲。然而这爱情是充实的、饱满的；这爱情以伟大的现实温暖自己，而唯一能使男人幸福的便是这种爱情。那并不是一种惯常的、因习惯的纽带而延续的喜爱，多数女人最终都将这种喜爱投向了子女的实际生活，由此而发，以一种微弱而忠诚的火焰环绕着男人。它更不是那种自私的对美的爱，在寻得崇敬的地方仅愿献身于自己，此处呈现的则是爱情最崇高的理想，一种客观的，理由充分的，根深蒂固的爱情；一种以事实为根基，纽带两端达成共识的，基于同一种世界观，于彼此均显充足，基于成长与认知的生活原则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圆满的，有翔实的细节。双方并立，一方无需为另一方负责。亲吻与拥抱通过思想达成。此处等待的是理智的柏拉图主义：而我相信，只有当各地的爱情统统重拾这种理想的特质之时——甚至40年前尚有这种理想的状态——本世纪的青年男子才能更加幸福。

夏洛特自杀之前读了拉荷(注)的信。拉荷绝不可能做出令她的丈夫如此伤心的事，因为她不愿落得和夏洛特一样的下场；她仅是投身于辩证法的领域，那种不从与生俱来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享乐：拉荷同莱辛一样，更喜欢真理对真理本身的追求。夏洛特不喜这种思想的隐忍：她并非拉荷那种轻浮之辈，普鲁士国家的米哈博家族（Mirabeaus）及卡提丽娜家族（Catilina）曾拜服在其脚下，1806年期间也为这种轻浮之风所左右。拉荷是否定，是明亮的火焰，是怀疑主义，全然是思想。她并不考虑这思想是如何产生的，而是投身其中，将其打碎成许多思想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往往富于独创性，并且具有三分之一真实的面貌。拉荷在思想之间周旋：她并非具有行动力

的女人，怎可能教说自己自杀！夏洛特是立场，充满诗意，具有信念，全然是灵魂。她在时间与事实的巨大思想之前躬身，她的精神仅仅开于这些思想可被排序的时候。夏洛特是体系：因为她不能将时间所带来的一切事物组合起来（我们能如此吗？），便仅有她宏伟的、强大的、天神般的意志留存下来。即使没有拉荷，夏洛特也会死。然而这一切是如何、为何达到这种高度的，只有通过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才能理解，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此事除去爱情别无其它。

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人们看到他身穿棕色长袍，头戴黑色礼帽，以盘算好的骄傲姿势大步流星地走出，集柏林人十年以前便乐于自居的特征为一身。他喜爱黑格尔、歌德、希腊、语文学、普鲁士历史以及德意志的自由、俄罗斯的自然生活、波兰的活力，一切相互混杂的同时他还要在柏林的国家图书书馆同仆人与女佣打交道，他们要为这位先生拿来借阅的书籍，他将其写在登记簿上。天空、大地与地狱在此十分相近。哪里是统一？哪里是目的与终点？施蒂格里茨作诗；人们不愿承认他的创意。德国的一切都如此枯燥、如此忧郁：一切都变成了审美问题，在重建的过程中，精神由于人生或个人倾向的原因也仅仅成为了一种混乱、一种声响，施蒂格里茨认为这是决然矛盾的。他便是这样迷失的，这位同回教徒来往，高踞亚洲山脊，与蓝眼睛为敌的人！他的理想被玷污了，门采尔[注]让他吃了闭门羹，因为他没有原创性。七月革命爆发，将他的缪斯和他的思想一同逮捕。于是他写出了被第二帝国（Tiers parti）奉为神作的《一个德国人的歌谣》（Lieder eines Deutschen），然而第二帝国的代表以及门采尔又都不认可这首诗。出路何在？施蒂格里茨喜爱歌德的诗，喜爱自由，却找不到桥梁。他感到与自己供职其中的联邦体系格格不入；因为世界的问题进入了他敏感的心灵。然而即使在这一问题上，一切也都应当仅仅是党派的意见、事实和文章。自由是缺乏美的吗？人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作为诗人、作为国家的骄傲，像过去一样被榴弹兵所传唱了吗？哎，这位不幸的诗人在他的绝望中渐行渐远。他坐在夜晚的灯光下，街巷的静谧中，他面前白色的纸张如同不朽的尸衣，渴望

着不朽的词句。夏洛特在隔壁不时弹起钢琴。诗人在哭泣。除了这颤抖的乐音所构建起的天梯以外，他还能见到另一条通往天堂的阶梯吗？真理何在？光明、生命、自由何在？成为一位伟大诗人所需要的一切何在？但丁那种正直的、深切的、吉伯林式注的恨意何在？并不是我们用我们与自然疏远了的心灵的奇怪冰壳影响我们这一时代不幸的孩子们的那种恨意。米尔顿的盲瞍何在？荷马的乞杖何在？拜伦那种由自身的轻浮和对天堂的打水漂一样的复仇所造就的境况？真理与伟大的、尖锐的、不幸的人生何在？啊，一切都只不过是谎言，耀眼的日光，丰盈的收获和熟人令人生厌的拜访。可怜的海因里希因麻风病而倒下，那位为他自我牺牲的梅耶尔（Meyer）家族的女儿何在？我的这些字句是诚恳的，我感受到了他内心的悲惨现实。他表达了我们诗性的青年时代的痛苦，依照早熟的民众思想，集结起来排成队列，歌颂世界历史谱写的诗篇。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也许施蒂格里茨有其他的想法。他想的也许是他的诗歌，并从现实之中抽离出来；他想的也许是文学史之中的地位，并且惊讶于荷马、维吉尔、阿里奥斯托、彼得拉克在他们的时代如何能有这诸多建树；他想的也许只是在各个时代诗意地表达自己而又不受时代所限的那种人格：他认为一个人若想作出原创的诗歌、写出宏伟的戏剧、吸引步卒的兴趣，能为士兵所津津乐道，就必须拥有命运一般的大型人物设定；渴望一场可以让他的内心发生变革的事件。

若是指责施蒂格里茨将他的夫人卷入了这场漩涡，那便是愚蠢的。她一定知道是什么事他眉头紧皱，并一定也分享了那侵蚀着他生命的东西。她站在高处领会他的苦难。她大概感到她的丈夫缺乏激发灵感的人物设定。姨母们平日里说些闲言碎语，禁止她们的侄女接近所谓的美学家、文学鬼才、政治领袖、更大更爱国的城市的市侩，让她们的女儿忙于正式与青年恋爱，建议每一位做学问的男人不要娶妻，为了亲爱的孩子、面包甚至诗歌本身，她们若没有小市民的谨慎和寡妇的恤金似乎会过得更好；夏洛特的内心并没有如此贫瘠。亲爱的爱唠叨的牌友们谦虚的夫人们，你们是完全错误的，施蒂格里茨博

士夫人——那位值得哀叹的人儿——做出自我了解并不是为了让她的丈夫获得安宁，不再费心四周一次的洗衣，不再操心：我们吃什么？我们喝什么？那骄傲的灵魂想的不是这些。她给予丈夫的并非安宁，而是绝望。她将自己作为祭品，并不是为了治愈他，而是为了将他投入真正的深沉的病痛。她想要给他的忧郁一个明晃晃的、血淋淋的、令人惊叫的原因。她想将他从谎言面前解救出来，把年轻的、充满魅力的自己在冬日之中献祭给死亡，于春日的希望无动于衷，虽知命运女神的引线还长，却将其抛弃，准备好命定之日以前很久很久便去试探死亡的可怕秘密，抛弃未来可能摆在她面前的各种欢乐和美丽。

行为完成。坟墓静谧，覆满白雪。好奇者得到了满足。人们的结论呢？你们没有：我们全都没有。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呢？可怜的幸存者！你是不幸的未亡人。然而你的不幸超越了你！你同它并不在同一高度！你要怎么做呢？歌颂这伟大的壮举？要知道，你面前的是死亡的祭礼，但丁也许并不需要这种刺激；歌德则完全不需要。你若想战胜事实，将它融入你的血液并纳入你的思想之中，就必须像但丁和歌德一样伟大。你要公然从爱情给你秘密带来的祭品身上汲取力量吗？我恳求你，不要把你诗句的危险带给你感受到的强大的痛苦！整件事情中有太多的耻辱，无法以喜剧收场。真的，此处不再存在诗歌；主题动机与人物设定比其上可能建立的事物更加伟大。此时上演不寻常之事的不再是世界，而是四面墙的狭窄空间，三面墙的舞台；因为这是一出悲剧。然而悲剧尚未落幕。诗歌不能使其圆满。

---

1. 夏洛特·施蒂格里茨（Charlotte Stieglitz），十九世纪德国作家，诗人海因里希·施蒂格里茨（Heinrich Stieglitz）的妻子。海因里希因怀才不遇而郁郁寡欢，夏洛特希望以自己的死亡换来海因里希灵魂的重生，因此自杀。
2. 1819年3月23日，德国学生卡尔·路德维希·桑德（Karl Ludwig Sand）行刺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科策布（August von Kotzebue），后者被视作“叛国者”和“人民的欺骗者“。桑德因此被判死刑，亦因此被日耳曼国家主义者视为烈士。
3. 拉荷·冯·恩梓（Rahel von Ense）：十九世纪德国作家，同夏洛特交好。

4. 门采尔：（1815年12月8日－1905年2月9日）是德国油画家和版画家）

5. 吉伯林派（Ghibellinen）皇帝派，与归尔甫派（教皇派）同指位于中世纪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分别支持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派别。12和13世纪双方的分裂在意大利城邦历史上对其邦内政策起到重要影响。

3. 贝蒂娜的评论[注](1843)

Nil divini a me alienum puto（神性之物于我皆非陌生）

正如同人们午饭过后因为吃了腌制的菜肴而感到口干舌燥，生出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干渴，便把一口最纯粹的、最解渴的泉水灌进干得冒烟的喉咙，满怀渴望地舒展湿润的肺叶来呼吸一样，贝蒂娜的新书也是如此解渴，如此令人耳目一新。她文风优美，她惯用的表达方式生出奇妙绝伦、精雕细琢的花朵，这位优雅的女魔术师此次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令人着迷的五光十色的刺激，向我们展示幻想中的玫瑰之光里的世界；并不是南方的葡萄汁液，其中洋溢着东方花朵的香气或者以童话世界中碾碎的珍珠作为佐料；这次是从健康理性的水塔中流出的纯净的、清冽的泉水，纯净水晶般明亮的自然山泉的滋润。这伟大庄严、思路清晰、思想鲜活的书，是多么可口的点心！当今的哲学为我们呈上这么多洒满千般佐料的菜肴之后，我们的现代文学为我们奉上每日盐渍的鲱鱼之后，我们市侩般的思维方式、写作方式、阅读方式和生活方式献上的陈腐酸菜之后，端上来了一本这样的书！这样一杯来自山间的清泉，满满一杯，千万滴岩石的清冽叩击着内心！所有你们这些现代的莱茵红酒诗人，嗓音洪亮的香槟歌者，你们作不出贝蒂娜呈献的点心和冷饮，活力和强盛，祝酒昔日，鼓舞未来！

这位神奇的女士新近写就的国王之书并不是那种如同秋叶般舞动一时，便在积雪下被人遗忘的书，这本书作为一项事件，一桩作为，远远超越了一本书的概念。《国王的书》属于世界。它是历史的一部分，就像但丁的《神曲》、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就像康德的

《纯粹理性批判》。它说出的事情未曾有人说出口过，可是由于千百万人都感受到了这些事情，便不得不说出来。人们会争论这些事情，会取笑这将其说出的女人之口，人们在我们时代的日常事务以及通俗报刊中已然津津有味地在争论、在取笑了。然而此类事件还会带来强烈的后果。勇敢的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正是如此。在向被阐明的真理低头之前，人们会首先为之震惊。

谁若还没读过这两卷小书，谁若还犹豫，这样一本不能像小说那样一口闷，而是像学生们所说“众所周知七口干”[注]，必须慢慢吸收的书是否会有趣，那么下面的解释会有用的：这本奇书的确完全对得起它的波斯书名。这书名并不装模作样。这本书的确属于国王，并且必须叫这个名字，不能另取它名。它是一封信，一封公开信，写给国王并且是直接写给腓特烈·威廉四世[注]。它是一份时代的演说，出自女人的之口，由一位无畏的女预言家撰写，因此上面覆盖着上千个男人的签名，因为贝蒂娜在此仅是集体意见的喉舌，这位勇敢的带头发言者是一位圣女贞德，并非用双臂而是用热情，用信念想要拯救祖国。不论哪个男人说出这些话，都会被投入铁窗囚牢，只能由一位女人说出，真是令人悲伤。在这天时地利人和之处，在这场巧合中，人们因为她“古怪的”天才和社会地位而侧目，她站出来发表一份对于我们当今政体的批判，对于宗教和社会的批判，此前上千人亦有此意，却从未有人如此坚决、如此英勇、怀抱如此改革之心地说出来，这其中自有天意。一位天使以火焰之剑化解了这场恼人的时代之争。你们退缩着，垒起一摞摞的书籍，说着一串串的诅咒，而一个女人身上显现出了灵感的力量，天启的力量，她并不想跻身教授之列，获得荣耀和凡俗的称赞；这信念的热度，如同火焰风暴席卷大地，既不能被削弱也不能被熄灭。诗歌用自由的手帕向这里招呼；诗歌向来是一位骑士，一切闹剧在它面前都会烟消云散。

贝蒂娜属于那种既像鸽子般纯洁，又像蛇一样聪敏的人。她首先并没有向普鲁士的国王发话，她反而描述了他的政治、他参谋们的政

治，她如实描绘了一位大臣，却以与她的诗歌和“礼仪”相称的方式，将论战藏在预言的外衣之下。她说的看上去是公元7年看上去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看上去是拿破仑，并让歌德的母亲顾问夫人[注]代替她讲述。那些感情脆弱的人和伪善的人总想将事件和个人区分开来，并总是抱怨“不够谨慎”，当他们看到，如此惊天动地的思想可以被加在安眠于这神圣的基督土地上的法兰克福公墓中的顾问夫人身上的时候，便会感到十分可怕。这思想是贝蒂娜借她之口说出的。谁若曾做过施莱尔马赫的门徒，谁就会知道苏格拉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充当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同样写过苏格拉底的色诺芬，喜欢仅仅让这位引人入胜的讲师仅仅说些他实际说过的内容，柏拉图却让苏格拉底成为了一种概念，一种诗性的人格，正如戏剧家笔下的人物。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依照柏拉图的意愿讲话。而苏格拉底无须为此在阴间迁怒于柏拉图。父亲要对儿子负责，国家要对国民负责（贝蒂娜尤其乐于行使这一义务），教师要对学生负责。伟大人物的天才影响深远，并且以他们精神产物的形式继续存在着。同苏格拉底一样，顾问夫人内在的精灵，那崇高的神圣性和突然的神启，也正是如此，并未随她消散遗失，而是凭借灵性的翅膀环绕她的儿子沃尔夫冈，现在又环绕着贝蒂娜，贝蒂娜可以斗胆在当今之妄念的鬼魂当中召唤这位夫人勇敢的英灵，让她像讨论神父施坦恩（Pfarrer Stein）和市长冯·荷茨豪森（von Holzhaussen）那样，讨论格林兄弟、讨论兰克[注]、讨论洪堡。

这本国王之书的第一卷致力于宗教，第二卷致力于国家，两卷中的论证方式都属于原始的激进主义。一个千年以来被偏见、谎言和幻梦所束缚的灵魂，被千般自欺和思想无能的忧虑所压制的精神，仿佛从此站了起来，如同天马珀伽索斯一般挣脱羁绊，用带有翅膀的四蹄飞向太阳之马的轨道。贝蒂娜如同粉红色手指的伊奥斯[注]播撒着晨曦。她勇敢的手中拿着新律法的石板，这些石板尚且是空的，然而上面所写的不会有一字谎言，她以口中呼吸所吹散的字迹也不可能再次

被写上。她给出的是负面否定，但是负面否定之中有自由的人类精神之最圆满的积极意义。这种自由并非是现世的。她本身并没有痴心妄想的欲求，却并不满足，她是斗争的、作战的自由精神，希腊式的自由，在角力学校中，在学术界中，在奥林匹克竞技中证明自己。这自由也有所建树，却并非黑暗森林中无光的祈祷室，而是自由翱翔的瞭望塔，是清风吹拂的山巅的神殿。这耀眼的艺术穿过山谷和密林，并非走向无目的、荒凉的平庸，而是走向一处升华的、崇高的平原，走向一种无所不包的蓝图，囊括神的庄严与人的福祉。这篇以至高的、大师般的风格写就的论战是保护性的；因为还有什么比自然、理智与自由的精神更加值得保留呢！

我们时代那种典型的、领薪俸的、末世的、述说祝福的神学会因为第一卷书而撕扯下她的黑色长袍，痛呼三声。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这第一卷书基于一种绝对的信仰无能。贝蒂娜在此处不允许理智和教义有任何交集。再也没有任何谜样的眨眼，带着生活阴暗面那种神秘的可能性，再没有阐释，没有寓言，仅有一个简单的问题：酒能否变成水，水能否变成酒？人们不会说贝蒂娜通过这种对基督教的彻底否认，将现代世界的前提完全消除了。对我们时代及其科学斗争投上一瞥，便可发现若是自由已经获得了无数的胜利，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贝蒂娜已经铺就的道路的中途搭起茅屋和帐篷，更不要说凭借这一半路来建起教堂了。这本书的成就对于我们时代思想开放的神学能起到多少帮助，尚且不可估量。首先得来一场对敌人的野猎，让我们等待恶狼之谷的幽灵到来吧！

更加令人不安、起到更直接作用的是第二卷。人们将本书的这一部分称作是共产主义的。人们听说其中的内容，便为这奇怪的新词感到目瞪口呆：共产主义。倘若共产主义是最热忱的、燃烧的对人类的爱，那就可以期待共产主义会有许多的追随者了。

这第二卷书献给犯罪和武力。人们已经相信，贝蒂娜想将罪犯树立为烈士，并认为盗贼优于诚实的百姓。后者是幼稚的，前者是真实的。人们写了诸多关于监禁、罪犯和惩罚理论的书，人们也出资赞助行为矫正机构，可是在真正应有的政体——以我们时代的角度看来——之下仍然应当预期会有犯罪发生。现在我们若是相信人类天性的原善或者原罪，那么由于我们的教养和教育给了我们这样崇高的概念，而这个词被用于形容人类天性，我们便因此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我们为何极少实现这一奇迹？它们为何失败得如此频繁？我们平日里的胡来绝不够治愈愈发恶化的社会弊病。学校等等的古老竖琴十分不快，它不再能够引来炉边的狗，更别说能够令人着迷并将人类变成人类了。霍乱面前任何药物都束手无策。当时人们建立新的传染病院，新的隔离区，新的康复区域，不再保留旧物，平日里最瞧不起的家庭补救措施也被高看了。现在有一场道德上的霍乱：比如柏林每个冬天都有许多人死于道德霍乱，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十分普遍，以至于监狱都满员了。天啊，人们增加守夜人和宪兵的数量，市民聚集在一起构建防御工事。每个人都把自己和别人隔离开来，这个由孤立个体所构成的国家里的惹事人就变得于人无害了。为了不远未来的困境而设立这种政体的时候，人们就也得任其成立；然而若是将其实用价值提升到一种理论上的、持久的意义上，人们便会直接问，基督教的世界就是这样延续了一千八百多年的吗？没有当犯罪尚在襁褓中时就将其扼杀的办法吗？国家是否一直并且永远只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聚合物，在其中仅有那些在摇篮中就已受到亲爱的命运之神微笑眷顾的诚实者、纯洁者和幸福者能够维系自身吗？

最近有一位牧师发表了一番关于一处受到众议纷纷的坟墓的神圣言谈。一位死于决斗的来自卡尔斯鲁厄的冯·格勒先生的尸体下葬了，这位牧师并没有责任像各路报刊那样奉承这具尸体，他却在谈论决斗的时候，说出了一番值得尊敬的话：若是想想，基督教义的温和精神对人性起到的作用尚如此之小，以至于无法避免任何事故或争吵的发生，他就得为基督教而感到脸红。他说：脸红！这位牧师，圣言

的虔诚仆从，为其学说的作用之微小而脸红。公职人员大概也会为他所供职的国家而脸红，大臣大概会为他放在公文包中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脸红，我们的法官大概也会为罪犯而脸红吧？不。顶多只有那位得处决违法者的可怜仆人会发抖。那么十九世纪被称作政治的还算什么呢？我们伟大的国家领导者们除了自己之外还维护何人呢？那种真正具有保护力量的、在一切事物面前为了人类而保卫人类的政体之光芒，怎能透过这种以官僚主义、敕令、禁令、同盟、队列、利益平衡所构成的政体而照射出来？当贝蒂娜涉足这一领域，她便挺身而出，成为了女先知，成为了预言家。她将这本书题献国王，直指国王，文中句读如此令人着迷，如此热烈而感人至深，以至于我们必须要说这封信是不朽的，却无法在现世中实现其意义。

谁要是想按照字面意思理解顾问夫人在第二卷书中的主张，那他就只能证明自己是个无聊的人。无聊的人都不理解幽默。然而这位勇敢的敌对者所提出的为反对犯罪而建立的道德改革的很大一部分都应当被理解为幽默。她并不真想让强盗头子当将军，让屠夫汉斯[注]作战斗领袖，而是以她扎眼的、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悲叹，悲叹那被犯罪行为所消耗的勇气、智慧和坚固的中心并未被用于崇高的、于民众福利有益的目的。这番证词的辩证半是规劝，半是嘲讽。它彻头彻尾是一种柏拉图-苏格拉底式的精神，为富于艺术性的对话赋予了生机，同时融合了远见与高翔的预言，那种苏格拉底式的讽刺，讥诮着将对手已被囚禁的鸟儿再次放飞，好让它在获得短暂的自由后再次将其捕获。《同法国喜鹊的对话》（Gespräche mit einer französischen Atzel）是以几乎泛着泡沫的过分讽刺写成的。这里的顾问夫人正是那飞走了的鸟儿。壁炉上黑色的鸟儿有聪明的眼睛，头上有活泼的皮冠，看起来仿佛是一位被施了法术的地狱使者。这个小贼像个卡布新(Capuchin)修士一样怒喝咒骂，它服侍的不是天堂，而是魔鬼。它希望整个世界都是魔鬼的，并且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地抹黑上界的事物。有不少人会把这喜鹊的话当真，谴责它放肆的闲谈，说它亵渎了精神上及现世中的同胞之情。有人认为贝蒂娜灵魂异想天开的抒情诗十分

幽默，为了喜鹊而作，并为之辩护，就仿佛在某一场会议上即使是蚱蜢也能找到代言人。倘若一只老鼠吞下了圣餐并上演了奇迹，那么魔鬼为什么就不能附在一只喜鹊身上？福音主义教会报刊针对这喜鹊发表的下一篇论战将会十分滑稽。

然而这部杰出的作品针对的是十分严肃的问题，不容以滑稽收场。它以最深的痛苦的七和弦作为结尾，它的结尾动人心魄，撕心裂肺，是悲剧性的。若是有人能够目注这柏林的福格特兰地区[注]贫穷的叙事，而不泪流成河，那他一定是铁石心肠。贝蒂娜展现了一位慈悲之人列出的清单，此人在受苦受难的柏林福格特兰地区走门串户，叩击门扉，进入屋中彻底去了解此处集中展现的那些苦涩的生活境况。说出了名姓，指出了门路，此处所有虚构都停止了。这里有上千人住在饥馑和苦难之中，睡在稻草上，随时准备着被驱逐、被赶到大街上，同白发垂髫一起，处于永恒的战斗中，要么就挨饿，要么就乞讨，或者出于绝望而偷盗，被警察捕猎，市里的贫困救济站本应是他们最亲近的官方保护伞，却抛弃了他们。每个感情丰富的心灵都要感谢贝蒂娜分享这幅图景。这幅画卷的每滴眼泪都会抵消那些尊贵的大人物的文学幻想；这些真实的，活生生的牟利罗[注]作品比任何理想中的变形都更加崇高。这些色彩中爬满了毒虫，然而这些色彩是真实的，而她将这本书题赠的那位君主，在阅读这段叙事的时候一定取消了一场宫廷舞会，一定将一场军事演习的闪闪发亮的、仅仅搅起尘埃的铠甲已经确定的预算削减了一半。因为此时刺入我们心灵的并不仅仅是贫穷，不，还有关于即使在这些人的绝望中也未曾消亡的美德的叙述，关于即使衣衫褴褛也秉持的对祖国和君主的宽容与忠诚的叙述。一位可怜的乞妇交出了她去世的丈夫在自由战争中获得的荣誉勋章（五个勋章）。这荣誉勋章一共给她换来了五个塔勒[注]（几乎还不足这勋章的表面价值），现在她在忍饥挨饿。当即使是这位勇敢的女人在这部作品中描写的崇高的胸怀博大的人物的戏剧人格——以牧师和市长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塑造出来——也会堕落的时候，人们不能相

信这附加情节会了无痕迹地溜走。需要彻底重建的不仅只有柏林的穷人救济中心——这最不受人欢迎的居住机构之一——，还有更高层次的、囊括整个国家的体制，是的，我将其称作共产主义的问题：若要将人类从人类手中拯救出来，重新构建兄弟情谊的纽带，避免这孕育着不祥的、带有可怕威胁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急需答复，并且这答案不论用语言、用救济都无法表达，必须只能在大刀阔斧的创新中实现。这位高尚的女人，她将这问题扔上了王座前的阶梯，扔上了免罪的群体的镶木地板，这群体由奢侈、耽于逸乐的懒惰和卓绝的无用的鼻子和僧侣的智慧组成，标榜辉煌贡献的野花花环戴谦逊地戴在她的头上，如同她曾经从浪漫的自然自然秘仪期间编织的最美丽花冠。

现在，所有感到被这本书攻击的人带着不安的期待注视着本书题赠的那人。努马·庞皮里乌斯[注]有他的厄革里亚，一位充满神秘感的女占卜师，她传授他智慧，他用这智慧将罗马从强盗国家提升为了井然有序的共和国。普鲁士的国王虽然不会让贝蒂娜做他的首席顾问，但是他通读了她的书稿，默许了本书的题赠，并且以千般避免监察的自由保护此书免受警察的迫害。因此德国和普鲁士可以特别怀有期待，此时一位热烈灵魂的强大口才，如同一位先知，以时代的名义在路上说出的话，即使不能点燃实干之火的鼓舞人心的火花，却也还是会在其中留下一阵温暖的躁动，施人以体贴和宽容。

---

1. 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年），德国著名女作家，德国第二次浪漫主义的关键人物。其作品极具吸引力，充满独立和世俗精神，本文是对贝蒂娜《国王的书》（Dies Buch gehört dem König）的评论。

2. 有一篇关于喝啤酒的德国歌谣，其中有“‘那么亲爱的同志，请您决定几口喝完。’‘众所周知七口干。’”的桥段。

3. 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 von Preußen，1795年10月15日－1861年1月2日），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国王，1840年至1861年在位。

4. 卡特琳娜·伊丽莎白·歌德（Catharina Elisabeth Goethe），歌德的母亲，于1743被任命为国王顾问，因此有“顾问夫人（Frau Rat）”之称。

5. 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年12月21日－1886年5月23日），十九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也是西方近代史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
6. 伊奥斯（Eos）：希腊神话中的黎明女神。
7. 屠夫汉斯，德国强盗约翰-毕克列尔的绰号，在莱茵河两岸组织了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盗窃活动之一。
8. 柏林福格特兰地区，即Ackerstraße，十九世纪被称为贫穷和利己主义的代名词，这一地区当时也叫做“柏林的撒哈拉沙漠”。
9. 巴托洛梅·埃斯特万·牟利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年1月1日－1682年4月3日[2] ），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以街头顽童、卖花女孩和乞丐的肖像等等描绘当时日常生活景象的作品而闻名。
10. 当时欧洲通行的一种银币。
11. 努马·庞皮里乌斯（Numa Pompilius，前753年4月21日－前673年），罗马王政时期第二任国王。厄革里亚（Egeria），一位罗马早期历史中的传奇角色，努马·庞皮里乌斯的神圣配偶和指导者，她帮助建立和制定了古罗马的宗教机构及法律法规和礼仪。

4. 一部普鲁士小说（1849）

头脑聪慧并且为人所知拥戴民主的范妮·兰瓦尔德(注)写了一部小说（《路易·斐迪南亲王》(注)（Prinz Louis Ferdinand）），这篇小说将带给她成为忠君联盟一员的荣耀。我看到她燃着自由之火的胸前早已挂上了荣誉勋章，施利彭巴赫伯爵将会在全部柏林官员妇人和公职人员夫人的庆祝聚会上为她佩戴上这勋章。因为不论从官员夫人的角度看来这本传记小说多么有违礼节，有违对大人物或顶尖人物的忠实虔诚而应受谴责，那位谨慎的普鲁士联邦成员清楚地知道，老式的忠君主义礼仪已经不再值得推崇了。普鲁士之心的这种高贵的核心基础价值已经不能再像昔日那样是本能的直接流露了，当时腓特烈·威廉的政权还在宗族的束缚中沉睡，这种价值观如今必须被“传播”，混在新时代的语言中说出，并用时兴的德国银器紧紧焊住。范妮·兰瓦尔德实实在在地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人们倒是又能仰望那被称作亲王的光芒万丈的陨石了。人们倒是能证明，即使在那些领域也可以充满人性，值得爱戴，并被视为高贵。人们倒是最终为在手工匠人和农民中寻找诗歌的那种误入歧途的文学提供了彻底的反例。女伯爵哈恩(注)为诗歌拯救了贵族，第欧根尼质朴的女诗人范妮·兰瓦尔德则为诗歌又拯救了国王和君主。

我们在这三卷以熟练笔法写就的书中看到，它讲述了一位世纪之交的普鲁士的亲王，这位亲王受他时代的天才热情荼毒太深，想要将自己从腓特烈大帝陈旧的制度和观点以及将这些看作是普鲁士诸邦的智慧女神象征的人的手中解放出来，搞搞音乐，犯下不少罪过，过度纵情征杀，憎恨法兰西人及其共和国，不惜一切代价让“科西嘉人”感到普鲁士武器的寒光。当1806年的外交策略践行了他的意愿并且宣

战时，他便在对他所热爱、却痛恨其自由主义的根本律法的国家（因为他周围都是法国人）打响的第一场战役中阵亡了。正是这位路易·斐迪南亲王，时常被作为一位英雄角色、一位急于建功立业的年轻的亚历山大[注]而称颂，人们大概可能认为他的一生值得瞩目，他的死亡感人至深。然而这盛名在仔细的审视下看起来如何呢？这位传记作者、这位诗人要怎样才能更加贴近这特别耀眼的事件真实的核心和本质呢？

我们承认，范妮·兰瓦尔德从妇人的角度十分真实地描绘了她的英雄主角。尽管他颇受非议，她却直接爱上了他。我认为她书中的这种倾向是最美好的。没有冷静的理性，没有任何推敲，没有任何或多或少的考量，她爱着这位亲王，就像拉荷·列文[注]爱着他一样。而正是这一点必然会让忠君联盟感到高兴，正是因此，施利彭巴赫伯爵才可以说：看看那里有一位民主人士，一位犹太女子，一位她的朋友西蒙和雅各比的原则的聪敏的拥护者，看那里一位三月的女英雄，在防御工事的时代中为普鲁士亲王建立起通向胜利的门户！这本书中的男女欢庆一位本来对人性并无贡献，却自视为霍亨索伦家族[注]的人的亲王的到来，就好像当我们的防御军团带着民主的鲜血染红的刺刀回到营房的时候，我们带着花环蜂拥上前，并且用忠君联盟的指控在火车站迎接他们一样！而此时一位民主人士在我们前头举着黑白的旗帜！一位贵族文学的敌人！这位我们不可战胜的艾达的对手！

范妮·兰瓦尔德会对施利彭巴赫伯爵——或者更会对让他说出这番话的我——大动肝火。我看到，她会驳斥她对一位普鲁士亲王的爱情和热忱的全部后果，我听到她会这样喊叫：你们这些小人物，难道就不让人追随内心的情感了吗？难道所有一切都该分成党派吗？难道就再也不能心怀兴趣，心怀爱戴去拥抱人类世界每个有意义的事件——它们现在发生在奥雅巴哈式的黑森林村庄或者乔治·桑式的《魔沼》中或者大臣宅邸和君主宫廷的镶木地板上——并且认可社会阶梯各级的美丽、真实和勤恳的事物了吗？范妮·兰瓦尔德这样想过。她

想要描述这样一副岌岌可危的国家的图景，她相信，一个现在自以为不可战胜的现在可以斥责历史的明镜，她就在这现在中，在国家、社会、军队和城市中写就了石破天惊的文章，哪个时代倘若不知道这篇文章，就会因此折损它的骄傲和荣誉。她的作品在一些显著的方面具有论战倾向，鼓励她将一位君主的形象牢牢作为她文学创作的中心点，并因此回击那些指责，在这些指责面前她必须作为一位敏感的朴素民主人物。

不论如何，她被她的妇人之心给连累了。她受到瓦尔哈根·冯·恩梓(注)的影响，想要描绘那重要的时代，实际上，虽然迎着歌德《马克上的缪斯和优雅女神》的嘲笑，却还是将施莱格尔、根茨、费希特和拉荷和她的“圈子”同一位值得爱戴的、友好温和的王室亲王扯上了关系。特别是因为拉荷的缘故，她有兴趣在小说中将自己和她明显地混而为一。然而这种努力在她作品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实现。相反，仿佛是一种艺术家的天性对她说，让她片段性地描绘那位亲王，将他置于前景之中。比如说她并没有通过一位卡尔·魏格曼式的人物来提升并支撑她的小说，而且并没有在她作品中间歇性地着重描写那些重要人物，而是把这些人本身作为情节的主角，并且写出了一部富于浪漫幻想的传记，而非小说。路易亲王总是位于中心。她捏造出一些情感让他表露出来，她让人物聚集在他周围，她让这些人表现得高贵、或者至少是充满意义的，然而他们倒大多只是些毫无教养的轻浮之辈。这位保兰·维瑟尔，一位优雅的柏林朝臣，给人的印象臭名昭著，在我们的编纂者笔下却显得如此相对有趣而充满价值，身披现代思想和成果丰富的情感的巨大而斑斓的遮羞布，以至于人们想想就会震惊：第欧根娜(注)会对这本书说什么？当贵族社会在这位夫人面前层层剥落的时候，当她自己片片撕碎装潢华丽的沙龙和闺房——五彩斑斓的爱情和丑闻在其中交织，洒满香水的便条在身穿条纹服的骑手手中银质的托盘上呈递，所有“不被理解的”灵魂发出痛苦的叹息——之中的浪漫时，这里的人都千篇一律，而我们倒是对范妮·兰瓦尔德

的强行扯淡有所保留，不会认为那位柏林官员的女儿十分有趣，警戒号角响起的时候她跑到窗边，爱上头盔和肩章，把亲王只能从平民女儿那里要求来的东西全然给予他。亨利叶·弗洛姆，保兰·维瑟尔成为了这位柏林大人物的“女人们”，并且不值得像在这本纪念书籍中那样为诗歌所如此矫饰。多少恢弘之言浪费在了鼠辈身上呵！多少平庸的思想被粉饰得光鲜亮丽！只要是观察过柏林的人，有谁看不出妇人和少女为了获得亲王眷顾而献的谄媚，就像当年利希特瑙时兴的那样？这种境况的受害者后来希望比里茨妇人所知的那样更加博学，他们想要用法语聊天，遍阅歌德和席勒，同根茨和施莱格尔接触；然而尽管瓦尔哈根·冯·恩梓向他们身上倾注了微光，他们却也还是和现实中别无二致。可怜的兰瓦尔德，在想要抬高犹太人身价的冲动中，描绘了一位犹太的拉荷·列文同一位普鲁士的亲王之间的关联，在这里被她心灵及其勇敢的翅膀闪得眩晕，在一个本不容掺杂文学想象的领域掺入了文学想象。柏林枢密大臣的女儿凯撒小姐，同亨利叶·弗洛姆一样不值得过多的人格塑造，她在同一位经济学家订婚的第二天同一位亲王私奔了。然而亲王的爱情主要只能是居高临下的，居高临下地对市民之流轻蔑地微笑，仅仅简短地发号施令：做我的人！一部情感充沛、富有情节、展现人类最崇高本性的小说最多也只能说是罕见的，我们目前所探讨的显然并非其中一例。除了对逸闻趣事怀有兴趣的读者以外，谁还能读得下去范妮·兰瓦尔德这篇混乱的作品？没有任何值得推荐、值得注意、或者值得赞叹的地方。人们心怀好奇、心怀兴奋地阅读这本书，却只能震惊于编纂者在写下这本书的时候也隐隐约约有这种想法：（删点东西吧！）

编者倒是有几段叙述值得赞扬；毫无疑问的是，她可以胜任描写社会中一些令人深刻的、充满苦难的境况。她感受到了贫困、变得卑微的骄傲、被践踏的人性。凭借对于犹太社会的纯粹的、诚恳的表白，她开创了对于社会的阴暗面的观察和同情的先河。对于1806年普鲁士的军事状况、军旅生活、贫民窟、官员的腐败、官僚的无能和黑暗，她为何要调查这些？不是要呈现她出身贵族的的事实吗？不更是

为了在这部画卷中出现的妇人的傲慢的旁观者之心吗？这人为何如此浮夸，为何要把1840年代无聊的少女小说的破旧的情感废物拿出来兜售？这难道不是虚荣的花哨吗？拉荷本身的爱情苦恼和对国王陛下的放弃的伟大情感难道不是装模作样的垃圾吗？这团混乱的东西会为我们展现任何对于人类心胸深处的伟大视角吗（而它本该如此，毕竟本书题赠说明瓦尔哈根·冯·恩梓是其教父）？当编者务实并且合理的时候，我基本可以读得下去。然而当她要抒发情感——她认为这是理想性——的时候，却将我们投入了她本来想反对的女伯爵哈恩那种领域：对于惯常之物的厌恶、对于千百年来人类心中甜美单调的习常的爱情道路的反感。你们难道觉得人母和已婚的妇女都是肤浅的，而只有这些拉荷、亨利叶、保兰之流值得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吗？在这本书中，我们若是除了诸多意志坚强的妇女们以外还能读到一位年轻貌美、并且具有意义的能让人产生好感的角色，那才是真正的鼓舞人心啊。

本书的结尾就像一部交响乐以杂乱无章的噪音结尾一样！主角死了，然后——一切都结束了。编者为了取悦我们而布下的所有线索都被扯断了。刚才还是白天，突然就天黑了。这个结局本身就是对作品的批判。它说，随着英雄的死亡，整部小说的结构都坠入了虚无，而围绕他的本质上也只是一种幻想，没有任何真实的、可能切实存在的生活。范妮·兰瓦尔德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她眼中毫无疑问的时而可怕的忠实信念的美丽激情，是这样描述的：我在书中同亲王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在他死后就没有用了，不用再赋予他们灵魂。一部严肃戏剧的结局应当如同一座坟墓，一部严肃小说的结尾却应当如同一片墓地。沉痛的目光所及之处，周围应当全是坟墓，并且不知道其中哪些当得起不朽的桂冠。

---

1. 范妮·兰瓦尔德（1811-1889），德国作家，犹太人，十七岁时改信基督教。

2. 路易·斐迪南（1772-1806），普鲁士亲王，曾参与拿破仑战争。1806年挑起第四次反法同盟战争，在第一场战役中挑战法国人并阵亡。

3. 即下文提到的艾达，是范妮·兰瓦尔德的文学对手。

4. 指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三世（前356年－前323年），世称亚历山大大帝，古希腊北部马其顿国王，30岁时已经创立历史上最大的帝国之一。

5. 即《以松柏祭夏洛特·施蒂格里茨》中提到的拉荷，列文（Levin）是她婚前的姓氏。

6. 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s），是欧洲的三大王朝之一，为勃兰登堡-普鲁士（1415年-1918年）及德意志帝国（1871年-1918年）的主要统治家族。族徽主要为黑白两色。

7. 瓦尔哈根·冯·恩梓（1785－1858），全名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德国传记作家、外交家和军人，是上文提到的拉荷·冯·恩梓的丈夫。

8. 第欧根娜（Diogena），范妮·兰瓦尔德同名作品的主角。这部小说是对哈恩女伯爵《浮士德女伯爵》的讽刺性模仿。

5. 夜宿（1870）

在那段尚属本世纪头三分之一的日子里，柏林周围还没有其他大城市，最近的大城市在二十里开外，当时诞生了一座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蓬勃发展起来的古怪城市，或者更确切来讲，我们应该说它像个小城市一样尚有不足之处，在某些方面展现了柏林普通市民属性的特征。当年在波茨坦后面将柏林“用木板封起来”的隔绝世界的路障几乎密不透风，因此也导致了时代精神进步缓慢，普鲁士的自由发展逐渐才做好准备追随欧洲其他地方，并且诚然伴随着极大的笨拙和不成熟。

直到三月革命的时候，在国王的城堡里，就在帝王宅邸下方，在那自1848年起便不再允许公众通行的大门中，有一个古老破旧的盒状物，叫做轻便马车，它挂着绿色的丹加利布的窗户上有一些拼写错误的字：“若要使用这辆轻便马车，就到纳戈尔街报道。”后者如今变成了“市政厅大街”，毗邻新市政厅的东南面——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它宏大的格局炫目地展示着十九世纪有力的笔触，“法院大楼”(注)可以作为昔日古老残余写到记录年代志的石板上，现代人为了传统考虑，也不应在未来把它当作一个惹人厌烦的拼写错误而拆除。

而就在御林广场上，就在布莱斯特和葛尔普科先生的外汇交易所正对面的“法国塔楼”那边，在两个骄傲的“御林广场塔”的可怜的外延部分构成的角落里不仅生长着鲜丽的、青葱的绿草，其中间或点缀着毛莨，而且在当初那个缺少警卫看守，只有那种开着三桅船、衣领紫红、把人按在石头上打，“警官”号令的时代，甚至也有可能在某个这样的角落里停靠着一辆过度使用的老旧灵车，出于某种误解待在那里冬眠，或者是被从乔治街尸体运送公司的目录上划掉了。将我

们拉向永恒安宁的马的缰绳还在，可是黑色的窗帘已经闪着完美的红光了。《哈姆雷特》里的掘墓人大可在此沉思一切凡俗之物的易逝。路德维希·德弗里恩特[注]刚从鲁特和魏格纳餐厅出来，思索着剧中的角色，他在晚上要出演一部著名的哑剧，可能也会悄悄地向这古老的卡戎之船[注]投上几瞥，他有时会失神，而片刻之后又再次到了塔楼拱起的穹顶下，燕子、乌鸦和老鹰在那里大大小小的石柱周围筑巢。这个如今诸事繁忙的柏林，本身即是坟墓的纪念碑，这个如今连墓地里的死者铜像都会被偷走的柏林，昔日却留着这老旧的灵车在那里安然无恙。

傍晚，当暴雨咆哮，熄灭了的灯笼时或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来回摇晃，发出叹息声，体面人和富庶人家的马车沉闷地碾过尚是自然生成的石灰地，偶尔有手摇风琴的声音从地下室传出，如同远远传来的铃蟾叫声，手中拿着小木桶的人幽灵般在街上来回走着，带着一条直到耳朵，其实直到鼻子的骄傲的红领带，带有某种特定的威严端庄，精神上却是空虚的，挤着嗓子喊："七鳃鳗！七鳃鳗——！"一个饱经风霜的瘦小身影哆哆嗦嗦地掠过城市广场，手放在破旧的、打了补丁的太短的裤子里，过度饥饿的身体上穿着一件破了洞的燕尾服，头上戴着一顶摇摇欲坠的、里出外进的毡帽，当剧院观众在为劳帕赫[注]的新作叫过倒好，作鸟兽散之后，城市广场笼罩在荒凉的寂静之中。

这位羞怯地四下张望的人没有居所。他的名字来自星辰，他以之为姓的星座就在头顶上被闪电照亮的夜晚的天幕中。他的星辰在冬日格外耀眼，发出一种让其他星辰黯然失色的光芒。他自己的居所也在群星之中，既不在多罗廷施塔特也不在腓特烈施塔特。他小心地靠近那辆灵车……你今天又来了吗，老朋友——？卡戎今晚不需要从"塔楼"或"福格特兰地区"给你送一具尸体来解剖吗——？当他来到这里，为了在萨图尔努斯广阔平整的休耕地上把伸进棺材里面，这位"尸官"是为了来看护他的马吗——？……嘘——！这饱经风霜的身

影，像那位由于普通的药房生意实在不景气而把毒药卖给罗密欧的那位曼托瓦的药剂师(注)一样蹲下身去，把灵车的窗帘撩起来，慢慢钻进当年那流浪汉的救济所。

那里也许能找到一块木头，一片木板——那种把棺材放到墓穴里时用的三桅船上必须的支撑载体——这位活死人便这样挪动了一下，好在伸懒腰的时候给他布满白色长发的脑袋找到了支撑。当他用那饱经风霜的帽子给硬木头增添一份柔软，支撑他皱纹密布的瘦削的脸颊的时候，或许也没太注意上面新鼓起来的地方。他想要休息，想要睡觉。急匆匆地从这辆黑色的车边走过的有从多罗廷施塔特地区的“达利畴”的舞会人群里出来的美女，有刚刚在一位“意大利人”——我们指的并不一定是当年的“塔隆舞厅”——的后台交了好运的演员，有在夜里被叫走的医生，他在午夜可不能松了疾驰马车的缰绳，迅速而羞怯地呼啸而过。只有一位守夜人在远方驻守，每一句招呼他开门的“护卫——”的喊声都必定会给他赚得一份小费，他叮当作响的铁钥匙圈上有紧锁的房门钥匙，他执勤的地方在教堂阴暗古怪的角落里——年轻的傅尼耶也许曾经在那里作为热忱的候选人用法语传教，而且做梦也想不到日后宗教法庭对于一位演员充满激情的动情力会做出多么恶毒的审判。

那位无家可归的人是一位找不到出版商的诗人。在他所生活的时代，柏林的出版物都要受到审查。对于“纯文学”而言，节选印刷五百份小样已经是实在不可多得的机遇了。一首诗的酬金是一个塔勒，一行投机取巧之作可以换来十五个银币，当时叫做“格言警句”、“长诗”或者“流星”之类的。哦对，那些星辰造就了这位一半波兰血统的人。他学会了席勒和歌德的语言，吟唱酒神赞美歌、颂诗、吟游诗歌——都是以一种让人忆起品达的形式——由于他不可理解。然而在那个时代，读者已经变得轻浮了。人们更乐意阅读克劳伦(注)而不是克洛卜施托克(注)。受过教育的人只喜欢凡·德·威尔德。甚至连美学家们，即使他们讨论的是歌德，细细品味的却是——就像在“意大

利人”的后台喝玫瑰露酒一样——霍夫曼的《魔鬼的迷魂汤》。那位被抛弃的梦者，他还和莪相[注]与让·保罗[注]站在一边！当他躺在黑暗的灵车中——我们哪里还能获得比在死者身边更真切的思想，更深刻的感悟！——那唯一在他永恒的清醒中闪耀的思想，他相信只有那样才能把这思想锤炼、点燃、用石头敲打，才能将它缩短再缩短，变得越来越像箴言，最后变成两行，如同拉罗什富科[注]和蒙田，一字一世界——但是——按照出版物按季度结算的算法，这一行仅值三到四个便士！

这位无家可归的人名叫俄里翁·尤里乌斯。他的作品并未收录在可以借阅的图书目录中。然而谁要是愿意诛求一试，去翻阅“直言不讳”和“合伙人的古老时代的文本，便会在那里——找到那位御林广场上灵车的夜间居住者。

---

1. Gerichtslaube，柏林的一处历史建筑，始建于十四世纪，是当时的市政大楼。
2. 路德维希·德弗里恩特（Ludwig Devrient）（1784-1832），德国演员，以出演莎士比亚和席勒的戏剧闻名。在伦敦出演《哈姆雷特》时尤其获得好评如潮。
3. 卡戎（Charon），希腊神话中冥河的摆渡者。
4. 全名Ernst Benjamin Salomo Raupach（1784-1852），德国戏剧作家。
5. 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意外杀死朱丽叶的表哥后被流放至曼托瓦。二人计划服毒自杀。
6. 亨利·克劳伦（1771-1854），德国作家，原名Carl Gottlieb Samuel Heun。
7. 克洛卜施托克：德国诗人。对歌德和狂飙突进运动影响甚巨。主要作品有《救世主》和抒情诗《颂歌》。其中《颂歌》对德国作曲影响深远。
8. 莪相（Ossian）是传说中3世纪时爱尔兰英雄，吟游诗人。
9. 让·保罗（Jean Paul，1763- 1825），原名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德国作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10. 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François VI, duc de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法国箴言作家。

6. 追忆威廉·哈令（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注]）（1872）

去年十二月，德国媒体一致争先恐后报道了威廉·哈令在图林根州阿恩施塔特逝世的消息，他的笔名是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他至臻化境的诗人天赋、高贵的人性、信念坚定的性格和凄凉的悲剧命运，值得我们像各类报刊那样专门撰写悼文纪念。

《汇报》[注]这次比其它的宣传喉舌慢了半拍，它刊出的悼文并非仅如同一位哀悼者的坟前吊唁，而是更直接针对逝者本人，因此人们也想要仔细看一看，好更清晰地了解逝者的形象。本篇悼文中说这位精神和肉体均已瘫痪了快十五年的不幸之人的死将他“从痛苦中解放了”，这就已然不那么确切了。被解放的应该是那位较晚才结婚的夫人充满爱意的奉献，她出生在英格兰，对他的悉心照料无人能及。这一场值得赞叹的爱情祭礼的受事者本身却几乎不能完全感受到自己的痛苦。几小时、几天、几年对于这位坐在轮椅中的可怜人来说都以同样的速度流逝。他以为自己的思想还完全保持着清醒，而仅仅是无法将其说出而已。《韦斯特曼月报》[注]中的一张照片上，身处不幸之中的哈令从外表上看像是一位大笑的德谟克利特，仿佛在世界另一边自得其乐。实际上这张照片同这位高贵死者神志清醒时期的样子截然相反，神志清醒时他的面容通常表现得忧心忡忡，带着长期以来小心翼翼的焦虑繁忙的神态，还有对于幽暗世事的不安期待。

“从痛苦中解放了”？当然！但是还得再修改一下。心系德国北部境况的哈令的全部思念升华成了一种对田园诗歌般“乡村”生活的向往。他在青年时代寻求将他内在的一种冲动——可供他驱使的世俗

的素材来源，用来作观察之用，甚或在我们当今新的大城市的基本思想的意义中理解它们——同对大自然的热爱统一起来。几乎像是对他名字注的讽刺一般，他在古老的橡树下，波罗的海边赫陵斯多夫的渔民小屋里寻求一种怡人的诗意海边度假地。后来他放弃了那里的地产，一并放弃了那里仅仅相对而言的美丽，迁往了阿恩施塔特，当时他的意识还完全清醒，还有一些想要在那里实现的文学计划，阿恩施塔特——我并不了解这座著名的城市——毫无疑问是一个使人着迷的城市，已经引来了一些诗人。那里的人们讲述着哈令美丽的房产，讨论着他对自然本身的热爱，虽然他的精神力量已然消退了。当玫瑰盛开的时候，可爱的年轻少女——他夫人的亲戚们——采集花瓣依然凋零的枯萎花朵，扔向轮椅上的那个人。阿那克里翁注大概也想同年青人做这种游戏吧，我们的受难者也开怀而笑。正如他始终都带着照片上那种德谟克利特式的表情，死亡也从一个他最最不愿离开的世界召唤着他。他的离世绝不是无忧宫注里头戴王冠的敌对者的那种死法，后者曾经在此刻，如此需要建立在相识者善意和信任的基础上-传达一部他的“勃兰登堡小说”，或者在进一步接近时——说出了一番中伤的话：“他最好学学别人找到更好的政治立场。”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和哈令博士一样注定瘸腿。然而当这个人从那位富于计划和思想聪颖的王位继承人曾经散步、绘画、学习的无忧宫的树下经过，却对世界无动于衷的时候，给予世人的却是一幅悲戚图景。哈令坐在他的轮椅里让人推着，路过他的花丛，照料花儿。

我们年轻的一代轻易满足于凭借外部记录了解这位年代较早的神秘人物的生平。他生于1797年6月23日，修习法律，是群众的学徒和迷惑者，模仿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他最后作品的集子叫做“勃兰登堡小说”——这大概就是核心了。然而对于那些研究文学中的存在与变化、混乱与迷途、追求与寻得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细节远远不够提供足够的线索。到此为止，关于哈令，人们读到的仅仅

是一些总结概述，一个匆匆而过的时代的简短生平，这个时代急于完成虔诚的祭礼，总想着赶快返回自身。

这样的生平即使太过详细当然也无妨。这位已经离世的杰出人物写的“勃兰登堡小说”实际上并没有书商们所形容的那么高明，他们拥有这些书，并且乐意看到它们“入驻每个德国茅屋”。这本书富有各种各样的优点，但是它们并不能给出强有力的、独特的见解。它构思巧妙，但只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细节才慢慢展开的文化研究（几乎夸大到了幻想的地步），有关勃兰登堡的权利，她如何将一位羞怯的少女成为一位至今都被低估的女王。这份厕所读物可谓十分成熟。倘若人们现在没有义正词严地喊出：还是不要把野蓟认作无花果树，把荆棘认作葡萄吧！还是不要那种把美好的事物戴到脑袋上的古老法则吧！我们国庆日的代表团曾经游行到波茨坦，并且目瞪口呆地回来，那边树木高大，流水雄伟，甚至就在离柏林最近的地方也可以找到某些“地区”的蛛丝马迹，从那时起人们就认为勃兰登堡那些可以看透的排成行列的松柏林——被风吹散的风化沙石和散发香味的植被——风景极富诗意了。当时的人们还会争抢地皮，大量购入这些长着松柏林的沙地，并且乐意邀请德国到那里建造小屋，也就是别墅，当时实际上人们在争议是否不该售卖穆尔格河[注]和尼禄山谷[注]，还有艾森纳赫或贝希特斯加登[注]周围沙沙作响的森林——也反对哈令的勃兰登堡小说中那种过度夸大的诗意。严肃地说，通过称颂和渲染那位勃兰登堡女爵的拮据、困难和不足的，人们对世界犯了过错，这世界从那时以来就被认为是美丽的，勃兰登堡小说家哈令的灵魂时常受到它魔力的感染，仿佛它并没有强烈吸引他迁往南方，迫使他做出如下的表白：“就像尼泊尔一样！”他的《维也纳图景》（Wiener Bilder）切实地将头脑从冥思苦想的情绪中解放了出来，这种情绪让人想在柏林附近的潘科（Pankow）和顺豪森（Schönhausen）（是啊，是啊，顺豪森的橡树和回忆是美的，那个公园要是能再多照看一下就好了！）近距离感受宏大的自然精神。我们提到的那本新近写成的书，记述了德

国的南部，蓝色的多瑙河，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还有它的人民和风俗。

六年前，就在克尼格雷茨[注]和米库洛夫[注]的事情发生后不久，《德意志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和当代的“普鲁士”诗歌》的文章。作者威廉·彦森[注]是我们年轻一代最有才华的小说家之一。他本人出生在德国北部的勃兰登堡，出生在大公的封地，他以为能以自己动人的言辞拉近德国南北之间的距离。据说自家发生的争端也必须在自家解决。“倘若有一位诗人，或是一位当代的人，想要消除德国南部对北部，对普鲁士，尤其是对人们习惯视作这一民族的核心和特征的事物，对勃兰登堡女爵和她都城的敌意，那么这个人就是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这位德国北部的年轻子民敦促德国南部接受这种和解的方法，去读“G·W·阿莱克西斯先生的作品”。他补充道，施仁博格、以西结、冯塔纳[注]（这些人的名字多年以来将“十字报”[注]的声名带上了帕纳塞斯山[注]）便同那位斡旋者一起加入了精神和解的主导者的行列，针对一位尚在世的作家发言的章节也许是最热烈的言语，为这种和解带来了祭品，它实际上想将读者席卷而去，因为新鲜的尊敬的精神在同样的时代一字一句地建立了一些主张，这些主张令人震惊，发人深思，时而难以忍受，却更经常显得很恰当，并因此最终将读者卷入了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小说中宏伟的漩涡……

其中的事实已经陈述过了。我们在最热忱的怀念中证明了哈令这位不幸的人，可以确定的是，如此夸大的炫耀，如此的鹰翼是难于发展的。他飞行的轨迹从来不在低空，从来都不——为了以勃兰登堡的方式说话——像麦鸡那样忽左忽右地在海边脚步交叉地踱步。还有什么能比用沃尔特·司各特之名发表处女作更大胆的呢？这种行为当时被人们当作捣蛋鬼行径而嘲笑。现在《健康人类理智批判》（Kritik des gesunden Menschenverstandes）给了我们如此多的智慧与见识，以至于当我们在回顾这样古老的文学兴趣时会瞥见受到伤害的道德

——以前的《边境报》[注]大概会说“缺乏教养”——如此令人担忧的一例！然而这位年轻的前候补官员的论战倾向一直以来一会儿在这个领域摸索，一会儿又在另一个领域摸索，总是跟随各种冲动，还有艺术修养的喜好。他的天性彻底表达着过于丰富的内心。柏林戏剧舞台的历史本身表现出了一些戏剧性的升温，又很快被放弃了。《德意志报纸》就记载了一次这样的事件。因此，哈令还犹豫不决的那些时代和那些日子也不能跳过，不能忘记，当时路德维希·波尔纳[注]用上好的醋和油（做沙拉时都会这么说）制备的“哈令沙拉”，威廉·哈令和路德维希·罗伯特[注]这两位当年受到出版审查的复辟时期论战者，他们带着那位来柏林拜访的法兰克福的幽默作家——他写了一篇令人啧啧称奇的关于桑塔格的文章——穿梭于柏林的大街小巷和社交群体，经常会有通过匆忙路过的熟人的介绍而产生的对话。介绍：“皇家顾问！波尔纳！”惊奇和喜悦：“波尔纳？桑塔格？天哪！”时为七月革命之后，许多自由主义者变得明智而谨慎，只是没有了警察国家[注]的局面。当时特别有莱比锡的一家大书店，它的出版的报刊和作品集十分有影响力，至少在德国北部和中部的文学界具有说一不二的影响，它为某种方向提供了一个支点，哈令也与之关联紧密。美好文学内部的精神的蓬勃发展就在那里奋斗着，它后来特别演变成了来自大学生活的哲学评论。《新皮塔瓦尔》[注]就是那个时代诞生的，另外一位编者的名字——探长希齐格——就已经让人将它同当时的柏林圈子扯上关系了，柏林的人们坐在茶桌边上时思想活跃，而在办公室却只按照上级意愿行事。

我们这位捕风捉影，只参考对话内容行事的讣告作者也糊涂了，说起了比如“卡巴尼斯”的“丰功伟绩”。不，我们勇敢的朋友诚恳地努力着，准备反对“祸疫之海”和“命运之剑”。一位名叫芬科的年轻出版商想要将《卡巴尼斯》分成六部分出版，那么最后一卷和倒数第二卷就各自只有不到100页了！这个不幸的想法将热情和吸引人的兴致用于一本写得支离破碎的书，科不会有太大益处，只有在一个人

们对印上墨水的纸张具有令人惊讶的品味时才能行得通。作者对出版商不满，哈令就自己创立了一个书店。他的资金在另一个名字下运作。在这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失败、担忧和纠葛。他希望人们认可他的勃兰登堡小说，这些首先是通过哈令对于故乡的强大跃动的情感而写成的，也可能是对于克莱斯特[注]饱受赞誉的《科尔哈斯》的模仿，但是只有在柏林范围内没有令他失望，柏林以外的人们没有任何兴趣。只有布莱多尔先生那些“无法表达的”东西能让人感到有趣……

1848年让我们在意大利孜孜不倦地忙碌着的总是精神充沛的威廉·哈令吃了一惊。他在《福斯报》出任的职位迅速将他推向了正确的运动道路，让他经受了暧昧的抉择以及日常事务的考验，其中有许多过失，有许多懊悔。这个决定让他的勤勉、他熟练的笔触、他丰富的知识在一份受众甚广的报纸上有了用武之地，他全心全意为之投入，带着重获自由的、从迫害中解救的思想。他在三月革命前致力的许多事情都被抛到脑后。一切或多或少，这样那样都是在为新世纪崭新的、伟大的馈赠让位。三月革命前他对君主的接近，是为了他爱国主义的倾向，为了勃兰登堡的农民，长有孤零零的冻草的土路，松鼠居住的松林，肯定还有来到世上时就已经枯萎的花朵，特别是勃兰登堡的圆锥花序类的植物（我描述的是对自然的观察，让我们与阿代尔伯特·施蒂弗特[注]一同在萨尔茨卡默古特感到欣喜，在“施而克（Schierke）和爱兰德（Elend）”之间只能带来绝望）——这种接近不会再给他带来难堪和公然的羞辱了。三月革命前我到柏林拜访过他，他每说一个字时是多么的轻啊！他的一切举动都仿佛是间谍般的窥听！他感到四下的暴风雨，还有空气中的隐秘事物，完全像瓦尔哈根一样。这种压力最终落下了，而时间带来的最美的果实便是哈令最优秀的小说：《市民最大的责任是安静》（Ruhe ist die erste Bürgerpflicht）。在这幅杰出的画卷中没有他勃兰登堡的沃尔特·司各特那种毫无头绪的冗长，没有无关人物的长段对话，场景和人物中也没有特定的戏剧意味。这里基于史实而创作的人物形象仿佛肖像一

般。郝格维茨、卢切尼[注]，普鲁士陨落的先驱，我们眼前的形象如此鲜活，情节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如今当马车悠闲惬意地驶过林登街和布吕德街是，我们仍会回想起这本小说中在历史建筑中（如果它们没有被拆除的话）上演的情节。普鲁士通过奥尔米茨[注]走上了快速的下坡路，在整幅画卷之上密布着险恶的暴风雨降至的不安预感，它必将撕碎当年冯·曼托菲尔[注]领导的普鲁士……

---

1. 威利伯德·阿莱克西斯（Willibald Alexis，1798-1871），原名威廉·哈令（Wilhelm Häring），德国小说家，被认为是德语文学中写实主义历史小说的奠基人。
2. 《汇报》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最主要的政治日报，被公认为世界级的德国报刊。
3. 《韦斯特曼月报》是十九世纪的一份德国文化月刊，原标题为《韦斯特曼德国插图月报：当代公众精神生活宗谱》。
4. 哈令（Häring）同赫陵斯多夫（Heringsdorf）的前半部分谐音，Hering即鲱鱼。
5. 阿那克里翁（前520年－前485年），希腊著名诗人，以饮酒诗与哀歌闻名。
6. 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位于德国波茨坦，为勃兰登堡地区波茨坦最著名的霍亨索伦（Hohenzollern）家族宫殿。
7. 穆尔格河是德国的河流，位于巴登－符腾堡州，属于莱茵河的右支流，河道全长79.3公里，流域面积617平方公里，平均流量每秒18.44立方米，河畔城镇有加格瑙、拉施塔特、格尔恩斯巴、拜埃尔斯布龙和福尔巴。
8. 位于德国威斯巴登州，今隶属于当地自然景区。
9. 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脚下，距离奥地利萨尔茨堡20千米，人口约8千。贝希特斯加登于1978年建立了国家公园，其中包括湖水清澈翠绿的国王湖和德国的第二高峰瓦茨曼山。贝希特斯加登也以希特勒的“鹰巢”而闻名。
10. 克尼格雷茨战役或称萨多瓦会战发生于1866年7月3日，是普奥战争中重要的战役，是整场战争态势转向对普鲁士有利的一个转折点。
11. 1866年8月23日，奥普战争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在米库洛夫签订《布拉格和约》。
12. 威廉·彦森（Wilhelm Jensen，1837-1911），德国作家、诗人，他一生创作了150多部作品。

13. 台奥多尔·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是德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诗人。他被认为是19世纪最重要的德语作家之一。

14. 即《新普鲁士报》，1848-1939年在柏林印刷的报刊，标志为铁十字，因此被称作“十字报”。

15. 希腊中部山脉，滨临科林斯湾。希腊神话中，帕纳塞斯山是太阳神阿波罗和文艺女神们的灵地，缪斯的家乡。

16. 《边境报》（Grenzbote），是1933到1943年间的一份瑞士报纸。

17. 路德维希·波尔纳，全名Karl Ludwig Börne（1786-1837），犹太裔德国作家。

18. 路德维希·罗伯特，全名Ernst Friedrich Ludwig Robert（1778-1832），德国戏剧作家。

19. 政治学及社会学术语，描述一种政府自称为人民的监护者及拥有法定权力，在缺乏法律程序的前提下以行政力量控制人民及违反人民意愿，指导人民如何生活的社会。

20. 1842-1890年间在莱比锡出版的60卷本犯罪故事集。由希齐格和哈令担任主编。

21. 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德国作家、戏剧家、诗人。《科尔哈斯》指的是他的短篇小说《米夏埃尔·科尔哈斯》

22. 施蒂弗特（Adalbert Stifter，1805年10月23日－1868年1月28日）是一位奥地利作家，作品多描写波希米亚森林。

23. 全名Girolamo Lucchesini（1751-1825），普鲁士外交家。

24. 1850年11月29日有普鲁士与奥地利签订奥尔米茨条约，基于奥尔米茨（今捷克奥洛穆克（Olomouc））会议的结果。这事件被称为奥尔米茨之耻，因为普鲁士被迫向奥地利称臣。

25. 全名Edwin Freiherr von Manteuffel（1809-1885），德国军事将领，以普法战争中的胜利闻名。

7. 报刊一角的抒情诗歌（1873）

……当今成卷出版的言辞中重要的新秀要数哈梅林[注]和舍费尔[注]，一位来自奥地利，另一位来自莱茵地界——北德耳中错得离谱的押韵形式（“reiten”对“leiden”）便来自那里。两位在这里都小有名气——一位通过在海德堡大学学习的学生们扬名，另一位则是通过在这里结婚的维也纳女人们。学校、沙龙、对话和新闻业对他们的成名贡献甚少，而现在这位周日早上在动物园津津有味地散步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会计，还会觉得30年前在柏林身跻经典名家之列的费朗诗人彻底满足了他的情感。那些后来在一艘不幸沉没的“阿尔戈号[注]”船上聚会的柏林诗人们，有些丢掉了生计，有些随风四散，或者踏上了其他职业道路，例如写作剧本。我们今天并不会更加详细的讨论这种和《福斯报》[注]关系密切的变化，只是从书桌上拿起一卷用金线装订的精致的小册子《赫尔曼·克莱特科诗集》[注]（柏林，施罗德（Schröder）出版社，1873年）。

作为一位每周六次敲定报刊的编号的总编辑，还要时不时负责十份印刷得密密麻麻的副刊，每小时都要因为处理成千上万的请愿、修正还有各种技术困难而同排字工人打交道，还得献身于抒情诗歌的缪斯，赢得并且保持公众的认可，只能通过对比才能凸显自身，以及通过此处讨论的这位诗人本人适于政治领域的叙述、审慎和忖度的柔弱天性。哎呀，有些政治报刊的编辑只能在那神圣的夜晚休息（可以9点钟下班的人多么幸运啊！），这夜晚同月亮和星辰、喷泉的跳跃、形象良好的守夜人等等，在克莱特科短得几乎如同格言警句一般的诗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夜晚之后是梦想、死亡、彼岸，完全同社论文章相反，早上喝咖啡时，后者将我们同现世紧紧联系在一起。对于

每一只我们的诗人在他的报纸上不情愿地任期游弋的“鸭子”，这里都有一只天鹅与之对应。那些天鹅、鲜花、帆船、太阳、尤其是通常很少涌入抒情诗人构思的金色，这位诗人将德国抒情诗全部移植到了引人入胜的领域当中，金色出现在晚霞、或火焰、或少女面颊、或荡漾的海波、或饱受赞美的高贵人格深处。很快，在这虚无主义的时代，并且特别是在新闻界中，这些诗歌中便会出现实际上罕见的、孩童般纯洁的、充满神圣的生活。而且这绝对不是一种同传统观念的指导思想一致的生活。就算是白发老人也依然能感受到美的魅力，再次强有力地重获新生的记忆，那声音有时会出现在藐视萨图尔努斯的伊斯兰智慧中——然而不久（而且对于这个千篇一律的结尾点题来说可能太过常见了）就有一场风暴，或者夜幕降临，或者死神过来敲门，就以前面提到过的这些图景作为结尾。倘若我们继续批评这种被过度使用的形式上的不足，那么首先就也是给出了对于远离冗长繁复之言的赞美；总编辑每小时都得说：“简练些！简练些！”，可是这要是放在抒情诗的领域中就得再行斟酌了。红笔并不适合诗歌。对于这种短小精悍的作品而言，要是像当年古比茨[注]在《福斯报》里面写的评论那样令人读上两遍才能读懂，那就有害无益了，实际上，克莱特科的很多诗歌形式上都如此紧凑，以至于说不定就有哪首不会让读者立即清楚地了解状况，而是必须投入更长的时间更深地了解其中使用的意像，才能一窥其构思和内涵。这位诗人可谓是十分随性。开玩笑地说，诗人受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家庭中的小状况而感动，他的语言丰富而有力地流淌，水晶般清晰。社会歌曲绝对值得传唱，并且雅俗共赏。我们时代的祝酒歌却可能无法满足这第二点？现在的人们认为本世纪人们情有独钟的一些类似于祝酒歌的东西仅适合围坐桌边的红鼻头们。

---

1. 哈梅林（1830-1889），全名Robert Hamerling，奥地利诗人。

2. 舍费尔（1826-1886），全名Joseph Victor von Scheffel，德国诗人，小说家。

3. 阿尔戈号：Argo，希腊神话中的一条船，由伊阿宋等希腊英雄在雅典娜帮助下建成。众英雄乘此船取得金羊毛。此后该船作为进献雅典娜的祭品被焚毁。南船座由此而来。

4. 《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原名《柏林政治和学术问题王国特权报》（Königlich privilegirte Berlinische Zeitung von Staats-und gelehrten Sachen）。该报从1785年起以这个名称在柏林出版。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该报遵循的是温和自由主义的办报方针。

5. 赫尔曼·克莱特科（Hermann Kletke，1813-1886），德国抒情诗人，小说家，媒体人。

6. 古比茨（1786-1870），全名Friedrich Wilhelm Gubitz），德国插画家，小说家，戏剧评论家，出版家。

8. 路易莎·米尔巴赫注和现代小说业（1873）

今天拍卖路易莎·米尔巴赫的遗产！不是她的手稿——因为这些墨迹未干的手稿马上要被送往印刷厂——而是她的家具、地毯、窗帘、钟摆、油画、花瓶和埃及的纪念品，全都在波茨坦街的一个展台上分门别类地放好了！但愿这种热烈的过高期待——它突然满足了同世界脱节的大洋彼岸的愿望——会招来许多美国投标者，即使是她用过的一个铁弹簧，他们也乐意为之付五十美金！因为全柏林都被路易莎·米尔巴赫的财物明细震惊了！逝者拿到的酬金是最显赫的。她应该是从埃及总督那里拿到了数额十分可观的财物。她举办奢华丰富的晚餐和宴会。她出游时丝毫不需节俭，像公主一样。不论如何，她尚无人监护的女儿不应负担任何债务，而这位可怜的人也许是迫不得已才将遗产列为“慈善捐赠”的。

这位奇女子被死神带走的时候，正在写作一部已经开了头的小说，每天早上10点左右由一位速记员听写大概两到三个小时，她的生活及举止中并未透露出任何那无情的死神正在接近的迹象。有一些完全“生活在现世”的人们，他们在阴间——倘若人们不愿相信古埃及那套灵魂转世的说法——为自己找不出任何适合的居所和联系人，他们便是纯粹投入生活和享乐的人。路易莎·米尔巴赫就是这样的。她向来无所畏惧，充满勇气，向来站在悬崖边缘。她在一部戏剧中将一位西班牙浪漫主义者称作“无畏者”，他也许是以她早期的浪漫主义生活为原型的。她的朋友们将会一直难忘她坚定的、勇敢的、不畏任何艰难险阻的、洪亮的梅克伦堡注式的嗓音。任何挫败都无法令她折腰。她的性格和言语中有着最愉快的信任、对胜利的信念、对任何事

物的抗拒。即使事实不如人意，她也会像个将军一样有许多的退路，即使兵败而归，撤退时也能表现得雄赳赳气昂昂。

“柏林书桌”（Berliner Buchertisch）中仅能听到她最新的草率写就的《国王威廉和他的英雄们》（Kaiser Wilhelm und seine Helden），由本地的书商魏尔纳·格罗斯（Werner Große）出版，这个书商只在中央和南部地区有较大的销售份额。这位有极大物质需求的女人，她破败的财政状况养成了她的坏习惯，想再次超越自己昔日的成就，描摹生活中位高权重的人物，当奥地利的约翰大公[注]还安然坐在他施泰尔马克的城堡中时，她就已经将那位昔日的帝国蛀虫加工成了书中的人物；因为她热爱奥坦丝[注]和拿破仑时代的浪漫主义，便给拿破仑写信（见《揭秘杜伊乐丽》（Enthüllungen aus den Tuilerien）），还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参与苏伊士运河的落成大典等等。“写实”的坏习惯如今通过曾经那位名叫萨马洛夫的归尔甫军团[注]激进分子梅定[注]而流行了起来，以至于我们会读到这样的小说情节：拉斯克[注]可俾斯麦在洽谈妥协方案，冯·克多尔先生在一旁抽烟，洛塔·布赫尔[注]则斜倚窗边，好像在漫不经心地翻阅一份英文报纸。我们这一时代诗意的缺失、教养的缺乏和美国式的作风，鼓励着一位敏捷轻浮的，几乎再也无法沉静下来的人的这种几乎幼稚的陋习。那位速记员伺候着这些几乎和拱顶一样高的幻想。我们在这里用“美国式的作风”形容的是那种几乎让人想起野外原始状态的毫无节制的煽情，通过大众，凭借支持来违反禁令，并且想要看到所有人目瞪口呆，所有人目不转睛，一切都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死刑、恐怖事件、世界奇观等等。整个北美都为这种煽情的热潮而轰动，然而欧洲在很久以前有过一阵激动后，便至少在文化人圈子里安静下来了。简直难以置信，纽约一个报社不但把路易莎·米尔巴赫送到了维也纳，还把她送到了埃姆斯河，为了在那儿观察并且描写国王今年（如此安静祥和，即一点轰动都没有）在克拉西恩泉的出现！她从维也纳飞到埃姆斯河，然后自己在马伦巴疗养了一下，得了感冒，在柏林卧病在

床，一点也不知道自己的危险处境，她失去了意识，失去了痛感，就此一命呜呼了。当人们把她的尸体葬在我久经沙场的泰奥多尔·蒙特旁边，而且一些坟前吊唁的尖刻话语还在耳边回响的时候，倘若这里有让门外汉在坟前致辞的习俗，那么我便要对那“不要审判——！”的主题加以答复了：即使你想要谴责这种对奢华的追求——仔细调查一下吧，神父！——她的根本动机只不过是女人的爱情而已！首先是对她丈夫的爱，他对她而言比他对柏林学术界——或者在柏林那种仅仅凭借头衔和荣誉才能获得的认可——而言更加重要、更值得认可！这种爱情逐渐接纳了对于世界的美菲斯托式的、讽刺的、甚至愤世嫉俗的忧愤的蔑视，并逐渐掌控重获哲学教授职位的丈夫。爱情是表象的唯一成因，正如现代文学可以同贵族、同商人、同千般狂妄和朝天的狂妄鼻孔为敌一样！美德过度发挥就成为了错误，这是一个古老的定理，人们认为它语出乔治·桑，但她其实仅仅是重复了它。路易莎·米尔巴赫从相识的奢侈享乐品供应商那里借贷成千上万并一直如此，将这定理用于那十分可怕的平衡系统，便能一窥人物性格的发展方向。这位女人的挥霍并不完全是个人虚荣的结果，而是阻力的结果，这位凭借智慧实现合理的雄心壮志的人想要给这自负的、受幸运眷顾的大千世界加以阻力。“合理的”—— ？我说的是她的雄心壮志吗？那么，考虑到《腓特烈大帝及其属下》（Friedrich der Grosse und die Seinen）和《国王约瑟夫》（Kaiser Joseph），我想用一个叠句来附和我们赫尔纳呈现的如此美味的两本书：“其中倒真是有些才华！”

几乎在一切关于纪实文学的报道中都能找到这样一条规律：小说是时代真正的诗性表达。特别是在N. N.先生的一份关于刚出版的小说的评论的导论中，人们时常会遇到这种适用范围值得怀疑的公理。那位与此有关的作者，与他同住一个帐篷的人或每天常在一起抽烟的人促成了这种评论，他偶然认为一部戏剧是享乐主义的，那么那些考虑到戏剧作品数不胜数，并且尽管“嘘声一片”也还是继续买票的人也就不能不同意他了。然而仔细想想，这条规律不论对于小说还是对于

舞台而言都无法证明。比如如果今日的德国文学中能有一位罗伯特·彭斯[注]一样充满原创性的由艺术和纯真造就的心灵，本来仅仅在一些失传的“自然诗歌”当中有类似的造诣，那么他为何不出来抛头露面，证明抒情诗歌的适用性呢！卡里尔说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美学概念必须只能通过小说发展起来，我认为完全是一派胡言。若能写出好的戏剧，全世界都能得到满足！若能写出“引人入胜”的史诗（我说的是柏林话），每个梳妆台上就都会放着一本！

这就已经足够让人们拒斥N.N.和N.N.写的那本文学评论的导论了，因为创作才能的匮乏已经在小说中积攒泛滥到可怕的地步了。没有任何生活经验的年轻少女，仅仅凭她读到的书中的情节的积累，便能借机展现她的复杂了。女人们“创作”出——按老话讲“真见鬼了”——遭抢劫的孩子，被篡改的遗嘱，纵火行为，不认私生子，还有那些赢得女伯爵欢心的入侵者摇身一变成了船工，或者她们拿来一些从某种意义上相互关联的历史素材，相当于大杂烩的菜谱。有些日记摘录者一年下来能出上8-9卷书，此前就已经在我们无数的插图报刊中使用过了，写作的时候带着如此多的信任，仿佛只有不会再写作的人才会阅读他们，或者觉得它们无聊于是放在一边。这种书刊制造没有任何评论。除了对于批量否决上瘾的评论家会在《文学娱乐期刊》里面写上一篇[注]以外还有谁会去写，会去读，会去翻阅呢？它考虑的仅仅是广告效益，而这也不能被视为“重点”，而是最上面一排齐平的编辑寄语，通常是作者或者出版商自己写的评论，其中没有任何批评。大多数当地报刊对此的反响是开心的，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解决圣诞节前后积压成堆的书。

---

1. 路易莎·米尔巴赫（Louise Mühlbach，1814-1873），原名Clara Mundt，德国作家，以历史小说著称，短期曾轰动一时，她的许多小说被译成了英文。
2. 梅克伦堡（Mecklenburg）是位于德国北部的一个历史地区，大约为今天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的西部。该地区的大城市有：罗斯托克、什未林、新勃兰登堡、维斯马和居斯特罗。

3. 奥地利约翰大公（Erzherzog Johann von Österreich 1782 －1859），属于哈布斯堡-洛林皇朝。

4. 指的可能是奥坦丝·德·博阿尔内（Hortense de Beauharnais，1783年4月10日－1837年10月5日），荷兰国王路易·波拿巴之妻，拿破仑三世之母。

5. 归尔甫军团（Welfenlegion），乔治五世在1866年至1870年出资维系的汉诺威准军事部队。

6. 奥斯卡·梅定（Oskar Meding，1828-1903），德国外交家，作家，以笔名高尔·萨马洛夫（Gregor Samarow）发表多篇小说。

7. 全名Eduard Lasker（1829 － 1884），德国政治家、法学家。

8. 洛塔·布赫（Lothar Bucher，1817 －1892），德国政论家，俾斯麦的心腹。

9. 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诗人，曾搜集、整理民歌，主要用苏格兰语写作，所作诗歌受民歌影响，通俗流畅，便于吟唱，在民间广为流传，被认为是苏格兰的民族诗人。他被视为浪漫主义运动的先驱，死后成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灵感来源。

10. Blä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 war der Name einer Leipziger Literaturzeitschrift, die von 1826 bis 1896 erschien. Sie ging aus dem Literarischen Wochenblatt hervor, das 1818 August Friedrich Kotzebue gegründet hatte.